

中国共产党青阳地方史

(1919—1949)

引 言

青阳县位于安徽省南部，为长江中下游平原与皖南山区交界处。县境东临南陵、泾县，南连石台、黄山，西邻贵池，北接铜陵，总面积 1180.6 平方公里。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境内中低山和丘陵居多，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盛产稻、茶、麻、桑等农副产品，素以“鱼米之乡”，“蚕桑之地”著称。

公元前 109 年，青阳始置县，称陵阳县，后几易县名，至公元 742 年改置今县，现属池州市。

青阳历史悠久，先人们曾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青阳古代文明。当历史步入近现代时，青阳社会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青阳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所产生的变化更为深刻。

五四运动前后青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芜湖被辟为向西方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1882 年，帝国主义直接侵入青阳地区。他们与当地封建势力相勾结，采用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青阳，青阳人民遭受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政治方面：本县县级行政机构，清末为县署，民国初为县公

署，北伐胜利后改称县政府。1930年前行政区划沿用清制。1932年实行区、乡（镇）制。县设5区，117个乡，29个集镇（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10保为一乡）。1933年起，本省施行联保制，县设联保办事处，全县划分3区，56联保，273保。当时这些区、乡、保、甲长，极尽“爪牙”之能事，利用职权，横行乡里，逼租催税，抓夫抽丁，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们发号施令，强迫农民服从。这种政治体制使得统治阶级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由此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辛亥革命以后，他们仍沿袭这种体制统治着青阳人民。

广大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群众处于社会的最低层，饱受奴役和压迫，他们虽担负着沉重的社会义务，但在政治上却毫无地位，更无权利、自由可言。

经济方面：当时传统的农业经济是青阳经济的主要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在旧社会，青阳土地占有的不平衡性，令人吃惊。据统计表明，全县人口约10万，总耕地195792亩，其中，地主共有1459户5126人，却占有土地73215.13亩。公堂（其实也为地主所有）占有44503.7亩，富农共437户1979人，占有土地1318.3亩。地主、公堂、富农合计7105人，只占全县农村人口不到7%，却占有60%以上耕地。据《青阳县志》记载，民国时期，占全县总人口77.4%的贫雇农及下中农，占有土地仅为全县总耕地的21.8%。庙前、木镇两乡各有地主60户，占有土地万亩以上。又如百花村，共

174户806人，耕地1391.9亩，其中5户地主23口人，占地1344.2亩。而该村134户贫雇农共551口人，却仅占地47.7亩。也就是说，地主人均占58.2亩，贫雇农人均只有8厘。占村人口2%的地主占村总耕地高达96%，而占村人口68%贫雇农只占村总耕地的4%。另外，民国时期，长江水患，桐城、枞阳等县成批灾民陆续流入本县，他们“老小一担下江南”，徒手来青阳谋生，结果大都沦为佃客。

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不能维持生活，迫使农民不得不交出自己的人身自由，接受奴役性条件来租种地主的土地，从而承担和忍受苛重的地主剥削。

地主剥削形式有多种：

地租剥削：分“死租”和“活租”两种。“死租”即按田亩定租，每亩一般是200至250斤稻（那时亩产最高为400斤左右），并且在遇到天灾人祸、收成不好甚至颗粒无收时，仍要按原定的租额交足。“活租”即平分租，一般租额按实产定为“五五”或“六四”，若是客姓人（即外乡人）还得另找保人担保并交押金。

雇工剥削：雇工分长工、月工、短工。地主租出大部分土地的同时，自己也留些靠近庄园的好田雇长工“自种”。雇工工资很低，长工为每年200-400斤稻之间不等。月工、短工每月10至30斤稻不等。另雇小孩放牛、妇女烧饭，不付工钱只管吃，其实干的是牛马活，吃的猪狗食。

放高利贷剥削：贫、雇农由于天灾人祸无法生活，或者青黄

不接，缺乏口粮时，地主便乘机放高利贷剥削，当农民交不起地租时，地主往往又把地租作价行息。高利贷的利率很高，年利率一般是百分之一、二百。农民负担过重，有的连利息也无力偿还，地主便采用“利滚利”的办法，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紧紧地吧农民束缚在高利贷的重重网罗中，受着重利盘剥。

利用耕牛农具剥削：贫苦农民一般买不起牛，就只好向地主租用。租用一条牛每年要 400 至 600 斤水稻，而且地主自己要用牛时，照样拉回，由此耽误农时，给农民造成的损失，地主一概不管，牛租却仍按原数照收。沙济地主王金和放债专放给有耕牛的人家，当债主无力偿还时，便让其以耕牛抵债，然后，又将抵债的耕牛放租。农具租赁时，地主只管租出，不管修理，谁租谁修，损坏还要赔偿费。

变相剥削：凡租种田地的佃户，都要敬奉“东家”，收租时办“租酒”，要佃户送“租鸡”，并无偿地给“东家”做工，佃户即便心中不服，却不能流露，否则，就有被地主抽田退佃的危险。如奸商沈雅龙，当稻未成熟，农民又遇急难时，他就“放稻青”。本来市价八元一担，他作四元放出（即以廉价收买农民地里的青苗庄稼），待收回时，等于加利一倍。若是稻子涨为十元一担，就等于他用四元钱买了二百五十斤稻。此外，还有当铺的典当剥削，当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不得不把自己家中衣物或用具拿到当铺作押，当几个钱，以应急时之需。当铺便借机敲诈，农民当一件东西，本值百元，只算十元，且十元还要扣息。因为“月

不过五”，满月后过五天不赎回，即开始计息，息率高达 30%，因此，农民的东西一经当出基本无法收回，等于白白送掉。这样的当铺当时县城有两家，一是光绪年间大地主李鸿章开的，一是 1923 年奸商赛家普开的。

广大农民披星戴月，日晒雨淋，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到头来吃糠咽菜，衣不蔽体，常常为生活所迫，卖儿卖女，背井离乡，甚至冻饿而死。例：朱备乡柏家祠村，住房除一户地主是瓦房外，其余均是草屋，70%的人是单衣薄裤过冬，80%的农民以打草鞋为生，故有“草鞋街”之称；庙前古家畈村，56 户人家，“镰刀上墙，家中无粮”的竟达 90%；木镇新桥村 67 户人家，有 10%出外要饭。一句话，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农民经常处于极端穷困无着的境地。

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本就饥寒交迫的农民雪上加霜。封建统治者为养活一大批官吏和镇压农民的军队，除强迫农民缴纳田赋外，还征收贡税等多种“任意税”，他们对劳动人民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无所不至其极。

1853 年至 1863 年连续十年，青阳境内清兵、湘军轮番驻防。民国期间，国民党驻军更是万头攒动。其巨额军费负担最终都转嫁给城乡人民。每次摊派，使百姓一次上交数额往往顶一年或几年的附捐。

1926 年，北洋军阀孙传芳部溃军百余人在庙前勒索“路费”500 元，未得，遂纵火将庙前商会会长房屋烧毁。

1926年至1927年间，北洋军阀鲍刚等部先后多次经过青阳，几乎每次都要搜刮民脂民膏，少则3000元，多则5000元，不仅如此，军阀部队官兵还乱闯民宅，见钱就拿，见物就抢，许多工厂、大型商店、作坊成为他们的安营宿地。部队走后便一片狼藉，百姓唾之为与匪无异。

由于封建政权的“重农抑末”政策（“末”是指手工业和工商业），因此，近代青阳工商业发展缓慢。民间铁匠、木匠、篾匠、针匠、砖匠、石匠等手工业者，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生活也相当艰难。稍大一点的作坊相对集中在蓉城、陵阳、庙前、木镇等几个集镇，主要有蓉城、庙前制伞作坊，陵阳广丰、晋丰糕点作坊等。当时，民族工业虽有发展，但也仅限在碾米、纺织、采矿、建材等行业。1916年，本县商办裕青公司、丰利公司在洛家潭西北的五佛冠山、太阳山及方冲、煤炭涝一带开采煤矿。1919年6月，省立青阳县纺织厂开工。同年，庙前乡绅姜孝维投资3000元，开采洛家潭高桥煤矿。1922年，太湖县组织20余人开采凤形煤矿。此后，上海史文修投资6000元开采丁桥牛山石膏矿。繁昌李翠文投资1000元，开采七房冲煤矿。1923年，省实业厅所属实业工厂第八厂在蓉城建成，从事纺织、刺绣、缫丝生产。1924年木镇广和米行始用机器动力碾米；1926年，蓉城大生米厂开业。民国初年，为本县砖瓦生产鼎盛时期，时有砖瓦窑150座，砖瓦品种30余种。由于上述企业的资本小，工艺落后，在廉价的洋货面前缺乏竞争力，多数兴办不久就相继停产。

随着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洋货占据了青阳市场的绝对优势，洋商代替了土商，洋货代替了国货。县城乃至乡镇集镇的大小商店，货柜、货架上摆放的几乎全是洋货，如洋火、洋布、洋油、洋肥皂、洋袜子、洋线、洋烟等，以美国、英国、日本的居多。主要有“美孚”煤油、“亚细亚”煤油、“古士德”煤油，太古公司的糖，还有蜡烛、皮鞋、麦粉、牛奶粉、罐头、颜料等等。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不仅构成了对当地自然经济的冲击，同时，造成了国货滞销或停销，从而阻碍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在外商倾销的商务活动中，洋商又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当地的粮、棉、油、茶、蛋、禽、肉、木、竹、炭等农副产品和原材料，这一“卖”一“买”实质就是双重经济掠夺。

受帝国主义资本入侵的冲击，本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伴随着工矿业的产生和发展，一些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变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从而导致本县工人队伍的扩大，尽管其人数不够庞大，却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为青阳无产阶级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化方面：封建专制表现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主要是宗法思想、封建礼教、三纲五常、尊孔读经等，它们与帝国主义传教士进行宗教侵略和奴化教育虽有异，但本质上都是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的，都是从精神上奴役和统治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

近代，青阳经济的落后导致文化教育的落后。1903年始有小学堂。1924年始有县立初级中学。县城、乡镇及较大村庄，民间办有私塾，招收初入学儿童，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后增设《国语》，以识字为主。时有义学多为较大家族以学田学产租息为经费创办，供本族子弟就学。据1947年统计，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15.5%，大学、高中、初中和高小文化程度者分别为全县人口总数的0.14%、0.87%、1%和9.77%，而初识字者及文盲却高达88.22%。建国前出国留学学生仅10人，且大都是地主、富商子弟。可以想象，广大劳动人民生活都难以维计，自然没钱让子弟读书，只好长期处于文盲状态。越是没有文化就越容易受骗，封建统治者正好借机宣扬“同宗同姓一家人”、“三纲五常”是天的意思；“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谬论。于是，当时风行以节妇烈女为楷模，以尊祖敬宗为榜样，以培养忠臣孝子为目标。时县境内土地庙连阡接陌，关帝庙、观音庵比比皆是，四时八节烧香拜佛求签许愿的人，摩肩接踵。在封建礼教、封建宗教的桎梏下，以致许多人思想僵化，精神麻木，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牺牲品。封建统治者就是通过这些“精神鸦片”，企图把封建统治合理化、永恒化、神学化，要人们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安于被奴役的命运。

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青阳人民深受其害。洋教成了殖民主义者用来侵略中国的工具。1882年，他们直接进入青阳境内，

进行文化渗透，以传教名义建教堂，传教义，开办教会学校。1910年建立了“福音堂”后又建立了“圣公会”，并以教堂为主办了“路加”、“三育”、“福音”、“开智”等五所小学。将“圣经”定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每星期强迫学生做礼拜，称为“元学日”。课文大都是“耶稣是救世真主，如果不遵守耶稣使命，死后下地狱”以及“耶稣能造万物，人穷不要埋怨，这是耶稣造化的”这类语句，与封建礼教如同一辙。其间，教会发展以天主教最快，教徒达2000多人，他们除强迫教徒信奉“天主”外，还制定“十戒四规”，其中有一条规定：教徒子女不准与非教徒子女结婚。

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传教的旗号，借以“主”的名义，大肆灌输西方思想文化，进行所谓“道义征服”，干着“攻心为上”的勾当。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他们的目的就是培养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成为他们的政治信徒，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以利扩大影响，巩固其殖民统治地位。

早期革命思潮的涌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青阳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境内早在1853年至1863年整整十年的太平军反清之战中，青阳无数青年踊跃参加太平军，直接参与了反抗清廷的斗争。

民国期间，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的渐渐传入，使人们打开了眼界。民国初，宁仲铨在陵阳创办私营通俗书报社，引起不少进步知识青年关注。1920年，青阳教育界，创办了“九华钟”。该刊以通俗犀利的文笔，揭露和批判了列强以传教为名，行侵略之

实的行径和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警醒国民，启迪明智，宣传马克思主义。后虽被帝国主义教会神甫捣毁了印刷厂，抢走了石印机，但毕竟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它既是青阳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初步尝试，也是青阳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开始。在各种进步思想的碰撞中，人们理想愿景逐渐清晰，为马克思主义在青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1921年，早期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应聘在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曾于6月17日与学生吴华梓、梅大栋、方英达，何德霖等数人，从宣城启程到黄山，后经石台，于25日登上九华山天台绝顶。据梅大栋1921年日记载，恽代英于26日离开九华山，“是日行四十里宿庙前，二十七日舟行三十里，陆行三十里至大通，搭江捍轮，晚二时到芜。”^①恽代英带领学生沿途访问九华山、庙前等地。他们住农家，与农民促膝谈心，耳闻目睹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农村教育的落后，并展开讨论，明晰道理，使随行的学生和当地群众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只有起来革命。

恽代英的青阳之行，虽历时不长，但意义深远。他为青阳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引导和激励了一批先进青年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在全球所产生的震动，在青阳很快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引发了青阳一些先进知识青年追求民主，追求科学，

追求真理的新思维，并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中。其中，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的典型人物有：

汪恺成，1910年，应募参加清军新兵镇江35标。经徐植介绍加入同盟会，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他随部就地起义。

徐秉义，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系，曾与乡人汤炳荣、沈本安等参加了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集会游行。其间，还组织了北大青阳同学会，并出版小型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经常写信与家乡的青年朋友联系，邮寄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并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向家乡群众宣讲革命道理。

孙梅先，1919年，就读于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曾参加安庆市学生声援“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1927年初，曾先后劝说北洋军阀张宗昌、王普等部属向国民革命军投降反正。

田禾，1923年毕业于本县第一高级小学，考入县师范讲习所，被选为该所学生自治会会长。其间，曾带领学员走上街头，手执反日标语，高呼反日口号，宣传抵制日货。

宁华庭，1925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文学系，翌年，考入东关大学法学系夜读班，分别获得文学士、法学士学位。1935年，应聘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他曾主办《争鸣》杂志，以“明宇”笔名撰文，抨击腐败政治，揭露社会黑暗，宣传进步思想。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逮捕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在苏州开庭时，宁华庭以律师身份，陪同首席律师张志让出庭为“七君子”辩护。

谢汝昌，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翌年，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实践社”。

徐鸿毛，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二十师，随军北伐。

青阳人民早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虽然都是自发的零星的斗争，但其精神是可贵的。先行者的斗争虽然走了许多弯路，但每一次斗争都有它的重要意义。青阳学子在外地的斗争无一不与家乡的斗争相关联而产生连锁反应，其相互作用无疑是积极的。

① 《中国共产党池州历史大事记》，第16—17页。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 5—1927. 7)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一爱国热潮很快席卷了全国各地。青阳人民闻讯后奋起响应，举行示威、张贴标语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在青阳这块封建统治盘根错节的土地上第一次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第一节 响应五四爱国运动

青阳率先行动的是省立第七师范^①学生。他们一边通电声援北京，一边组织全校师生百余人上街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抵制日货”等口号；张贴“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等内容的标语，并在人群中演讲，宣传鼓动，号召人民奋起自救。次日，该校师生还轮流值班，沿交通要道设卡查禁日货，并将查禁重点放在童埠，防止日货从大通流入青阳。对查出的日货予以销毁，对贩运日货的商贩予以处罚，此举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省立第七师范学生以全新的组织形式将斗争引向深入，进而激发了群众爱国热情，带动了社会其他阶层的参加，使抵制日货的斗争在全县各地迅速展开。纺织厂不再用日产棉纱，城乡商店不再进日货，社会各界把抵制日货作为响

应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直接行动，积极投身其中，纷纷奔走呼号，晓之以理。青阳响应五四运动的活动由此突破了学校师生狭小范围，发展成为广大民众参加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也是青阳人民自觉参加规模性政治斗争的开端。

第二节 青阳总工会筹备处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

1927年3月，中共安徽地委派舒传贤和王绍虞分别出任省总工会和安庆市总工会负责人。是月，在安徽法政学校成立了“安徽省总工会筹备处”。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后，旋即派朱子麟到青阳，建立“青阳总工会筹备处”。

朱子麟到青阳后，很快建立了青阳总工会筹备处，筹备处地点设在青阳东门（即现在的兔儿桥附近）。筹备处委员7人：朱子麟、王果生、孙鉴清、胡维屏、许星甫、陈国智等。朱子麟任委员长。

青阳县总工会筹备处下设木业、砖业、石业、船业、搬运、理发、店员、竹器、职员、米业、缝纫、布业、南货业、糕坊业共14个基层工会组织，会员约3000人，并拟定工会章程10条：

- 1、保障工友们帮工起码三年，不得无故歇工。
- 2、保障工友们一律增加工资。
- 3、保障工友们不受东家欺侮。
- 4、保障工友们生灾害病不得扣发工资。

5、保障工友们婚丧喜事由东家补助用费。

6、保障学徒工友们两年能拿到工资。

7、每年做的利润，年底提成分红。

8、每月初一、十五，照旧给工友们四两猪肉，不得以油条代替。

9、学徒和工友不得受东家毒打。

10、学徒进店时不办投师酒。

工会章程一公布，影响是积极的。有些东家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每月两次肉食，不再用油条代替了。工人工资也得到了增加。工会和东家建立了联系，代表工人讲话，处理工人和东家的纠纷。由于工会章程符合工人的利益，工会组织发展迅速，参加工会的人数骤增。

4月，共产党员王少兰（六安人）由武汉到安庆总工会指导工作，听说青阳工会办得好，特地来到青阳，在青阳工会筹备处召开了两次会员大会，宣传工人阶级的伟大，号召工友们团结起来争取解放。王少兰的宣传引起工友们的极大兴趣，提高了工友们的认识，启发了工友们阶级觉悟。同时，王少兰还针对青阳总工会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三点意见：1、委员中的天主教友胡维屏，圣公会教友许星甫，福音教友陈国智三人不宜负责工会工作。2、积极组织基层工会，广泛吸收会员，壮大工会组织。3、工会经费由省总工会发给，不必自己垫，更不准摊派。对王少兰指出的关于三个教友不宜担任委员的问题，朱子麟当即表示

待正式成立总工会时予以调整。

不日，朱子麟、王果生随王少兰前往省工会汇报工作并领取经费。时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省工会接到上海工会通知，号召全国工人积极行动起来，声援上海工会反屠杀工人的斗争。朱、王二人随即参加了省总工会筹备处组织和领导下的示威游行。队伍在总工会门前集中向梓潼关进发，国民党军警横加阻拦，打伤了十多人。游行队伍折回国民党省党部门前请愿。当局要游行队伍派代表到省党部谈判。尚未谈出结果，队伍就被军警冲散。国民党省党部指责游行队伍以请愿为名围攻省党部，说游行的人都是一些“赤化”分子，下令抓人，朱、王二人遂撤回青阳。当日，国民党警察厅封闭了省总工会筹备处，并逮捕了一些人。青阳总工会的正式成立就此耽搁。

青阳总工会筹备处的建立，是本县工人有史以来第一个工会组织。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首先，它使青阳工人阶级最早与党直接接触，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宣传。党与工人的联系为马列主义在青阳的传播乃至建立党组织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其次，青阳总工会筹备处的建立，标志着本县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体现了青阳工人的阶级觉悟及其组织性和斗争性。青阳总工会筹备处的成立，在青阳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三节 北伐军经过青阳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兴师北伐，至11月在攻克武汉、南昌等城市以后，分三路继续北伐。西路军沿平汉铁路北上，东路军直指江浙，中路军沿长江东进。中路军又分两路，由第六军和第二军为主力组成江右军，由第七军为主力组成江左军。1927年3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三十师由贵池进入青阳（军长程潜，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师长王家山，三人均未到青阳）。

得知北伐军将进驻青阳，青阳兵差招待所组织商民、手工业者、工人、农民约五、六百人同县政府机关职员一道前往县城西门小岭迎接。进城这一路，红旗招展，张灯结彩，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群众欢呼雀跃，如同过节一般。北伐军军容整齐，纪律严明，沿途秋毫无犯，与群众记忆中的军阀部队进城形成鲜明对照。

北伐军进入县城后，三十师政治部设在东门的天主堂内。第二天，政治部派了一支20余人的宣传队，扛着白绸大锦旗，上面“三十师政治部”几个大字耀眼醒目。他们走上街头，宣传北伐军的政策，散传单、贴标语，并在“福音堂”召集了500余人的群众大会。会上政治部负责人作了报告，宣传北伐的意义，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打倒军阀，并要求城内群众不要害怕，照常工作。通过北伐军的宣传和人们亲自接触，群众感到北伐军亲切可人，值得拥戴，便自发地在街上设立茶水站，还组织书写张贴“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吴佩孚”、“欢迎劳苦功高的程军长”等标语。

北伐军每到一地都把协助地方建立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权作为自己的一项工作。不几天，在北伐军帮助下，成立了国民党青阳临时县党部，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随即，临时县党部在北伐军领导下，发动全县各界人民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群众达千余人，人们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一时间，口号声响彻青阳上空。其后，北伐军经木镇向南京方向挺进。在北伐军的影响下，本县先后建立了县农协、商协、青年学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农协会负责人为方略年、陈笑凡、吴金水；商协会负责人为孙祥明、胡维屏；青年学会负责人是江松庭。

北伐军的到来，对青阳是个震动，燃起了青阳人民创造新生活的希望，激发了青阳人民投身革命的热情，增强了青阳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信心。

第四节 青阳人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

随着北伐军在战场取得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内出现了裂缝，并不断扩大。北伐军打败了旧军阀，又出现了新军阀，国民党中的右派反革命的面目完全暴露无疑。时局动乱之时，一些贪官污吏便乘机浑水摸鱼，大肆敛财，中饱私囊，这时期，发生在青阳县城的一起群众自发地抗击贪官污吏的斗争，是青阳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迈出的最具勇气的第一步。

1927年七、八月间，青阳县政府财经科长（姓名不详）利用

职权大肆贪污，但又唯恐事发，便乘县长去省府开会时作了假案。一天晚上，他自己砸坏房门，将橱门箱锁全部撬开，然后跑到门外喊捉贼，谎称丢了5两8钱金子和一大笔洋钱，并连夜呈报省府。

省府随即派来军警破案，忙碌了几天一无所获，财经科长唯恐其真相败露，便诬陷某小商贩偷的。军警随即逮捕了这个小商贩，严刑逼供，打棍子、上踩杠，用香火烧，灌辣椒水，商贩始终不承认。财经科长便在商贩母子两边哄骗，他对商贩说：你母亲承认了，说东西是你偷回去的。转而，又对其母说：你儿子已经承认了，说东西是他偷回去藏了起来。尽管财经科长绞尽脑汁，煞有介事的制造假象，但小商贩始终不承认，这事不久便传开了。群众极为愤恨，有的叫商贩的母亲和妻子到省府告状，还有的叫她们趁县府过堂时敲洋铁瓶上街喊冤。

两天后县府再次提审商贩，其母和妻在县府门口敲打铁瓶，高声喊冤，这时群众纷纷涌向县府，现场聚集了三、四百人。县长见势不妙，连忙退堂并关上大门，愤怒的群众砸开大门，捣毁了公堂的桌椅板凳和大轿子，科长吓得连忙从后门溜走。

事后，县府向省府报告说青阳有共产党搞暴动，省府下令搜捕共产党，一时间军警到处抓人，不两天就将监狱关满了。前后审理了一个多月，既没有发现共产党，也没有找到商贩偷窃的证据。最后迫于群众的义愤，不得不将扣压的群众和小商贩释放了事。

此事件的发生，一方面揭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以及反动势力对党和人民的惧怕，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青阳人民是不甘示弱的，是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加上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得封闭落后的青阳开始出现有利于革命的新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使青阳一些激进青年逐步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转变。一大批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青年迅速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斗行列，加入到大革命的阵营中，这是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①省立第七师范 1917年设于本县，始称安徽省青阳蚕桑学校师范科，后改名为省立第七师范，与省立七中并存。1921年迁于贵池杏花村的省立一师分校。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8—1937.7)

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安徽省临委制定了《关于安徽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纲要》指出：发展党员，建全组织是当前工作的重心。每个共产党员当前应把介绍同志发展党员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努力去做，特别是到乡村去介绍有阶级觉悟又忠诚可靠的贫雇农加入党的组织，以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加强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

正是从这时候起，青阳境内中共党组织从无到有，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发展过程。各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的罢课、罢工、抢粮、抗租等斗争此伏彼起，工会、农会、妇会、儿童团相继建立。地方党在发展组织的同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诞生了陵阳红军游击队和九华山红军游击队。对把持在青阳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在青阳地方党史中，土地革命战争这十年，是党领导青阳人民浴血奋战的十年，是极其辉煌的十年。

第一节 青阳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一、中共北乡支部

1927年4月，湖北黄冈县的中共党员曹凤山，因当地农民起义失败辗转来到青阳北乡的木镇一带，他以给人帮工为掩护，暗地开展活动。在与宣城县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便从组织农会入手，挑选先进分子发展为党员。不久，他物色了李炳辉、桂西元，下半年便发展二人为党员。之后，三人商议决定以同样方法分散活动，继而又发展了易楚青、陈清泉、黄正旺等。随后，分别在天峰山、毛田湖、长山门、毛田湖下湖建立了四个党小组。1928年初秋，以这四个党小组为基础，在酉华乡的天峰山成立了中共青阳县第一个党支部——北乡支部。这也是池州地区最早建立的党支部。书记曹凤山，组织委员李炳辉，宣传委员桂西元。

北乡支部一成立，便确定其主要任务为：发展党员，发动群众打土豪劣绅，组织农民抗租抗息，组织工人罢工等。遗憾的是任务还未付诸实施，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便在境内组织“清党”。北乡支部遂走向沉寂。

北乡支部看似沉寂了，但1934年发生的木镇油坊工人罢工和毛田湖抗租斗争，充分说明北乡支部的党员没有忘记当初确定的任务，在“自觉的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分子”的同时，也把“自己作为一个革命活动的发动者”。他们仍在继续战斗。

木镇油坊工人罢工的领导人是北乡支部党员陈清泉。当时他是大有油坊的踩饼师傅。由于他敢说敢做，在工人中有威信，许多难以维持家计的工人让他向老板袁夕阳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当时工人月工资 7 元、5 元、3 元不等，按当时米价折算，每担米 8 元 6 角 9 分，也就是说，月工资不足一担米）陈几次提出，老板都不答应，理由是：木镇开油坊不单是大有油坊一家，别的油坊从未提过增加工资的事。其实，陈心里清楚，别的油坊情况与大有油坊差不多，只是没人敢提，他想，只有联合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木镇一带油坊共有 8 家，他“走访”了 7 家（另 7 家是：木镇街上的“仁记”、“公益”，树林村的“孙合记”，酉华白虎嘴的“徐信记”，石安的天峰山、潭东潭，乔木油坊），遂提出 8 个油坊各派一名工人代表，请 8 个油坊的老板一起到木镇四平楼酒店，面对面进行谈判，工人要求每天增加 5 角钱，老板们起初不同意，于是 8 家油坊工人全部罢工，一天不答应，一天不开工。通过 3 天的罢工斗争，终使老板们作出让步，答应增加工资。

这次罢工，揭开了青阳地方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工人联合行动的威力，为青阳工人运动提供了光辉范例。

毛田湖抗租斗争的带头人是北乡支部的党员曹风山、易楚青、黄正旺等。1934 年 6 至 7 月，青阳县天无雨，河干涸，田龟裂，禾枯死，十万亩稻田颗粒无收。毛田湖的佃户其田东家（其实就是地主）都在安庆，每年到收租季节便来收租。毛田湖的佃户们，眼见庄稼无收，个个心急如焚，都在为地租担忧。此时，曹、易、黄等便“出谋划策”，提议让佃户们以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叫安庆的田东家来看庄稼。未料，田东家带来的收租人事

先拿钱从安庆府买了牌子挂在身上，作为“公差”人员来的。其中有个陈维柱，还有个姓冯的，都挂有牌子。农民们说今年田干掉了，叫他们到田里去看，他们非但不去，还说地租不交不行，那架势根本就没得商量。于是，曹、易、黄召集所有农民到场，同农民一起与安庆田东家及“公差”据理力争，要求减租。其时，还有个傅作霖，绰号“笔刀”，会写会告，他提出如不减租就告到县里去。农民们一哄而上，拽住田东家不放，田东家见农民人多，加之受灾是实情，也不敢到县里。在看了庄稼后，同意按灾情重的减租 70%，轻的减租 50%，农民抗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事后不久，国民党县政府派警察到毛田湖抓人，一共抓去 6 人（全都是抗租斗争站出来讲话的人），曹风山、易楚青、黄正旺在 6 人之列，后均托保获释。这次斗争在当时引起的震动，有力地推动了青阳农民运动的发展。

受此影响，不日，附近乔木湾洪家祠堂便发生了抢粮斗争。因旱灾，乔木湾不少贫苦农民已断炊多日，求乞无门，秉性刚直的洪广（洪秀荣）对此深表同情。于是他就直接出面为贫苦农民向当时主管洪氏公堂的洪登科借粮，洪借口自己作不了主，未允，这激起洪广极大愤慨。他毅然带领 50 余人砸开了洪氏公堂的粮仓大门，将稻谷过秤分“借”给各贫困户，大家看到金黄的稻谷，无不钦佩洪广开仓分粮的义举。然而，洪氏家族族长闻讯后十分恼火，认为洪广目无洪氏家规，于是，赶到乔木湾，先是召集各房房长商议开除洪广族籍，然后在洪氏族规一年一度的大祭之日

当众宣布开除洪广的族籍姓氏，并没收洪广家租种洪氏公堂的全部田地，驱逐出村。从此，洪广一家飘落异乡，开始过着流浪生活。此后，他很快投身革命，参加了党领导的农抗会组织，不久，便担任农抗会主任。1947年，当上乔木乡民主政府乡长。次年6月24日遭国民党杀害于杨田河滩。因其在农抗会期间，多次组织参加抢粮斗争，所以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天灾人祸加大旱，穷苦百姓遇大难。

洪广率众去开仓，地主老财吓得慌。

这首民谣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洪广的赞颂，也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二、中共青阳区委

1931年1月在青阳境内成立了中共青阳区委，隶属中共皖北特委，同年2月归属安庆中心县委，同时与贵池县委发生横向关系。有党员20多人，其中80%为农民、20%为知识分子。1931年6月随安庆中心县委一同中止（区委地址、领导人、活动情况不详）。

三、中共青阳中学支部

1932年2月，受皖北中心县委（设在桐城）的派遣，桐城浮山中学沙艮州（沙艺棠）同王松年（均是党员）一道来到青阳中学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展党员工作。经过两个月的观察了解，4月份，发展了周有荣、杜乔松、杨玉昆和一个姓叶的（南陵人）4人，同年11月份又发展了王文龙、任如宾、杜汝立、孙良卿、

孙泰岳、章志达、苏梦熊等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党支部。沙艮州任书记，姓叶的负责组织，杨玉昆负责宣传。下辖乌株山和南陵丫山两个党小组，后来又发展了林学智，党员有 20 余人，这是青阳县城区第一个党支部。期间，皖北中心县委经常派员来指导工作，指出支部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秘密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二是开展宣传工作，在师生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还带来标语、传单，让支部党员隐蔽张贴、散发，标语、传单的基本内容是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有一次，大地主江百万家失窃，国民党青阳县政府平白无故地把张代娣（更棚老板）等三人捉去，说是案犯，在乌龟坟用绞刑将三人处死。当时，适逢中心县委甘舍棠在青阳，他令青中支部就此事写了许多标语，当晚满街张贴，县政府门口连牌子上都贴了，第二天产生了不小的震动，老百姓议论纷纷，都说国民党惨无人道。1933 年 7 月，皖北中心县委吴晓指示：要通过罢课，发现积极分子，进而发展党员，于是支部借故一场球赛（青中对简易师范①篮球赛）裁判不公，组织了一个星期的罢课，结果党组织暴露，沙艮州等 6 人被学校开除，接着又被通缉。至此，支部活动被迫停止。

四、中共南阳特别党支部

1932 年，中共宣城特委派人到青阳的南阳湾发展党员，年底，在储宪章、肖吉凤参与组织下，建立了中共南阳特别支部，书记姓张，隶属宣城特委领导，这是青阳南乡的第一个党组织，有党员 11 人，多半是从皖西、鄂东地区转移来此坚持斗争的，半数

以教私塾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4年初，宣城特委撤销，南阳特支改属徽州工委领导。4月，青阳县委成立后，特别支部归属县委领导。期间，特别支部发动群众建立了几百人的“穷人团”。

五、中共陵阳特别党支部

1930年，湖北黄梅县农民暴动失败，共产党员岳子樵、胡永授转移到青阳县陵阳镇，以帮同乡程象贤放牛为掩护，秘密开展建党活动。在陵阳先后发展了宁坤山、张钧贵、程象贤、陈若愚四人为党员，并成立了党小组。1932年1月17日晚，岳、胡同以上四人聚在管冲张钧贵家，由岳主持宣誓仪式。誓词：“XXX于1932年1月17日参加C.C.P.②公开宣传，严密组织，实行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纪律，誓不违背”。宣誓后，布置了工作，重点是发展党员。1933年六、七月间，岳、胡写信与时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的同乡程智仁（詹国良、庐国香、陆则刚、夏国桢、李道平）联系，要求其将皖南的情况转报上海中央局，中央局旋即派程智仁到青阳及皖南巡视，1934年元月，程到陵阳后便在张钧贵家召开了党员会议，到会的有：岳子樵、宁坤山、张钧贵、程象贤、陈若愚、宁燕模、李梦麟、李梦熊、章翠英等，会上程智仁传达了上海中央局的指示，然后讲了形势和农村阶级状况。会议宣告中共陵阳特别支部成立，宁坤山任书记，下辖6个党小组，有党员20多人。

六、中共庙前支部

在岳子樵秘密开展建党活动期间，岳得知在青阳庙前锦村烧

窑的向彩华、吴正国、石生根、陈茂炎、谢胜标等人也是因参加湖北黄梅革命暴动失败后来青阳的，岳便于 1933 年 11 月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1934 年 2 月 21 日，程智仁、岳子樵到庙前锦村向彩华家召集会议，成立了中共庙前支部，向彩华任支部书记。当时有党员 40 多人，这是青阳西乡最早的党支部。支部建立后不到两个月，先后成立了 4 个农协小组：锦村组，组长张小毛；上河滩组，组长张有根；下河滩组，组长毕根来；小老田组，组长不详。支部组织向地主、劣绅、顽固派开展斗争，先是抗粮、抗税，进而发展到抢粮斗争。有一次在组织群众抢粮时，国民党县政府派兵镇压，并逮捕一人。支部乘势聚集百余人到县政府示威请愿，县政府迫于压力，只好放人。

七、青阳县共青团组织

詹根生，青阳人，在池州五职学校读书时，由于家庭贫寒，中途辍学，他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很不满。方演生是他的同乡同学，对詹根生的处境深表同情。五职学校当时即有地下党、团组织活动，詹根生、方演生先后加入了共青团。

不久，詹根生回到青阳后便着手发展团员。1929 年 5 月间，和他接近的青年许子华、周大德、许润生、周先达、徐永红、鲍朝金、陈伯寿等先后都由他介绍参加了共青团。至此，青阳便有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团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利用傍晚乘凉的机会，集中在“儒学”前，听詹根生讲解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介绍外地共产党铲富济

贫的事情，借以启发团员的觉悟，提高认识，增强对土豪劣绅的仇恨，方演生每次放假回家也一起参加团组织的活动。

青阳共青团组织除向团员进行革命理论教育外，还开展了一项主要活动：利用晚上时间，发动并领导团员在青阳城四面八方贴标语，最多的一次贴了70多张。标语的内容是：“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打倒祸国殃民的蒋介石”、“打倒反动的南京政府”、“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农政府”、“实行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改组派”等，落款为“青阳青年团”。这一行动不仅震动了青阳城，还惊动了省府。

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王之觉在接到青阳县政府上报的材料后，指令青阳县长加紧侦缉。“呈报件均悉，布以督饬警团，随时严密防范，注意侦缉，务将粘贴此项标语之共党破获究极，以遏乱萌，勿使潜匿，构煽为要。切切此令。”随即詹根生离开青阳，共青团组织也停止了活动。

同年11月，詹根生回家时被捕，不久，方演生也被捕入狱。国民党青阳县政府派兵将他们押到安庆监狱。方被其父花钱托人保了出来。詹被送到反省院，直到1935年才释放。就在这段时间里，青阳来了个肃反专员洪剑侠，化名刘梦樵，他将许子华、许润生、周大德、徐永红、陈伯寿、鲍朝金、吴海渊、周先达8人关押反省，青阳共青团组织，从此解散。

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是青阳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具有决定

意义的新起点，为党领导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中共皖南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与活动

“中共皖南工作委员会”（亦称“安徽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皖南工委”）是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批准成立的，是见于中共上海中央局文献资料记载的青阳最早的中共党组织，也是安徽省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中共党组织之一。它开始（成立）于青阳的陵阳，波及“8县1市”（即：青阳、太平、石台、铜陵、南陵、贵池、泾县、芜湖县、芜湖市）。在工委领导期间，在皖南以青阳为中心发展了六、七百名中共党员，建立了1个特区委、1个区委、2个特支、25个直属支部和若干党小组。作为土地革命时期青阳第一个且直接受中央局领导的地方党组织，皖南工委的建立，成为这一时期青阳地方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亮点。

一、皖南工委的建立

1934年元月，程智仁在帮助建立中共陵阳特别支部后，与岳子樵分别巡视了青阳的木镇和杨田、石台县、泾县、太平县，并派人到芜湖码头、繁昌县的荻港，铜陵大通和悦洲以及蚌埠活动，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些党支部和党小组。

2月中旬，奉上海中央局指示，程智仁赴上海汇报了皖南各县和地区的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上海中央局根据程的汇报，决定成立“中共皖南工委”，并决定了工委组成成员和分工，指派程智仁返回青阳实施。

1934年4月13日，中共皖南工委在青阳的陵阳白沙岭宛金瑞家宣布成立，会场挂了列宁画像。到会的有程智仁、岳子樵、宁坤山、陈惹愚、张钧贵、程象贤、宛金瑞7人。会上，程智仁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关于建立皖南工委的决定和工委组织分工，并就国内国际形势和工委的任务作了报告。会议决定：委员会由程智仁、岳子樵、宁坤山、张钧贵、陈若愚、曹耐寒（未到职）6人组成，程智仁任工委书记，岳子樵负责宣传，宁坤山负责农运，张钧贵负责组织并兼任对上海中央局的联络工作，陈惹愚负责青运工作，曹耐寒负责妇运工作。

二、组织发展及活动情况

（一）组织发展

皖南工委下属组织基本分布在皖南山区及沿江一带，大致情况是：

1、青阳县：工委成立前，陵阳陆续组建了6个党支部，党员上升到60余人，遂于1934年6月3日改陵阳特别支部为陵阳区委，宁坤山兼任书记，下辖河东、河西、街道、所村等5个支部，其中街道支部书记陈若愚，所村支部书记徐良如，陵阳区委成立后，当月成立了共青团陵阳区委，团区委书记陈若愚。同期，岳子樵又在木镇建立了4个支部，不久就组建了木镇特支，有党员32人。此外，杨田建有1个支部，有党员5人。庙前党支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达40余人。总计这段时间青阳县建有1个区委、1个特支、2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员137人，到最盛时

期党员达 300 余人。另外，在陵阳还组建了农委会和河东、河西雇农分会，妇委会，店员工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木镇建立了油坊工人工会。

2、太平县（现黄山区）：该县的党组织是由岳子樵和王国治建立起来的，由岳分工负责，王具体发展组织并开展活动，至 8 月份共建有 10 个支部，即：杜家村支部、盛村支部、苦竹桥支部、峻岭支部、秧溪河支部、乌沙坞支部、石垄山支部、燕窝巢支部、赵家垄支部，共有党员 224 人。1934 年 7 月中旬皖南工委部分领导人被捕后，主要由岳子樵在这里领导活动，岳被捕后，一部分支部消失，一部分支部同皖南特委接上了关系并受其领导。

3、石台县：该县组织发展工作也是由岳子樵先建立起来的，程智仁来皖南后曾和岳子樵一起在石台活动了一段时间，先后建立了 1 个特支，10 个支部、两个直属党小组。即：八部支部、夏村支部、石台城边 2 个支部、七都（一说六都）支部、石台一、二、三 3 个支部、乌石垄支部等，石台国民党县政府内 1 个直属党小组，洋桥对面 1 个党小组，共有党员 64 人（乌石垄支部和 2 个直属党小组无党员数字记载）。

4、泾县：该县的党组织同样是由岳子樵、王国治和田丰参与建立的，先后成立了 10 个党支部，至 1934 年 11 月，经过整顿组建了 7 个党支部，并成立了特区委员会，书记田丰，共有党员 199 人。

此外，南陵有 1 个支部，党员 3 人。芜湖市先是由张彪建立了 1 个支部，至 1935 年 1 月改建为芜湖特支。工委还在铜陵县的大通和悦州开设了洋袜厂，内有 1 个支部，有党员 5 人，该支部是工委和上海中央局交通联络的中转站。贵池县的梅形冲有 1 个支部，党员 3 人。并曾在蚌埠建立过联络点。

（二）活动情况

皖南工委组织活动方式是秘密隐蔽的，规定每个党小组以 3 人为限，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除 5 日一会外，平时只由党小组长找个别党员谈话，检查帮助工作。规定每大村成立一个支部，小村则合并成立（一个）支部。工委还规定了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等负责人的职责范围。在它存在短短的、曲折的一年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工作：宣传工作是皖南工委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主要措施。工委一成立便规定各地要组织党员学习“中共五中全会决议”、“二苏代会③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党员常识”等，选择有关文章在支部或党小组会上阅读，并编成小的册子，作为训练党员的基本材料。

除此之外，1934 年“五一”和“五卅”还分别组织了两次“标语运动”，贴出了“反对国民党出卖民众利益”等 30 多条标语，并从上海中央局带来了《红旗通报》、《游击战争》、《支部生活》、《中国工农红军》、《党员任务》、《阶级斗争》、《斗争》和《斗争号外》等刊物，为基层党组织提供“精神食粮”。同时，妇会、

儿童团还组织群众学唱《国际歌》、《庆祝苏维埃》、《伤心事》、《痛苦吾农民》等歌曲，并走村窜巷教其他儿童、学生唱，起到了从思想上武装群众的作用。

2、群众工作：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群众组织（如农协会、店员工会、妇会、儿童团、青年团等）也发展很快，仅青阳一地各种群众组织成员达 2000 余人。工委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因势利导，通过各地党组织发动领导群众与国民党以及地主恶霸进行斗争，如木镇的葛甫潭、荷花冲和杨田埂等地农协会在当地党支部的领导下，先后通过农会选出代表向地主借粮，遭到拒绝后，党组织一方面号召农民砍伐地主的树木变卖钱款买粮度饥荒；另一方面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迫使地主拿出粮食。杨田、庙前等地索性组织了抢粮斗争，给地主阶级以有力的威慑。

3、七县民众反对修殷屯公路的斗争：皖南工委自成立到 7 月中旬前所属各地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并逐步连成一片，为以后大规模行动创造了条件。此时，工委不断派人到上海中央局接受训练，中央局也派来谢巡视员（名不详）指导工作，配合工委开展对敌斗争。

1934 年国民党开始修筑殷（家汇）屯（溪）公路，当时正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中央局和工委认为，国民党修筑这条公路的目的是为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运输兵源和物资，因此对我方极为不利；其二，修路需要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将要毁田万亩以上，每户要出钱出工。当时正值青黄不接，人民

群众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哪堪忍受加税增伏之重负。针对这种情况，皖南工委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在上海中央局派来的谢巡视员的协助下，决定号召沿线 7 县人民行动起来，反对修筑殷屯公路。在具体领导这场斗争的策略上，工委决定组织上以七县民众反对修路大联盟的名义，组织村联盟、乡联盟、区联盟等，以沿线被拆屋、毁田、扒坟的群众为主要力量，宣传上不提党、苏、红军等字眼，纯粹以所提出的中心口号发动群众，凡赞成并愿意参加斗争的不受限制，结成统一战线。以最贫苦的群众为中坚，同时防止地主、富农可能的不利行为。工委领导进行了划片分工，各地的党组织遵照工委的部署行动。不几天，皖南七县（贵、青、太、石、黟、歙、休）民众便联合起来展开了反对国民党修筑殷屯公路，反对国民党毁田、拆屋、挖坟、勒捐、派工、封粮的斗争。期间，工委还发布了陈若愚和谢巡视员起草的“皖南七县民众反对修筑殷屯公路的宣言”，并组织七县民众统一行动，在同一个晚上将测量标记等全部毁掉，沿线散发了大量传单，张贴标语，青阳还将标语贴到了国民党县府内，迫使国民党推迟了修路计划。

这一斗争是一次壮举，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客观上起到了对苏区支援的作用，在皖南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附： 皖南七县民众反对修路大联盟宣言

这几年的水灾、旱灾、兵灾和帝国主义进攻的灾害，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加重，已经

弄得我们一年不如一年，大家穷得不能开交了。

看啊！人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县长是不许我们群众活命啊！国民党不把兵力开去打日本，不把人力用去修江堤，不把财力拿来救济我们的穷困，总之，他不作救国救民之事情，却要劳民伤财修汽车路来害国害民害我们穷人，汽车路未曾开工，就要我们出钱，逼得我们当借无门，强迫派工，逼得我们不能种田，挖我们的祖坟，拆我们的屋，害得我们没有田种，没有屋住，连我们死了的祖先也不能安，这就是活活把我们逼死，死了的祖先还要充军，这是何等凶恶啊！

汽车路修通起来了，我们就要时常遭受兵灾拉夫、奸、掠、抄、杀的灾害，只有死于帝国主义的货物到山里倾销，帝国主义的兵直接可到山里来进攻我们，我们老百姓，我们穷人的粮食出产是卖不到钱，种田的没有田种，卖力的没有人要，做生意的没有生意，只有穷得更快，在帝国主义进攻的时候，更快的做亡国奴！这么不许我们老百姓活命，要把我们穷人饿死！而国民党、大资本家同外国人可以坐汽车享福，赌钱快乐，他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穷人的灾难。

穷朋友们：你们不愿死，不愿做亡国奴，要保护自己的命，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我们百万人一致团结起来，同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拼命，反对修汽车路，不得胜利不止。

起来，池州各县的百万民众，同徽州百万民众联合起来，组织反对筑路大联盟，我们的口号是：1. 反对毁田、拆屋、挖坟；2. 反对勒捐；3. 反对派工；4. 反对封粮！屯集修路的粮食，拿来救济春荒！

我们的行动要：1. 自动组织起来扯掉路线标志；2. 游行示威，反对修路！3. 捣毁修路工程一切办事机关；4. 联合帮助我们的甲长、保长，反对破坏我们组织行动的甲长、保长！一致反对帮助修路强迫我们的联保主任和区长！5. 反对武装压迫，组织群众的武装自卫！

民众团结自救万岁！

皖南七县民众反对修路大联盟筹备会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

三、皖南工委终止

反修路斗争胜利后，工委辖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

人民群众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感到了威胁，他们调兵遣将伺机镇压，并派出特务四出活动，搜集情报。由于在以往的斗争中工委采取了一些过激的做法，党组织有时直接处于斗争的前列，在斗争中有时以党的面目出现，写传单、贴标语时“左”的口号过于明显，这样就使党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这种做法受到了上海中央局的批评。然当时皖南工委正处于幼年，工委领导人尚缺乏秘密工作经验，因而工作热情虽高，但方法欠妥。另外，在发展组织方面有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具体工作中强调斗争的多，打击面过大等等，加上工委没有武装作后盾，所以遭到破坏是难以避免的。

同年7月中旬，国民党青阳县政府和国民党八十八师孙元良部队以及各邻县国民党地方武装联合行动，采取了大规模的镇压措施，首先在木镇、杨田、陵阳逮捕了一批抢粮的农民和罢工的工人，借以扩大线索，逐步深入到皖南党组织。7月19日，由于陵阳一个姓宁的告密（曾被工委列为建党对象，宁坤山找其谈过话），皖南工委宁坤山和陈若愚被捕。7月22日，工委书记程智仁在青阳杨田青石岭被捕。由于张钧贵去上海汇报工作，岳子樵去太平、石台检查工作而幸免于难。紧接着工委下属组织接二连三遭破坏，大批党员和群众被捕，陵阳、木镇、杨田破坏得尤为厉害，泾县、太平、石台等地的党组织也先后停止了活动。这一事件发生后，岳子樵、张钧贵无法在青阳立足，便撤到泾县、太平、石台隐蔽活动了一段时间。岳曾在太平约见过张，商量与

中央局取得联系的事情，由于张当时处境和家庭生活都很困难，他俩决定另派交通员去上海联系，但中央局不承认新的交通员，一时失去了联系。此间程智仁在狱中传出两封信，告诉岳要努力工作，并说宁坤山和陈若愚在狱中表现很好。但岳此时处境也非常困难，加上和中央局失去联系，又无经济来源，工作难以开展。尽管如此，这段时间岳还是不遗余力地四出奔波，先是在泾县和地方组织一起，开展了群众工作，后又到陵阳恢复了个别党支部，遂逐渐将中心移至陵阳，并着手准备 10 月 20 日举行泾县、青阳的部分地区农民暴动，先后与泾县陈光胜取得了联系。10 月 18 日皖南特委派人到陵阳，了解皖南工委的情况，岳向他讲述了暴动计划，特委派来的人劝岳放弃，并要岳不要打草惊蛇，以免影响整个皖南的计划。不久岳向中央报告，要求合并皖南的党组织，请中央解决干部、联络、经费等问题。11 月份，宁坤山、陈若愚出狱，（程智仁押往安庆关押），陈出狱后不久就脱党，宁则和张钧贵一起开展恢复党的组织工作。月末，在陵阳又恢复了两个党支部，同时在泾县、石台、太平等地恢复了大部分组织，因同上海中央局联系不上，故活动没有进展，特别是与皖南特委之间没有建立组织关系，以致工作很不协调。这时，张钧贵亦逐步脱离党组织，所以皖南工委的实际工作由岳子樵一人承担。年底，岳赴上海找到临时中央局，1935 年 1 月返回芜湖时在芜湖码头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芜湖特支，又奔赴大通活动，不日转道陵阳，11 日到达木镇召集 4 人成立了木镇区工委，岳兼任书记。随后

活动到涧北桥的童家冲，一段时间后又前往庙前与向彩华等人取得了联系，拟进一步恢复组织。4月到袁家冲参加会议时，被国民党八十八师孙元良部队逮捕，不日岳子樵等在青阳县城南门外被杀害。而在此之前宁坤山在战斗中牺牲，陈若愚、张钧贵停止了活动，程智仁仍关押在安庆。工委失去了领导，下属组织有的被皖南特委接管，有的自行消失。至此，皖南工委活动终止。

皖南工委虽然只坚持了短短一年时间，但她使青阳和其所辖其它地区相对独立的分散的地方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上升到相对集中统一的高度，使这些地区的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斗争从个别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为后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节 中共青阳县委的建立与活动

1931年11月，中共徽州工委在秋浦县（今东至县）雁落坡成立。1932年11月，已与徽州工委发生横向联系的中共赣东北省委改组为闽浙赣省委，其活动区域扩大到皖南。经中共中央同意，徽州工委由隶属中共临时中央局转属闽浙赣省委。为了加强皖南党的工作，闽浙赣省委将徽州工委改组为皖南特委。此后，皖南特委曾一度遭破坏，1933年冬，闽浙赣省委派省总工会秘书长李杰三到屯溪，秘密重建皖南特委，李杰三任特委书记。在皖南特委的领导下，皖南各地的党组织发展很快，工农运动也如火如荼。

一、县委的建立

皖南特委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形势，波及到了青阳庙前地区，特别是其在太平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做法，深深触动了庙前的党支部，支部负责人深感自己的工作还很保守，进展不快。为尽快打开局面，便主动派人到太平联系，以学习经验，在与石青太中心县委接上关系后，石青太中心县委经请示“皖南特委”，同意帮助庙前支部开展工作。这样，庙前地区的党组织逐渐靠向“皖南特委”。为避免交叉，皖南工委便放弃了对庙前地区的领导。

1934年4月，皖南特委指示石青太中心县委派汪少球、周振起和休宁县第一区委书记吴正国到庙前地区正式开展工作，同时，派皖南特委少共书记苏承平（苏承品，江西人）进行指导，并带来了20余人（枪）配合开展武装斗争。同月，第一个“中共青阳县委”在庙前小杨冲建立（5月底县委机关转移到庙前言西冲），汪少球担任县委书记（之后石生根接任），副书记周振起、吴正国，组织委员陈敬如，宣传委员陈金保，秘书石生根。县委属石青太中心县委领导，同年6月石青太中心县委改为太平中心县委，县委属太平中心县委领导。

二、组织发展及活动情况

组织发展：县委成立后，及时建立和完善了下属组织。分别是：

中共江梅区委，驻地袁家冲，书记陈敬如，7月份改由石耀才担任，有党员40余名，下辖3个党支部：第一支部书记苏本

善，第二支部书记刘宗贵，第三支部书记郑安邦，每个支部下辖3个党小组。

中共庙前、陵阳、南阳区委各下辖3个党支部，每个党支部下辖3个党小组。

共青团庙前区委，书记张义发，组织委员周金水，宣传委员毕根来，委员：鲍得州、刘福如、吴金根、陈金定、向水生。

九华山红军游击队，队长陈树枝（绰号“野猫”）。

6个县委交通站分别设在（1）分水岭靠福胜堂东边冲里姓何的家（2）陵阳马路西水碓边程象贤家（3）木镇杉木岭陈和寿家（4）九华山闵园陈白毛家（5）庙前沙埂石益才家（6）广胜张得才家。

活动情况：县委成立后，很快投入到实际革命斗争中去。由于县委是在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开展工作，因此斗争必须紧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同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镇压，也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这样农民工作和武装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以此作为县委工作的重中之重。

发动农民首先从宣传工作入手，向他们讲清革命道理，如“穷人为何穷，富人为何富”等，启发他们阶级觉悟，使他们从蒙欺受骗中觉醒。有了一定基础后，便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派党员进去领导工作。这样农民协会组织发展很快，至1934年底每个区委都建立了4至5个农民协会组织，共有五、六百个会员。农民协会在区委的直接领导下，一是开展宣传工作，如贴

标语、散传单，标语、传单的内容是“打倒土豪劣绅，穷人要翻身解放”等；二是担负县委、区委和游击队的情报交通工作，搜集国民党特务和自卫队的活动情况，为游击队、红军提供情报，摸清当地及周围地主劣绅的底细，为“借粮”、“借款”提供行动目标，以利游击队、红军战胜攻取、举无遗策。

为了壮大县委领导的武装组织九华红军游击队。县委发起了参军运动，主要从农协会中挑选精干的会员参加游击队，枪支弹药大部分从民间收买。另外，县委还从游击队中选拔许多优秀战士，输送到“皖南特委”领导的红军独立团。1934年底，九华红军游击队武装扩大到百余人，在队长陈野猫的率领下，经常在九华、庙前一带打击土豪劣绅、配合红军独立团的行动，并多次袭击了来九华一带骚扰的孙开梅的自卫队。保障了县委和各区委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县委的终止

1935年4月，太平中心县委派汪少球等2人来青阳找石生根联系工作，在经过九华山闵园时被国民党特务左欢乐跟踪。次日早晨，青阳自卫团包围了袁家冲，将正在苏本善家整理文件的县委书记石生根和县委交通员陆老三、陆老四当场逮捕，押送到驻陵阳的国民党军八十八师。石生根等被捕后，为研究营救工作，县委在袁家冲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岳子樵和陵阳、木镇党组织被破坏后转移到庙前地区的陈敬如、石耀才、苏本善、刘宗贵等11人。由于叛徒告密，会场遭到八十八师和孙开梅自

卫团士兵包围，与会人员全部被捕。次日九华游击队队长陈野猫从九华山来袁家冲送信，在苏本善家中埋伏被捕。被捕人员押到青阳后，查清了岳子樵、石生根、陈野猫的真实身份，不日就将他们杀害于青阳城南门外。其余作共党嫌疑分子全部交保释放。至此历时一年时间的青阳县委遭彻底破坏。游击队长陈野猫被捕牺牲后，游击队大部分队员都转移到石台参加了“皖南特委”领导的红军独立团。

第四节 红军途经陵阳及地方红军组织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野心不死，触角仍在延伸，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方面对日寇的侵犯退让妥协，另一方面却加紧镇压工农武装革命。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军队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面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新变化，1934年夏，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1934年11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红七军团与闽浙赣军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保卫老苏区，出击浙皖边创建新苏区，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十军团团长，原七军团政委乐少华任十军团政委，原红七军团整编为第十九师，寻淮州任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英任政治部主任。红十军整编为第二十师，师长、政委由军团司令、政委兼任。同时苏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方志敏由省委书记改任苏维

埃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调任军区参谋长。为加强大部队外线作战的领导，决定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 5 人组成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

一、方志敏率红十军团路过陵阳

红十军团在方志敏等军首长的率领下，于 1934 年 11 月至 1935 年 1 月转战于浙皖边、浙赣边和皖南地区。1934 年 12 月 13 日，红十军团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挺进。次日，在太平谭家桥打了一场伏击战。15 日经旌德庙首、孙村向泾县茂林转移。16 日经茂林折向西，进至太平新丰一带。17 日路过青阳县陵阳镇。

智袭泥田岭：得知红军要路过陵阳，国民党驻陵阳的自卫团团团长孙开梅派排长吴炳霖带 30 多个团丁先到青阳与太平交界的泥田岭（离陵阳 10 里左右）埋伏。一是为了躲避，二是伺机交战。

富有作战经验的红军派出 1 名女侦察员，化装成岭上苏“苏百万”家里的人，坐着轿子，一帮“随从们”带着东西，径直上了岭头。吴炳霖盘问，她以“躲避红军，投奔亲戚”搪塞过去。女侦察员下岭后立即将侦察情况报告了红军指挥员。红军先头部队化装成逃跑的大地主，有的坐轿子，有的背着东西，踉踉跄跄地奔泥田岭而来。行到岭上，吴炳霖刚想盘问，所有抬轿的、坐轿的、背东西的，在“打”的号令下，一齐抽出短枪，兵分 3 路，

向团丁们射击。排长吴炳霖见势不妙，带领几人逃走，其余团丁有的举手投降、有的在逃跑时被打死。孙开梅得知兵败，排长又逃走，自己也躲进了青阳县城。这一仗共俘虏 23 人，缴获手提式轻机枪 2 挺，步枪 20 多支。

陵阳街上的土豪劣绅、保、甲长们，此时象热锅上的蚂蚁，不惜花一块钢洋（银元）一里路的高价雇轿子，争相外逃，弄得镇上鸡飞狗跳。来不及跑掉的，便提心吊胆地东躲西藏。大地主宁维汉躲进屋里紧关大门，手握两支短枪，紧张地在院内来回打转，红军战士翻墙进去将他擒获。

播下革命火种：红军要路过陵阳的消息传来，街上的店员、职员、手工业者，学校的教师、学生以及十里八乡的老百姓纷纷赶来迎接红军。

红军从当天 8 时左右分几路纵队经过陵阳，前看不到头，后看不到尾，日暮还在继续挺进，并吹着军号，借以答谢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军宣传队则到处张贴标语：“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封建！打倒蒋介石！全体人民站起来！”有的战士向群众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铲富济贫的，还告诉群众，江西的地主恶霸都打倒了，他们的土地已分给了穷人。

当地群众自动设立了茶水站，有的并用绒布做成袖章戴着，有个叫兰球松的整整一天都在跑前跑后给红军端茶倒水，当晚 11 点左右，红军有个营长还请他吃了饭。

红军司令部设在街上“春和号”内。方志敏（当时还在病中）

穿着一件“豆沙”色毛衣，站在“春和号”门口，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他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我们中国来了，我们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去打日本侵略者的，为乡亲们保家园的，可是蒋介石反动派不去打日本侵略者，反而来屠杀红军，屠杀老百姓，我们能坐等国家沦亡吗？当然不能！所以，大家要行动起来，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蒋介石！”话未落音，“红军万岁”人群中爆出口号，接着“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口号声一时响彻山镇。这天，陵阳街上商店照常开门营业，许多红军人员趁休息时间上街买东西，有的用银元，也有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印制的纸钞，通称“红票”。这事很快被方志敏发觉，他立即命令随军政治工作团工作人员黄礼华等，挑着银元，挨店号询问，以“一比一”比价换回“红票”。足见方志敏治军何等严明。

“春和号”对面是猪肉豆腐店，有个工人叫吴良元。方志敏的警卫人员备了面、鸡、肉等请他代做面食，警卫战士带吴进入“春和号”帐房内，吴见一路有4道岗哨，里面坐着一个穿黄呢军服的人，旁边站着两个警卫员，心想，这个官肯定不小。方志敏见吴进来，和蔼地问长问短，并对吴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革有钱人的命，江山打过来，穷人当家作主，就不再帮工了。吴见方平易近人，打心里敬佩。下午4时许，方志敏骑上白马（另还有1匹枣红马）率部向南阳进发。途中在所村宿营，司令部设在“太平山房”，方志敏住在陈先庆家，地下党桐山（所村）支

部书记徐良如协助警卫人员布岗设哨。当晚，在九华山开会的皖南特委老李（名不详）和储宪章赶来向方志敏汇报了皖南党组织活动情况，直接聆听了方志敏的指示。次日清晨，部队又向前挺进，李和储随部送行。当先头部队行至六都高路亭附近的老虎亭时，意外与国民党十一路军相遇，因敌强我弱，部队不得不停止向七都方向前进。当夜沿清溪河撤至太平柯村根据地。在与李、储分别时，方志敏掏出丝绢赠于储以示纪念，并勉励储、李要继续发动群众坚持斗争。

红军路过陵阳时还严惩了恶霸地主、劣绅。如：商会会长陈月华、“春和号”大老板胡宝和、奸商兼地主宁致革、宁庆云、恶霸地主宁维汉等，并把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当场分给贫苦农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为了表达对红军的热爱、崇敬和怀念之情，当地群众自编了一些歌谣在民间传唱，如：“打倒土豪分田地，气死地主和劣绅”，“保甲长、颈子痒，红军到，头要掉”等。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二、陵阳、九华红军游击队的建立与活动

陵阳红军游击队和九华红军游击队这两支武装组织是中共青阳地方党组织的武装组织起源。

陵阳红军游击队：红军路过陵阳时，皖南工委宁坤山等人找到方志敏，汇报了青阳党组织的建立和被破坏情况，要求帮助建立武装组织。方志敏听后叫红军某师政治部主任胡继庭挑选一个

班的战士（11人11支枪）由宁坤山领导活动。不日，宁坤山率部回到陵阳，将原有的张大连、宁坤强带领的小游击队与其合并，正式组建了陵阳红军游击队。队长是一个老红军（太湖人，姓名不详），指导员宁坤山，副指导员也是一个红军，整个游击队共18人。任务是：就地搜集枪支弹药，发展组织，以陵阳为中心展开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

1934年末，陵阳红军游击队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以后发展到40余人（枪）。一天，太平红军游击队派杜富荣、杜江水送密信到青阳，请陵阳红军游击队前去协助暴动。

12月20日夜，宁坤山带领陵阳红军游击队匆匆赶到章冲，与太平曹祥麟、汪文波、雷金海等会合，随即在章冲杜江水家召开会议，宣布暴动计划：（1）惩处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排有具体名单）；（2）袭击岭下大地主苏百万，夺取苏家枪支弹药，以武装红军游击队；（3）暴动后去向视情而定，或向江西苏区转移，或在当地建立新苏区。同时，还宣布了暴动的路线和组织纪律。会议决定，由曹祥麟任暴动总指挥。宁坤山作了会议总结，他说：“同志们，革命的暴风雨已经到来了，我们要勇敢地到暴风雨中去接受考验！今天晚上，我们的铁拳头就要把这一带的土豪劣绅打个稀巴烂，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扬一扬我们的威风！”④

当宁坤山带领队员们冲进“苏百万”家大院时，只有苏的儿子在家，游击队缴获了4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一批弹药。次日

晨游击队返回在一座山腰的庙宇里休息时，被国民党八十八师 1 个营包围。实际上自陵阳红军游击队成立之时起，国民党青阳县政府就感到恐慌不安，下令国民党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坐镇陵阳，亲自率部“围剿”，并派密探四处搜集情报，因此当太平之战发生时，孙部早就获悉游击队的行踪，遂即调兵遣将追至太平，将游击队包围。当游击队发觉时包围圈已经形成。宁坤山命令部队迅速抢占制高点，战士们勇猛冲上山顶，占领了 3 座小山，居高临下阻击多于自己几十倍的国民党军队。战斗自晨至暮，游击队弹药将尽，八十八师调动十几挺机枪组成火力网，对游击队形成钳击之势。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宁坤山命令部队将外衣脱下，挂在树枝上立即转移，冲出包围圈，他自己则带几名战士殿后掩护。此时八十八师已至游击队阵地近旁，宁坤山身中 3 弹，仍在坚持战斗。八十八师很快占领了游击队控制的 3 座小山，用机枪猛烈扫射。天黑游击队分撒突围后，陆续到达指定地点，队员们没有看见指导员。正欲寻时，只见副指导员手提两支枪气喘吁吁赶到，战士们忙问指导员的行踪，副指导员沉痛地告诉大家，为掩护部队转移，指导员牺牲了。

这一仗后，八十八师在陵阳到石台、太平一线布防得更加严密，游击队转移到贵池边界休整，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产生了新的领导人，布置了今后的斗争任务。由于宁坤山牺牲，加上八十八师连日“围剿”，部队行动十分困难，这时游击队还剩下 20 多人，在朱有理的率领下于 1935 年 2 月活动到贵池齐村

柯，与贵池、石台游击队汇合成立了青（阳）石（台）贵（池）游击大队，共 170 余人。月底，青石贵游击大队一部（原陵阳红军游击队）奉命返回青阳活动，在九华山活捉了国民党安徽省宣传部长，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1935 年春，陵阳红军游击队扩大到 150 人，组建了一个连，连长王宏根，副连长何少传。此后游击队又扩大到 250 人。1936 年初，青石贵游击大队奉皖浙赣省委的指示，向宁（国）宣（城）一带进军，陵阳红军游击队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九华红军游击队：1934 年 4 月初，青阳县委成立后，在皖南特委少共书记苏承平带来的 20 余人（枪）的基础上，发动、鼓励参军，建立了“九华红军游击队”。当时参加红军的有百余人，全部都是共产党员。其主要任务是在县委领导下打土豪、借粮、借款、扩充武装等。

初战是打杨家河一个姓鲁的土豪，游击队派了 1 个班，晚上到鲁的家里，鲁出去了，只搞到 12 块洋钱。一次，游击队攻打国民党青阳县自卫团 1 个排的驻军。由于事先农协会会员把情况搞得一清二楚，游击队不到个把小时就结束战斗。缴获了十几条步枪、两挺机枪、1 部电话机；还有一次，孙开梅部 1 个中队到庙前来“清剿”，农协会将情报及时报告了游击队，游击队埋伏在他们必经之路，狠狠地打击了孙开梅的自卫团。九、十月间，由县委干部亲自带队，游击队组织五、六十人袭击了九华山自卫队，缴获步枪 18 支，机枪 2 挺。

1935年4月，青阳县委被破坏，游击队长陈树枝等被捕，后皖南特委决定将这支武装并入了皖南红军独立团。

三、南阳“穷人团”

南阳“穷人团”始称南阳“穷人会”。1931年，早期党员闻宗波（大老闻）、王树思、王泥从潜山来到南阳，分别以货郎担、行医、教书为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经过秘密发动，于1934年上半年组织了以徐小宝、柯小二、鲍永烈等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为基础的“穷人会”，之后，又发展了鲍平心、鲍桂有、王生等人，领导他们与地主、土豪劣绅做斗争。主要内容是：抗租抗息，抗抬高谷价，为穷人鸣不平。“穷人会”很快发展到30多人，后来，王树思离开“穷人会”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一次，王树思等17名游击队员来到“穷人会”筹粮，柯小二白天到南阳街进行了侦查，当晚11时左右，由柯小二带路，王树思率领游击队，冲进作恶多端的联保主任鲍国祥开的“小泰漕坊”（兼营布什）内，缴获了一批布匹和现金。1934年底，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路过陵阳经南阳进入石台，这一路“唤起民众”，使得南阳群众的革命热情迅速高涨起来，加之宣传上说加入“穷人会”就是加入红军，一时间入会的人越来越多，“穷人会”随即改成“穷人团”。徐小宝任团长，柯小二任副团长，鲍永烈任组织委员。这时，“穷人团”实际上已成为青阳地方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外围组织。

“穷人团”，顾名思义是穷人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

都是一些无田无地，出卖劳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开会多半在山头上，在徐小宝家也开过几次会。会议内容主要是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说明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地主的剥削，反动派的欺压，只有打倒地主，打倒反动派，穷人才能翻身。会上，除宣传些革命道理外，就是布置工作。

“穷人团”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国民党地方军政情况，搜集地主、士绅等占有土地及利用土地放高利贷剥削农民的情况，然后将搜集来的情况向红军游击队汇报，有时给红军游击队送信、打听消息。

红军经陵阳到南阳时，“穷人团”曾赶到三溪口迎接，派人搭棚，送柴送米，给红军作向导。

1935年4月13日，“穷人团”干部在柯家村柯小二家开会，主持这次会议的是从贵池刘街乡齐村柯来的柯某，他身上还带有短枪。会上主要讨论集体参加红军大部队的事情，由于警惕性不高，关门开会，屋外没有放哨，叛徒鲍有金告了密，国民党八十八师派来一个连，包围了会场，当即捕走了徐小宝、柯小二、王根银、鲍永烈、柯少仁、柯小佩6人。主持会议的柯某从后门冲出，被国民党伏兵乱枪打死，手枪被抢走。21日，徐小宝、柯小二、王根银被国民党枪杀在青阳南门外乌龟坟，同时被抓走的鲍永烈、柯小仁在徐小宝等牺牲的刑场上陪斩后释放。不久，国民党保长陈世康、联保主任项德如报请青阳县政府派来国民党军七十八师一个连的部队，由连长谭凯带领进驻南阳，办理“红军

地方人员自首登记”。谭在南阳召开群众大会，拿出参加“穷人团”的名单，点名扣留，听候审讯。“穷人团”的组织从此解散。

①简易师范学校，全称为省立陵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址是陵阳镇崇真观。

②即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③二苏代会是指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④《中国共产党黄山区简史》2001年6月第一版第38页。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

(1937. 7-1945. 8)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呼吁停止内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经过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同年8月,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将南方八省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岩寺集中整编后,皖南特委机关随新四军军部迁至泾县云岭。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青阳地方党组织在中共皖南特委的领导和新四军政治部的领导下相继恢复,并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第一节 青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抗战初期青阳的政治形势

1938年初,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日寇,直接侵入青阳境内,穷兵黩武,铁蹄所至,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他们占领了陈家大山,即派飞机逐日轰炸青阳城乡要镇。此间,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千里跋涉来到青阳,开始了抗日救亡的宣传。他们分别在县城、木镇等地向群众历数日军残暴行径,哭诉日军在东三省的滔天罪行,呼吁同胞们动员起来,把日本兵赶出去!同时,他们还在城乡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话剧,组织儿童团教唱《义

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一时间青阳城乡争相传颂，颇具影响。与此同时，由11人组成的“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由重庆顺江而下，到青阳从事群众工作和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当时，青阳“战地服务团”团长徐银轮（中共党员），总干事钱季青遂率团与他们联合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群情激愤，怒火中烧，形成了青阳人民反抗侵略者的热潮。广大民众坚决要求抗日，尤其是穷苦人民，他们听共产党的话，拥护新四军，积极参加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学习抗日道理，身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广大青年有的参加新四军，有的参加路工队（挖路还田，阻止日军），一些群众自觉为新四军站岗放哨，给新四军送信，妇女则赶做慰劳鞋。在上层人士中和国民党内部，由于民族大敌当前，也有不同程度的分化，包括他们的子弟，有很大一部分接受了新思想，主张抗日，倾向革命。

二、陈毅到青阳

1938年初夏，陈毅以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公开身份来到青阳，此举是青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起始。

陈毅之行先到木镇，作了短暂停留，与驻木镇的国民党川军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进行了会晤。至青时，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朱毅生（六安人）已在县府门口等候。当日，陈毅在县城何家祠堂国民党青阳县政府举办的青阳县军政干部训练班上作了“团结对外，坚持游击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政治报告。

当时，陈毅身着灰色土布军装，头戴八角帽，腰系皮带，脚穿皮鞋，一身戎装。在县长朱毅生和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鲁前的陪同下登上主席台，与会的干部学员顿时起立致礼，陈毅走到主席台正中，张开双手，向下示意，以四川口音亲切的说：“同学们，请坐下”，陈毅首先代表中央分局向培训班学员表示慰问，接着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针对部分干部中存在的疑虑问题，阐明了当前形势、任务与对策。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敌人的枪口对准中国人，中国人的枪口也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国共两党在 10 年血战后能够一致抗日的的原因所在。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侵略者，以民族大业为重，化敌为友，团结抗日，共赴国难。三个多小时的演讲，台下鸦雀无声，陈毅双手时支在桌上，时叉在腰上。讲到激动处，嗓门便高了起来。学员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陈毅的报告，声情并茂，深入浅出，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不日，培训班接受陈毅的建议，搬到离城十五华里的杨田施家祠堂，建立了“青阳县农村工作实施区”，进行农村调查及宣传抗日等工作。为配合挖路，又组织了“路工辅导队”，学员深入到几千民工中间，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有意引导民工讨论个人出路、人生前途和国家危亡等问题，从而为赢得抗战舆论，增强抗战信心，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青阳抗日总动员委员会

1938年3月5日，“安徽省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在当时的省会六安成立，同年5月5日，“皖南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在屯溪成立。

1938年初，由于日机连日轰炸，国民党青阳县府遂迁往朱备笔架山双溪寺庙。5月，由县长朱毅生主持，在朱备宣告成立了“青阳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朱毅生任主任委员（7月初，朱毅生调离，操竹友接任国民党青阳县长，同时兼任“动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由从香港携眷回乡的陈维稷担任。陈次权、孙梅先等一部分士绅为委员。之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发展，动委会相继建立了“儿童抗日救亡团”、“委托工作团”、“第一特种工作团”、“第二特种工作团”、“青年工作团”、“巡回教育团”和其他群众组织。

动委会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我党实际领导的广泛动员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组织。

儿童抗日救亡团：这个团是在“少年救亡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8年初，中共早期党员苏拓夫在杨田地区开展工作，公开身份是杨田地区的一个小学教师。他与小学老师陈中明和私塾先生沈赞成一起，组织杨田地区四、五个小学里年龄稍大点的学生组成“少年救亡组”，进行抗日宣传。组长沈培镜，副组长王树之（王少鸣）。动委会成立后，陈维稷以县动委会副主任的身份，以“少年救亡组”为骨干，组织杨田、水寨、下畈等多个学校的学生到全县各地宣传，号召全县各地学生报名参加“宣传

团”，从中选择身体较好、爱好文娱活动的人参加，并编了花名册，呈报动委会备案。不久，县动委会正式批文，同意成立“儿童救亡工作团”。直属动委会领导。团长王启忠，副团长王少鸣，团员有 20 多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学生，任务是通过歌咏演唱的形式宣传抗日救国。

后许英汉等将儿童救亡工作团扩大为“补习班”，借以招收青少年读书，从中物色活跃分子组成话剧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委托工作团：1938 年夏，许英汉等人看到《皖南日报》登载的关于“皖南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号召各地青年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消息。报上介绍了两类团体：一类叫“特种工作团”，它需经皖南动委会审查批准；另一种叫“委托工作团”，它号召各地有志抗日的青年自行组织起来，开展工作，只需向皖南动委会报告备案即可。这样，他们立即行动，在杨田施家祠堂成立了“委托工作团”，全称为“青阳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第一委托工作团”，公推李景白为团长，并公开挂牌办公，内设儿童话剧队。教师就是团员，学生就是队员。工作团的任务是：给失学的儿童补习文化，教学中宣传革命道理。因沈赞成、李景白、徐育英、许章法、陈法周等人都是有名的教师，家长都认为这是读书的好地方，既有利于防备日机空袭，又可解决就学问题，因而都愿意把子女送来。因此，当时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

第一特种工作团：委托工作团成立时，住在施家祠堂。为便于统一领导全县各界抗战，陈维稷决定将团部迁往梅溪。1939年春，安徽动委会改组，随即“皖南总动员委员会”改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皖南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根据要求，青阳动委会委托工作团更名为“第三战区皖南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青阳第一特种工作团”，报皖南动委会批准。地址设在杨田八甲王，简称“特工团”，团长李景白，副团长沈赞成。特工团下设4个股：组织股长陈中明（后陈法周兼任），宣传股长施运之，总务股长陈法周，妇女股长王佩芳（后周喆接任），团内还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支书由陈法周担任。组织、妇女委员周喆，宣传委员周家麟，青年委员陈寄帆，共有团员30多人。另外，还有1个话剧队，队长吴家元（后汪济川），副队长陈在简（后杨刚）。队员大部分都是杨田和木镇附近的高小失学的学生，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12岁。这时，一些县动委会已逐步为国民党右派所控制，而青阳却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黄金时期。当时工委就设在特工团内，公开的身份都是特工团团员，并佩戴胸章。

动委会副主任陈维稷经常来特工团演讲国内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道理，并说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身上，还私下对许章法等人说：“真正的人才还是在那边（指共产党）。”1939年夏末，中共皖南特委张世杰、林彬、黄诚、组织部长陈时夫先后来特工团作时事报告，讲解马列主义，并陆续派沈鹰、左英、史平、黄志贞等以特工团团员的身

份协助工作，进一步加强革命力量。皖南动委会副主任范治农也曾来特工团视察，方向明也到特工团给团员和队员讲过课，并赠送了一批革命书籍。

1939年春末，李景白调出特工团，团长由沈赞成接任，陈次泽接任副团长。

第二特种工作团 “第一特种工作团”成立不久，李景白陪同陈维稷到北乡组建了“第二特种工作团”。团长王步青，计划其主要任务是筹建地方武装。由于1939年10月底陈维稷调离青阳（去重庆做冯玉祥部的统战工作），“第二特种工作团”只搭了个架子，并未开展实际工作。

青年工作团 动委会成立后，随即批准成立了“青阳县青年工作团”。徐育英任团长，副团长陈光前（县政府委派），其任务是深入各地组织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群众组织，借以从中物色先进分子，发展党员。1939年春末，徐育英调出青工团去青坑办短训班（实际是去搞党组织发展工作），团长由李景白接任。

巡回教育团 1938年7月，在杨田成立。团长由陈维稷兼任，副团长沈畴春、苏拓夫，同时，还在木镇成立了分团，团长田维祺。巡回教育团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儿童救亡工作团”到全县各地担任辅导员。他们到各地后，创办识字班、文化学校、文化夜校，召集失学青年学习文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当时，巡回教育团曾提出：“到最前线的地方去，要使抗日失学青年一个不失

学”的口号。

以上这些组织都是经县动委会批准建立的，在名义上是国民党政府官办的，活动经费由县政府支付，不足部分募捐解决，这给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当时，县以下区乡抗日救亡组织主要是以农抗会、农协会，抗敌协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组织形式出现。通过“青年工作团”的积极努力，全县这类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会员达3000余人。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陵阳抗敌协会 1938年4月，陵阳农协会会员李光甫对程锦花说：现在国民党要壮丁要得很紧，农民要是能组织进来，成立一个组织，他们就不敢要了，这话说出了农民的心愿，于是以李光甫为首在陵阳组织了农民抗敌协会。第一批参加的只有王和泉、唐少南和程锦花，以后发展到20多人。领导人为李光甫。当时农抗会一般都挂上牌子，利用这个组织进行抗日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散传单、贴标语，号召群众团结一致进行抗日。陵阳抗敌协会在党支部领导下，还开展了减租减息活动，如对当地顽固地主“三奶奶”开展了减租斗争，一次就减掉了800多斤稻。

火焰山农抗会 1938年7月，沈赞成率领宣传队来火焰山唱戏，宣传抗日。由沈赞成、周大才、苏拓夫、沈鹰、陈锦水等人和王小根联系，在江学喜家开了大会，会上由沈赞成、周大才主持成立了农抗会。主任王小根，副主任刘先信，苏拓夫任指导员。农抗会有会员120多人，分火焰山脚下、中屋里、五屋里、李家

等五个小组。火焰山农抗会，直到绥靖队邵子进、钟有夫到这里来，把一部分人搞去办了自首，之后就再没有活动。

茗山农抗会 1939年4月，铜陵凤凰山游击队营长刘洪成，还有徐天一，到茗山一带建立农抗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七、八十人。同年5月在茗山召开首次会议，主持人刘洪成。会上宣传了抗日意义和政策，会后分为茗山、店门口两个农抗会，茗山农抗会主任李长福，店门口农抗会主任张三排。茗山农抗会的任务是探听日军消息，给游击队送信、送菜、送饭，安排游击队的生活。当时店门口驻有日军，有一次李长福、张三排叫曾松涛从店门口送信到茗山，把信放在香烟盒里，日军搜查时将香烟拿去，信被鬼子发觉，曾松涛被鬼子杀害，店门口的农抗会就没有建立起来。1945年日军投降后，农抗会改为农会，张乃水任主任。

木镇农抗会 这个组织的雏形是沈鹰、徐天一在1939年5、6月间组建的，开始只有30多人，以后逐渐扩大，到9月份已有60多人。遂正式成立了农抗会。主任熊新炳，副主任马新文，理事是王年生、肖康红等，一共5个理事3个监事，由徐天一领导。这个农抗会当时是经县政府同意的（有政府文件），县长操竹友还来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有100多人，包括保甲长、士绅都参加了大会。会上操竹友讲了话，他说：如今日本鬼子打到了我们中国，我们老百姓有必要组织起来自卫，你们这个组织是合法的，什么人都不能阻挠。操作友最后还说有困难就与他联系。农抗会开展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参加新四

军和抗日自卫队。当时，这个农抗会的工作很有成效，就连国民党要伙也必须经过农抗会同意，由农抗会统一安排。但凡有为非作歹的，农抗会就进行干涉，这个组织直到县动委会变成反共组织，县政府禁止其活动时才停止。

杨田抗敌协会 1939年秋，沈赞成、陈中明、陈次泽等20多人在梅溪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接着由陈次泽负责组织抗敌协会，起初参加协会的人并不多，通过演出宣传，群众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参加农抗会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400多人。遂于9月份正式成立了农民抗敌协会，共有9个理事：富根生、富有来、陈法雨、王成达、吴黑疤、徐新年、徐炳来、丁文英、查三元，3个监事：陈文照、方大坤、吴亏胜。在理事中推选了两人担任主席：主席查三元，副主席陈法雨。10月，由陈次泽负责，以农抗会员为对象办了5个冬学：梅溪陈、施家、田畝村、风冲、八甲王家各一个，这些冬学一方面是教学文化，另一方面就是宣传抗日救国。

上述农抗组织的建立与活动，唤起了后方民众投身抗日，共赴国难的爱国意识，激发了群众英勇奋战的抗日热情，对青阳抗战事业的顺利推进起到了很好的引导、组织作用，同时也说明以共产党员为中坚力量的动委会在农村进行的宣传、组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然而在1939年秋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共

老手李品仙继廖磊主皖后，反共势力急骤抬头，致使省动委会由动员抗日转而走向专门反共，失去了它进步的灵魂。由此青阳动委会也难以为继。

1939年秋，国民党以通共的罪名撤掉了县长操竹友，代之为反动分子莫寒竹，莫一上台就千方百计地排挤动委会的进步力量，将青阳“抗日人民自卫军”中的“抗日”二字除掉，并要求特工团和青工团等进步组织成员集体加入国民党。遭到拒绝后，便借口动委会下属组织内有异党活动而停发了生活补助费，并限制动委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他们还派便衣特务到特工团、青工团、巡回教育团秘密跟踪。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动委会、工作团内的中共党员，左派力量和广大进步青年骨干纷纷撤走，剩下小部分亦转入地下。至此，青阳动委会名存实亡。

第二节 中共青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一、中共青阳县工委

1938年五、六月间，皖南特委和新四军政治部指派时在屯溪战时总动委皖南分会工作的方向明（方彬）以巡视员身份视察皖南各县，方很快就到了青阳，方抵青后，首先找到了已从上海回来的陈维稷，因方与陈是故交，也就索性住在陈家里（杨田梅溪陈村），这时，陈已结识中共早期党员苏拓夫，并通过苏认识了许章法（许达抱）、许英汉、徐育英（徐熙）、李景白、陈法周等进步青年。当陈维稷、苏拓夫将许章法等介绍给方向明认识时，五位青年遂提出与方一道去新四军军部，方因视察任务在身，当

时未允。后因青阳遭受日军飞机连续多日的轰炸，方在视察木镇后，便匆忙结束了对青阳的视察，回到皖南特委后，将青阳情况如实作了汇报。

1938年七、八月间，方向明邀陈维稷到皖南特委和新四军政治部汇报了青阳的抗日斗争情况。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特委书记李步新和方、陈一起研究了开辟青阳工作的方针：（一）以统战工作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二）大力开展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扩大党组织；（三）渗入地方武装，帮助改造并训练地方军队，同时决定许章法、徐育英、李景白、许英汉、陈法周5人到泾县章家渡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

同年10月，袁国平和李步新派方向明和新四军一团参谋刘妹钟（刘焕安，绰号黄矮子）到青阳建立工委，具体落实之前研究决定的三项工作。方、刘到青阳后仍住在陈维稷家。10月中旬在杨田梅溪陈村成立了青阳工委，书记方向明。

1939年2月，许章法等5人结业归来。皖南特委及时派黄诚（特委宣传部长）来青，任务：一是调苏拓夫到特委，二是健全完善工委组织。当月，在九华山的一座庙里（东崖）召开会议。到会的有黄诚、方向明、徐育英、李景白、许章法、陈法周、许英汉共七人。会议由黄诚主持，首先为从新四军教导队学习回来的许章法等五人补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徐、李及两许已在学习期间入党），接着宣布了特委任命：工委书记方向明，组织部长徐育英，宣传部长李景白。工委属皖南特委领导，同时和新四军政

治部发生关系。

工委成立后首先从上层人士入手开展统战工作。当时青阳上层统战对象主要是新任县长操竹友、开明人士陈次权、孙梅先、曹佐庭等。争取他们都是由陈维稷出面联系的，通过统战工作，工委很快在青阳扎下了根，接着便着手在动委会下属的特工团、巡回教育团、青年工作团中发展党员，并在特工团内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陈法周，有党员 30 多人，上属工委领导。各团团长、副团长都是中共党员。特工团内设 4 个股，股长也都是中共党员。这样动委会组织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员领导工作，加上操竹友、陈次权等拥护抗日，特工团等组织便大张旗鼓地开展演抗日话剧、唱抗日歌曲等活动，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日标语和墙报，因而当时的抗日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工委建立后不久，陈维稷、郑汉（时任国民党青阳县党部书记长）两人由袁国平、方向明介绍，报经皖南特委并转呈东南局批准为“特别党员”。至此，青阳抗日工作内有工委领导，外由陈维稷、郑汉出面做统战工作，形成越来越好的政治局面。陈维稷还亲自到各地走访，逐步团结了北乡一带的中小士绅。地方实力人物陈次权，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为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国民党县长操竹友，思想进步，加之方向明、陈维稷、郑汉等人的影响，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支持我党在动委会和各组织中的工作，并将国民党上层下发的文件拿给方向明看，使我党从中掌握了不少有关国民党方面的动向。

为争取地方武装，方向明、刘妹钟通过陈维稷先做好了操竹友和陈次权的工作，进而又说服了地方士绅，同意方向明和刘妹钟分别以政治教官和军事教官的身份训练青阳常备队。后又通过陈次权于1939年2月派许章法、许汉英到常备队任副班长。青阳县常备队，是根据国民党上层要求成立的，在操竹友筹建常备队时，地方绅士陈次权、洪静安等为巩固地方势力，极力主张再成立一个后备队，于是，1938年9月底，常备队和后备队同时成立，统称抗日人民自卫军，操竹友任司令，孙开梅任副司令。方、刘、二许进入常备队后，很快组成秘密支部，支书由许英汉担任。对常备队的训练一共进行了3期，第一期训练了一个加强排。为脱离国民党青阳县政府某些人的控制，训练在庙前乡的湾里吴进行。加强排排长叫吴志成，生性爱财，方、刘一来他乐得为财而奔忙，很少过问部队训练，这给方、刘造成了较好的条件，于是，方、刘等对其中思想进步的人有意识地进行帮助、考察，条件成熟便吸收入党。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就是在常备队中担任副班长的陈文堃，接着发展了韩福臣、周家信、李长胜等。第二期是在朱备店的上龙口，训练了后备队的一个排，常备队的一部分，排长叫舒茂华，很反动，他背后煽动大家“别听这一套”，许章法正面和他斗过好几次。这期间发展了焦三元、李龙保、胡子山等。第三期地点是在朝田方家，并通过训练又发展了周长友等三、四个中共党员。但这期训练未能如期完成，原因是莫寒竹接任县长，形势发生逆转，皖南特委命方向明等人从7月份起开始陆续

撤离青阳。许英汉临行时，按上级要求将组织关系交给了陈文堃，并指定其任支部书记，韩福臣（后韩调走，焦三元接任）和周家友为委员，整个支部留下了7名党员继续坚持。

1939年5月，青阳工委又在国民党杨田乡公所中秘密发展了十几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书记先是许章法，后由陈法雨担任，同期，工委还在梅溪、八甲王、杨田埂、里屋沈、火焰山脚下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7月间党员发展到200余人，便成立了杨田区委，书记许章法，上属青阳工委领导。至此，青阳工委下辖1个区委、3个秘密支部。

二、中共青阳县委

（一）县委的建立

根据青阳抗日斗争形势和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情况，1939年5月，皖南特委和新四军政治部派沈鹰来青阳筹建县委，以加强领导。当时随沈鹰同来的还有陈寄帆、周家麟、周喆、左英、史平、黄志贞。他们到青阳后都住在梅溪陈特工团团部内，公开身份都是特工团团员。

1939年9月间，经皖南特委批准，于杨田梅溪陈村改青阳工委为青阳县委。书记沈鹰，组织部长田维祺，宣传部长徐育英，武装和统战委员许英汉，青年委员陈寄帆，妇女委员周喆，委员许章法、李景白、李光甫。

1940年4月，特委派泾县县委的陈宗汉（程创生）到青阳工作，随即县委作了调整，陈宗汉为组织部长，另增补小金（化名，

以后开了小差)为委员,其余未变。

(二) 县委的下属组织情况

在此之前,中共青阳工委下辖1个区委(杨田区委)和3个直属支部,现改属县委领导。另1939年2月建立的直属皖南特委领导的陵阳区委也改由县委领导。同年六、七月间,沈鹰在建立县委的前期工作中,先后在牛山、乔木、北乡地区各建立了一个区委,这样,当时的中共青阳县委下辖5个区委,3个直属支部。分别是:

杨田区委:在工委领导期间,杨田地区党组织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大都是先成立农抗会,从中发现、物色积极分子,逐个发展党员,然后成立党小组,待条件成熟再成立党支部。最先成立的是梅溪支部,支部书记先后是陈法雨、王学明,组织委员王达成,宣传委员查三元。接着成立的是八甲王支部,书记陈维稷。杨田埂支部(书记不详)。后来随着党员逐步增加,又相继成立了白马塘支部,书记陈金龙;火焰山支部,书记江家龙;谢家水碓支部(书记不详);到县委成立时杨田区委已下辖6个支部、1个党小组,共有党员80多人,区委书记先后是许章法、陈法雨,组织委员施运之,宣传委员许英汉。

这一地区群众基础扎实,有建党的合宜土壤,所以中共青阳工委、中共青阳县委的建立都是以杨田为依托,机关都设在梅溪陈村。当然,这也与日军占领陈家大山不无关系。

陵阳区委:陵阳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开始是由金厚初组建

起来的。1938年10月，皖南特委派金厚初到陵阳开辟工作，他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便是李光甫（李南甫），并将李介绍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接着又在礼貌山发展了几名党员，成立了支部。后又通过陵阳师范校长林启骥，教师李仁甫等办起了“民众夜校”，招收周围农民识字，借机宣传抗日道理。寒假时成立了“留校工作团”和“抗日民族解放先遣队”，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年底，李光甫学习回来，党的组织发展得更快了，从崇觉寺逐渐向所村、吴田、礼貌山等地拓展。

1939年2月，皖南特委派林彬（江西人）来陵阳，在金家冲金厚初家里开会，宣布成立陵阳区委，指定金厚初为书记，直属皖南特委领导。

同年5月，金厚初调往特委工作，由李光甫接替区委书记。区委委员有曹奎林、宁郁邦、陈抗如，下辖4个支部：礼貌山（今南埂村）支部，书记曹奎林（曹福生）；崇觉支部，书记程锦花；湖田（今梅山村）支部，书记陈鹏（一说张玉龙）；平阡（今所村）支部，书记陈抗如。此外，师范学校等地还有几个党员，有农民、小商人、知识分子、学生等。这些人直接和区委联系。全区共有党员130余人，到1940年8月，李光甫离开陵阳前党员已发展到230余人。

牛山区委：1938年9月间，新四军派三团某连指导员梁作吉到青阳的牛山、石壁（与南陵、铜陵上下毗连）一带开展民运工作。开始以教师面目出现，公开宣传抗日，发现有建党对象时，

便进一步进行考察了解，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39年春，党员发展到30余人，先后在茗山、洛家潭、树林、毛竹园、石壁冲、柯冲、甘家冲、天明山一带成立了8个党支部。

1939年6月，在沈鹰主持下，成立了牛山区委（设石壁），书记徐天一，宣传委员陈家元，组织委员先后是桂西元、吕以田，共有党员120余人。

乔木区委：乔木距泾县云岭很近，是党开展工作的前哨站。1939年2月，李景白、陈法周以特工团员的身份（受青阳工委的指派）到乔木找田维祺，通过考察了解即吸收为党员。接着工委又派洪涛以搞妇女工作的名义到这一带协助工作，开展抗日斗争。这里的群众早已看过特工团话剧队的宣传演出，加之临近新四军军部，群众基础较好，所以一经发动，便很快组织起了农抗会。同年六、七月间，沈鹰来这里进一步开展工作，从农抗会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金山铺建立了党支部，接着又在和平等地成立了7个支部：和平支部，书记陶金才兼；安民支部，书记洪秀荣（后牺牲）；鸡山支部，书记董汉卿。（另有4个支部不详）。共有党员60多人。1939年7月沈鹰在黄荆塔主持会议，宣布成立乔木区委，书记田维祺，副书记陶金才（后接任书记，皖南事变叛变）。

宾木区委：宾木地区包括宾阴和木镇两个乡范围。这个区党组织是从牛山和杨田跨乡发展而组建的，先是搞群众抗日武装组织，由石壁的抗日自卫队所属的第三分队逐渐发展而组成了两个

连的群众武装。1939年六、七月间，沈鹰到北乡开展工作时，这一带党的活动正处在萌芽状态，他找老党员李炳辉、桂西元等人研究商定：在宣传抗日、建立农抗会的基础上，着力发展党员。于是这一带党组织发展工作进行得很迅速，成立了13个党支部：毛田湖支部，书记傅金生；金山支部，书记易寿千；田屋支部，书记方万松；金墩支部，书记张登喜；孝义支部，书记余凤荣；石安支部，书记林云宏；天峰山支部，书记李炳辉；芭茅埂支部，书记余德荣；十龙口支部，书记赵长柏（后牺牲）；黄栗树支部，书记洪孝全；云桥支部，书记闵雪山；大烟冲支部，书记张义宏；云胜支部，书记倪席珍。另江梅片曾成立过区委，时间很短，此时并入宾木区委，有3个支部，党员83名：河西冲支部，书记张家宏；白云支部，书记倪振庭；江梅支部，书记杨松寿（杨老三）。8月底，在石安的天峰山，由沈鹰主持召开了宾木区委成立大会，书记李炳辉，组织委员桂西元（从牛山调来的），宣传委员倪振庭，妇女委员袁英，委员方伦顺、方万松、常克勤。全区共有党员120多人。

3个直属秘密党支部：特工团秘密党支部，书记陈法周、组织委员周喆、宣传委员周家麟；常备队秘密党支部，书记陈文堃，支委韩福臣（后韩调走，焦三元接任）和周长友、廖文彬；杨田乡公所秘密党支部，书记陈在简。下辖两个党小组，第一小组组长邹时铎，第二小组组长李文白。

县委成立后，由于坚持抗日救亡与组织发展并重，党的领导

得到了加强。最盛时期有 253 个支部，党员 723 名。县委的管辖范围较之前工委明显扩大，除西乡外，几乎覆盖全境。其时西乡庙前、九华一带归贵西工委领导（1943 年冬，贵西县委成立，书记吴文瑞，青阳庙前九华一带归其领导）。

正当青阳县委处在大发展时期，1940 年 10 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迅速恶化。11 月份，新四军军部命令在各县开展工作的已暴露身份的人员全部撤退，随即沈鹰等人回到了新四军军部。不久，特委决定由沈鹰和黄志贞到青阳盘台联系青阳的地下党员组建泾青太中心县委。正准备召集人员研究，又接到指示停止实施，所有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活动，留守青阳的党员关系全部交给陈法周。至此，青阳县委停止了活动，所属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第三节 青阳地方党组织在抗战时期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宣传工作：青阳地方党组织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体现在唤起民众，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瓦解敌军等宣传工作上，党组织范围广泛、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在青阳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扎根学校阵地，通过学生扩大宣传。共产党员苏拓夫在杨田以教职为掩护，在教学中他有意识地向学生传播无产阶级思想，经常向学生介绍鲁迅、高尔基、孙中山等。并将他们的文章抄给学生当课本，就连出作文题也结合形势，如“中国会灭亡吗？”、“笔和枪”等，还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和朱德事迹的文章，

讲“东北抗日义勇军”等革命故事，借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学生评论时局，发表观点，在少年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后又在年龄大点的学生中建立了“少年救亡组”，规定：每周要组织学习，介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于抗战的文章。通过学习，大家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纷纷发誓：宁死不做亡国奴。为扩大影响，他又联系了杨田的水寨、下畈等四、五个学校的进步教师李景白、许章法、许英汉、陈法周、徐育英等，将进步书籍交给教师传阅阅读，如《季米特洛夫》、《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等。同时通过学校之间互相送挑战书、写信、交换意见、参观等形势进行抗日宣传，其时，杨田一带掀起了抗日宣传的高潮。

后来，许章法等5位进步教师都参加了革命，并走上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岗位。“少年救亡组”在参与“儿童救亡工作团”后作为县动委会的主要宣传机构在宣传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组织下乡，巡回演出，营造抗战舆论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建立了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党获得了合法地位，这为地方党组织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青阳地方党组织巧妙地利用动委会、工作团的名义，通过最容易被宣传对象接受的方式组织宣传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是以巡回教育团出面，带领“儿童救亡工作团”到全县各地宣传，主要内容是教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打回东北去》、《游击队员之歌》、《革命战士出征歌》等，他们还搞演唱会，开展歌咏比赛、诗歌朗诵等。他们走到哪里，哪里

就响起了歌声，他们自己唱，也教群众唱，孩子们、年轻人和妇女，都高兴地跟着一起唱，这歌声激起了广大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提升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心。二是实施战时教育，开办临时学校，文化夜校，举办识字班、补习班、扫盲班等，寓教于学，不仅满足了一些失学者的读书要求，同时也融进一些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从而对提高抗战觉悟起到了促进作用。

期间，值得一提的还数动委会特工团的话剧队的巡回演出，他们背着行李，挑着服装、道具、汽油灯，先后到白马塘、东堡、陵阳、南阳湾、乔木湾等地巡回演出，全县境内除西乡外都留下了特工团和话剧队的足迹。每次演出前都精心排练，演出时先搭起简易舞台，台两边贴上标语，正式演出前由团员作抗日救国的演讲，每到一地演出，方圆十几里的群众扶老携幼，争相观看。一次在里分沈演出《流亡三部曲》，轰动了几个村庄，连周围村庄的军统特务也跑来观看。1939年夏末的一天，县长操竹友同时邀请特工团和川军新七师政工队到县政府所在地朱备演出。出发前，沈赞成团长动员说：今晚观看的不仅有县政府官员和当地群众，而且川军七师的官兵也要来，为此大家一定要比以往演得更好。操县长知道特工团平日生活艰苦，还专门杀了一头猪慰劳，并到特工团讲话，他说：你们到各地演出效果很好，你们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你们是青阳儿童的榜样、儿童的模范！之后，在每个队员笔记本上签名留念。这天晚上，观众人山人海，首先由话剧队演出，内容是《三江好》、《流亡三部曲》、《打杀汉奸》、

《送郎去当兵》、《游击队》。演出中群情激奋，掌声雷动，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观众泪流满面，自动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接下来轮到川军政工队演出，尽管他们服装道具齐全，演员们一个个浓妆艳抹，香气四溢，但内容却是一些陈旧的与抗日无关的东西，因而观众也逐渐没了劲头，尚未演完，观众已寥寥无几了。

1939年夏末，三战区从上饶、屯溪开来了大批国民党部队（步兵、炮兵、摩托化部队），沿陵阳、东堡、杨田、蓉城一带集结，准备攻打陈家大山。前后准备了一个多月，最后几天激战，陈家大山据点日军顽固抵抗，国民党军队伤亡惨重。县城以南公路两旁的村子里挤满了伤员，他们痛哭呻吟，怨声不绝，部队士气低落，开小差的接二连三，汉奸特务趁机散布“抗日必亡”的谬论。根据这一情况县委指示特工团组织团员和话剧队，一面深入伤兵和国民党军队中宣传《论持久战》，批判“速亡论”和“亡国论”；一面发动大家捐钱买“欢团”（即炒米糖团子）去慰问伤兵。特工团员带着慰劳品到伤兵驻地慰问演出，演唱了“慰劳伤兵歌”。歌词中唱到：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了千百万儿童，光荣负伤，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日本强盗为了要灭亡咱们的全中国，他们是这样的疯狂，自从占领了我们的北方，又进攻到我们的南方，他们要把中国当成一个屠场，任他们杀，任他们抢！听啊！飞机还在不断地丢炸弹，大炮还在轰隆隆地响，我们拼着最后一滴血，守住我们的边疆！唱毕，伤兵们无不掩面而泣，深受感动。

（三）利用重大纪念日，发起广泛动员 这种做法，其意义不仅是停留在悼念和纪念层面，更重要的是其莫大的政治宣传动员作用。以重大纪念日为契机进行抗日宣传，既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人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又将党的方针政策融入其中传达下去，加深了人们对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对唤醒民众，壮大抗日力量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例 1939 年 9 月 18 日，全县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各抗日组织和群众千余人集会，举行“九·一八”纪念大会，并通电声讨汪精卫，痛斥蒋介石破坏抗日的罪行，激起的团结抗战呼声越来越高。同年，12 月 9 日晚，县委书记沈鹰主持了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为内容的茶话会，会上沈鹰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各地方党组织和武装组织要实行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独立自主地动员和团结人民积极抗战，使党员干部的责任心进一步增强。又例陵阳师范学校，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后，内部成立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沈培镜等 18 人参加了新四军。再如，宾木区委书记李炳辉在抗战动员大会后，带头报名参加新四军，随后带起一个连的武装，受此影响，之后各区报名参加新四军的均达到一个连以上。当时还有许多妇女要求当兵，皖南特委只批准了几个，如洪涛、董桂芳等，大大地充实了新四军力量。

（四）建立秘密联络点，保障党报党刊及进步刊物的传递 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县委决定变换斗争策略，将分散在各地的话剧队员集中起来，由杨田一带进步士绅出面，在杨

田东山脚下的云龙庵办一所私塾，派李景白以私塾先生的身份在当中领导。沈培镜、王少鸣等十几位年纪小的人很快汇集到云龙庵，他们在学文化的同时，积极进行地下活动。这地方天一黑，外人一般不来，他们便在晚上学习从新四军军部带来的书报，学习完毕又藏在墙洞里。当时云龙庵是县委交通中转站，从新四军军部发到青阳各地革命书报和宣传材料，都是先送到这里，然后再分送到全县各地。地下交通员朱国安经常运来大批书报和宣传品存放在私塾里。另杨冲孙梅先家也是秘密点之一。主要由交通员王镇国接关系。他不定期给孙带来《抗敌》、《大江报》、《民族公论》等进步刊物，后被孙的两个儿子发觉偷看，当时孙梅先很严肃地说：“你们看可以，但切不可外传。”其子从这些刊物中，开始受到革命教育。由于王镇国经常出入孙家，其子与他也认识了，其中孙梅先次子孙仲彬在王的教育影响下，于1947年在梅溪陈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联络点的建立，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有力地保障了青阳地方党组织的上传下达，政令畅通。1939年秋，县委给特工团一卷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杨刚等接受了张贴任务后，趁夜深人静之时将“宣言”张贴于街头、路口，并将一部分“宣言”塞进镇公所。第二天一早便有许多人围观，有的还轻声朗诵起来：同胞们、将士们，我们以热血和头颅换来的抗战光辉成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所毁灭吗？……不，决不，同胞们，我们要：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当时，川军政训处的国民党人员说：这是共产党进行赤色宣传，叫群众不要相信，但是党的影响已在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

二、统战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毛泽东指出：“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①在整个抗战时期，青阳地方党组织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致力于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开展统战工作，既注重上层，又立足基层，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统战形式和手段，使许多消极因素转为积极因素，为抗战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使青阳成为抗战时期统战工作做得较好的县份之一。

（一）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上层人士在地方实力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使之成为青阳地方党组织重要的统战对象。

方向明通过陈维稷架起沟通的桥梁，在与上层人士的交往中，青阳地方党组织注意策略，待之以礼，交之以诚，晓之以理。从而，使上层统战对象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对抗战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县动委会活动，基本上是操竹友、陈次权和方向明、陈维稷在一起研究。且大都是方向明、陈维稷拿主导意见，可谓游刃有余。抗战初期，动委会完全掌握在中共青阳地方党手中。

陈维稷在青阳曾接待过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特委来青阳工作的彭柏山、黄诚等人，并协助他们工作。陈还引导他的五弟陈次泽走上了革命道路，担任特工团副团长，后又接替特工团团长。在陈次泽担任团长时，特工团已停发补助费，陈就拿出自己家产解决团员们的生活问题。在此之前，因特工团人数逐渐增加，经费严重不足，陈维稷也曾主动拿出稻米资助。

期间，方向明从操竹友处得到国民党情报、文件，抄写后就马上送到新四军军部。1939年1月左右国民党发下来一份密件《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方在操竹友那里看到后及时报告了军部，使中共党组织和军队掌握了不少情况。

1938年春，郑汉得到新四军政治部的同意，就任国民党青阳县党部书记长。他以书记长的身份同周边国民党专员、县长和军队联系，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多次从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公署获得重要情况，及时向方向明作了汇报。

操竹友被撤换以后方向明调回军部。不久，国民党特务密报郑汉“通匪”撤掉了他的书记长职务，要逮捕他，郑汉闻讯转移到新四军军部，后到大别山一带做地下工作。随后他又打进国民党省党部，利用各种关系，把接替他的国民党青阳县党部书记长谢鼎新撤掉，让陈次权接替书记长职务。

陈次权是陈维稷的哥哥，著名开明人士，人称“二先生”。在他任国民党青阳县党部书记长期间，为革命幕后掣肘，积极支持共产党，为中共党组织出过不少力，做了许许多多有益于人民的事。皖南事变后，在危急关头，他和陈法周两人掩护突围的苏拓夫、方向明、许英汉、刘妹钟等数十人，使他们脱险。许英汉经上级党批准，留在青阳做秘密工作。由于何其雄等人的叛变，国民党逮捕了许英汉，最终还是陈次权出面保释，营救了他。

再如国民党青阳银行行长陈荣庭(绰号孙猴子)，三猫烟草公司老板兼县常备队六中队队长孙瑛(外号叫陈老三)，二人在青阳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老百姓见他们怕三分，经过陈次权做工作，他们愿保持中立，并先后送给中共党组织7支手枪和若干子弹等。

除上述统战对象外，知名人士孙梅先、地方开明士绅陈次岳、汪家荃、工商界进步人士陈德和、王德培、王炳炎等都为共产党做过有益工作。青阳大华布店就是在工商界人士的协助下开设的，是地下党的落脚点。地方党和抗日武装所需物资基本都是从这里购进和转运的。许许多多的开明人士与中共长期合作，积极支持反对内战，提供情况、转运物资，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帮助营救被捕的革命人员，为青阳抗日工作，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二) 乡镇基层的统战工作

在统战工作方面，除团结上层人士外，青阳地方党组织还争取了一部分国民党保甲长。党组织派员到国民党地方政权中任职

以扩大统战工作的范围，如沈赞成任国民党杨田镇长，陈中明当梅溪保长，杨晓峰当木镇镇长，还有茗山的汤可炳，陵阳的陈保矩和老虎坑的陈保长等，他们都是受党的指派，通过有影响的地方实力人物的关系，进入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这样，派进的骨干就可以利用合法身份，进行统战工作，帮助同仁认清国家前途，达成携手抗日之约。使统战之路不断延伸。

因此在当时国民党基层政权中出现了相当多的“两面派”，表面上是国民党的保甲长，内里却为共产党做事，如乔木士绅施丙中就经常给新四军、游击队送情报。又如钱有财在茗山冲维持会当警察，他先不愿干，怕人家骂他是黑头鬼子，通过做工作，要他摸情况，他茅塞顿开，以后他将掌握的日军情况及时向游击队汇报。

（三）学校中的统战工作

陵阳师范学校校长林启骥，教师李仁甫、汪忠天，他们的思想都比较进步，有一定基础，本着“积极发展进步力量，努力争取中间力量，坚决孤立顽固力量”的统战原则，青阳地方党组织把统战工作开拓到了学校。利用师范名义作掩护，办了民众夜校，寒假时还成立寒假留校工作团，继续办好夜校，从中物色对象，做好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沙埂、河坎李、礼貌山、中南埂、泥田冲、金家村、南阳湾、上南集先后成立了九个党支部，党员一百多人，都是在这段时间发展成立的。黄诚还来到陵阳师范学校对师生演讲，宣传抗日持久战等抗日道理，特委陈时夫，也到陵阳

检查过工作。在师范内部还成立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组织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建起来的，是全国性的组织）。

（四）税收中的统战工作

1944年1月，在茗山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童埠区委和区政府。政府税收工作中，敌占区的收税尤显困难。区委区政府通过对当地汪伪政府中相关人员和伪保长开展统战工作，收到较好效果。时任区委副书记尹彬说“做好这些人的工作，是有利于我们税收的，等于开展了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只要他们不干坏事，做生意我们是允许的，只要他们按章纳税，也受到我们的保护。”

通过统战工作，利用敌伪中人员给我方收税，增加收入，收效很大。如乌鱼塘是日军占领地区，政府就说服伪保长罗志茂，维持会长罗华栋代收，区政府给税票，他们1月3次送来税款，按税款总额三七分成，区政府70%，他们得30%。大通有两个洋行，区政府就利用帮助洋行做事的曾子文代收，还利用大汉奸吴智和下面的人，在大通一带收税，他们按时交税款，这边及时付报酬，通过说服和引导，他们也乐意这样做。起初他们不免有贪利之嫌，后来逐渐走上联共道路，便真心实意地为民主政权服务。

一次，税务人员正在收税，日本兵穿便衣夹在挑担子的人中间，冷不防拔出手枪，将童埠税务所干部朱世春和贵西税务所某干部抓走，后到附近的一个伪保长家吃饭，因童埠区委、区政府曾对这个伪保长做过统战工作，该伪保长对日本兵说：“这两个

人不是收税的，是普通老百姓，我可拿全家性命担保。”两名税干这才脱险。

三、武装工作

青阳县委成立伊始，就重视发展地方武装，把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任务付诸实施，先后在牛山、乔木、宾木、火焰山、茗山组建了抗日自卫队和民兵大队。这些武装组织有力地配合了新四军的活动，狠狠地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青阳人民的抗日斗志。

（一）牛山抗日自卫队

牛山（即石壁）位于青阳北面与南陵、铜陵交界，是丘陵地带，地势险要。1938年9月间，新四军政治部派三团指导员梁作吉来牛山一带开展民运工作，发展党员，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当地的一些群众在新四军和地方党抗日宣传的影响下，以袁锡兵、胡镜珍（胡景珍）为首积极组织力量，开展对敌斗争。开始只有十儿人，几条步枪，经过几个月的发展，迅速扩大到百余人，并与梁作吉取得了联系。遵照党提出的扩大统一战线组织，共同抗日的主张，胡镜珍向县长操竹友汇报了地方抗日武装的发展情况。操竹友当即同意建立武装组织。于是，1939年初，正式成立了“石壁乡人民抗日自卫队”队长胡镜珍，副队长袁锡兵，徐天一负责政治工作，梁作吉为军事指导，詹高胜任副官。自卫队下设3个分队，一分队队长汪亭全（汪庭乾），二分队队长江子杨，三分队队长傅成宾，黄金山、马新文搞侦察工作。

日军侵占店门口等地后，经常三五成群地到处活动，烧杀淫掳，残害百姓，但在牛山一带，每次都遭到自卫队的痛击。

此外，自卫队还担负着为新四军探听消息，搜集传递情报等任务，并配合新四军打击敌人。

1939年10月，正当自卫队准备进一步发展时，由于劣绅章寿恒告密，国民党右派县长莫寒竹以集中“听训”的名义，把大部分自卫队员诱至朱备店收缴了武器，解散了人员。詹高胜、汪亭全、肖少春等20多名党员和部分队员没有受骗，跟随梁作吉参加了新四军。

新四军紧接着派刘妹钟来牛山一带召集被莫寒竹解散的自卫队员成立了“猎户队”，从十几人逐步发展到三十多人，有机枪1挺，步枪若干支，猎枪20余支，队长胡镜珍，属牛山区委领导。

（二）乔木抗日自卫队

1939年7月，乔木区委成立后，在积极进行宣传、组织发动群众抗日等工作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兵组织。不久，就发展民兵100多人，成立了“乔木抗日自卫队”，下设十几个小队，拥有步枪40余支和部分土枪，活动在石安以东直至黄荆塔，方圆20余里的地区。他们的任务是配合新四军游击队站岗放哨，探听消息，搜集传递情报，打击敌人，铲除汉奸，维护地方治安。

另在开展减租减息中，抗日自卫队也发挥了作用。

（三）宾木抗日自卫队

宾木区的抗日自卫队是由石壁抗日自卫队所属的第三分队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的，编有两个连，队员有 100 多人。一连连长陈光辉；二连连长余德荣，有步枪 50 多支，连部设在清水塘。宾木自卫队有力地配合了新四军的活动，推动了区委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火焰山抗日自卫队

火焰山抗日自卫队是从农抗会中组建起来的。他们将农抗会中 18 至 50 岁的会员组成自卫队，共有 40 多人，3 条步枪，还有一些子弹和手榴弹。沈杨华任队长，陈顺(陈子贵)任教练，特务长沈培初。自卫队员每人都有代号。他们白天生产，夜晚巡逻放哨，维护地方治安。

1938 年 8 月的一天，国民党新七师三营一连 10 余人夜里窜到马家龙，抢劫藏在地主许贵荣家上交农抗会的 50 担稻，自卫队得到消息后，沈杨华队长带 8 个人迅速追去，将其赶走。同年底，城关光明村房屋遭日机轰炸，一日，新七师的散兵趁火打劫，被自卫队击溃，并缴获了 4 枚手榴弹，2 把大刀。

（五）茗山民兵大队

为配合新四军对敌斗争，该地党组织开展了民兵参军参战的宣传动员工作。开始报名参加民兵只有十几人，成立了茗山民兵小队，队长叫江有山。半年后，民兵发展到 70 余人，民兵小队改为民兵中队，中队长江有山。1940 年下半年，尹彬来到童埠，进一步向群众做政治思想工作，宣传参加民兵的重大意义，动员

群众进行抗日，参加民兵。之后，民兵发展到 100 余人，成立了 4 个中队（按保成立的），其中朱家村和店门口为 1 个中队；老山和桃子龙为 1 个中队；乌鱼塘和陀龙为 1 个中队；茗山为 1 个中队。总负责人尹彬。至 1942 年 12 月根据斗争需要，且便于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将 4 个民兵中队编为 1 个大队，大队长由汪爱亭担任。其中，18 岁到 40 岁为基干民兵，40 岁至 50 岁为普通民兵。基干民兵的任务是向地主、土豪借粮借款，阻挠敌人，破坏交通，切断电线，开展游击斗争，配合新四军和游击队作战；普通民兵的任务是为新四军和游击队运输、送信、送粮、站岗放哨等。1943 年下半年，民兵发展到二百余人。至 1944 年 7 月，达到七、八百人。

上述抗日武装组织，初始人数都不多，武器装备也都很差，物质条件非常困难，但这些自卫队（民兵大队）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有良好的群众关系。队员大多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能英勇参战，所以，他们在抗日实际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战歌，演绎了精彩的一幕幕悲壮感人的画面，为青阳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秘密工作

逆境造就强者。青阳地方党组织深知秘密交通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在县委成立的同时，就成立了“秘密交通组”，组长朱国安，组员：朱怀宗、王镇国、王济川。并在杨田上王祠堂设立了“秘密军事情报组”（对外称“难民收容所”），由许英汉负责，

机要交通王镇国。之后在全县境内先后建立了十余个地下交通联络站、点，以利沟通皖南沿江与山地等游击区以及有关地区党组织之间的通讯联络。地下党以杨田交通站、常备队秘密党支部、盘台交通站为中心枢纽，机智勇敢地同日、伪、顽展开无声的、艰险的斗争，密切地配合了沿江和皖南山区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搜集传送了大量情报，运送了许多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多次护送和营救革命人员，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

（一）地下党组织与联络站点的建立和发展

县委下辖的三个秘密党支部是青阳地下党组织的起源。此后根据斗争需要，又陆续建立和发展了多个站点。

1939年3月，陈法周在杨田青石岭设立了交通联络点，负责人章树枝，主要掌握青石岭一带的情报，担负东北边党组织与万脚岭，西边与涧上施、鸭子湖、将军庙、朱备店之间的联络任务。

1940年春，县委在杨田梅溪陈建立了“杨田交通站”，指定由陈法周直接领导，站长杨斌，站员：陈青、朱怀宗、王镇国、李龙保，并成立了地下交通党支部，支书王镇国。

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调兵遣将对皖南地区的抗日军民开始镇压，斗争形势迅速恶化。国民党青阳县政府亦加紧了布控、四处捕杀共产党员。皖南特委指示青阳县委机关和已暴露的人员迅速撤回军部，留下陈法周负责青阳工作，坚持斗争，之所以考虑陈法周留下，有两方面有利因素，

一是当时陈法周没有暴露身份；二是陈法周的叔叔是青阳很有名望的士绅，便于今后工作的开展。其时，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有杨斌、陈法周、陈青、汪家骥、陈法顺、李龙保、王镇国、朱怀宗、陈雨、吴奎顺、王达成、陈锦奎以及常备队中秘密支部的十几名党员。

莫寒竹下令解散“特工团”后，党组织决定李景白到杨田东山脚下的云龙庵办一所私塾。召集原话剧队员来私塾学习，该私塾成为青阳地下党组织和皖南特委等各级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1940年12月底新四军军部奉命撤离泾县云岭准备北上。青阳地下党负责人陈法周针对当时情况，派王镇国、朱怀宗去新四军参谋部送情报，并请示工作。朱、王赶到军部，军部已做好撤离准备，拟次日晨向泾县章家渡方向转移。朱、王在军参谋部见到黄诚（军政治部秘书长），向黄具体汇报了青阳的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黄听后，当即指示今后要坚持地下斗争，灵活机智秘密开展活动，并用米汤在纸上写下了密信，叮嘱当面交给青阳地下党负责人陈法周。随后朱、王化装成商人，挑着藏有密信的两担大裱纸，转道从青阳北乡老虎坑返回梅溪。陈法周接信后，将信放在清水里浸泡了一会，信上的字迹清楚地显示出来。主要内容是坚持青阳地区的任务及联络暗号。

1941年3月，地下党负责人陈法周召集了乌株山支部书记汪家骥（化名“万一”），常备队秘密支部书记陈文堃（化名“亚求”）在梅溪开会，研究今后工作。经过对形势的认真分析，一致认为

首先要与上级接上关系，取得联系，其次要积极依靠群众广泛建立秘密交通点，稳步地发展党员；第三要加强统战工作，多方搜集情报，搞枪支弹药，观察敌情，迅速开展地下对敌斗争。不久，坚持皖南山区的胡明同志派交通员朱义南来到青阳梅溪何家店朱怀宗家对上暗号，接上了关系。随后陈法雨随朱义南到山里见到了胡明，并带回“入党志愿表”样。

三、四月间，陈法周和许英汉研究决定派交通员李龙保到茗山地区寻找党组织，很快找到了许章法、尹彬，向他们汇报了情况。由于此时许章法不了解青阳情况，存有戒心，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搞1挺机枪；二是要求许英汉在一个星期内交来青阳国民党军统密码，如能办到便给接关系。李龙保迅速赶回向组织作了汇报，于是，在陈法周的安排下立即将陈文堃早就搞到的1挺机枪取出，派杨斌、王达成送到茗山，许英汉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青阳地下党便与茗山、铜陵接上了关系，之后通过地下党的活动，使沿江地区杨明部和山区胡明部两地之间取得了联系，这样山区和沿江地区的抗日、伪、顽斗争遥相呼应、互相支援，变得更具有战斗力。

同年夏，洪林率一排人到青阳盘台，汪柏良派章贵（王锡旺）接应，洪林指示成立青阳盘台交通站，负责铜陵、茗山至黄山一线的联络工作，站长章贵。至1945年，建立了盘台党支部，章贵任支部书记，汪柏良向张良仕递交了党员名单，共有4名党员，即：黄勇、江柏荣、江志来和章贵。后来又发展了两名党员。

1943年初，经过青阳地下党的活动，并在陈次权的帮助下，许英汉从南陵国民党调查室打进了青阳国民党调查室，加强了青阳地下党的力量。

1944年6月，青阳县地下党为了扩大交通网，在笔架桥设立了一个米厂，作为通讯联络地点，派张孝祥、陈法顺以做米生意为掩护，收集和传递情报。

1946年7月，陈法周将杨田镇“永安布店”（联络点）迁至县城东街挂牌为“大华布店”，店员大部分是地下党员，有施治平、王庭栋、陈根保和从上海派来的地下党员余起、王怀仁（由于2人语言原因，两个月后调离），负责人王庭栋，以采购物资为名与各地联系。

“永安布店”迁至城里后，地下党组织又指示杨斌、陈青、王镇国在原“永安布店”隔壁开了一个小店，挂牌为“京广杂货店”（亦称“永生杂货店”），以其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

（二）地下党活动的情况

1、搜集传送情报

青阳常备队中秘密支部以及分散在各处的交通联络站、点，在地下党的统一领导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地下交通网络，通过各种渠道为新四军和游击队搜集、传送了大量情报，有力地配合了各游击区的斗争。情报来源渠道主要有3条：一来源于打入青阳国民党调查室的许英汉；二来源于青阳国民党常备队秘密党支部；三来源于“大华布店”交通点。

1942 年底，国民党进行武力“清剿”的同时，不断向游击根据地派遣特务，妄图瓦解新四军、游击队力量，以进行夹击。有次，打入调查室的许英汉得悉国民党三战区在派两批特务潜入铜陵、繁昌敌后，其一路准备从青阳县城经甘家冲去铜陵敌后根据地；另一路拟由青阳绕南陵到繁昌游击区。许英汉立即将这一情报送出，使游击区事先加强了防范和警戒。

地下交通人员送情报的方法很多：如先将纸伞键子拔下来，用很薄的纸写好情报放在里面，再将键子插上；有时塞在竹筒子做的棍子里，外面裹上泥土，有时把情报编在草鞋的后跟上，有时扮作菜农将信件藏在菜内，还有时缝在衣服里面（这种方法很少用，搜身时容易被发现）。情报内容一般都是密写的。

2、物资运送

青阳地下党交给各游击区的枪支弹药、布匹、药品和其它物资，也是通过各交通站和点、常备队秘密党支部、“大华布店”运作的。交通员陈青、杨斌、黄勇等为皖南特委、沿江工委多次送去生活用品、钱款、枪支弹药。

交通站有时用物资与国民党川军换武器、弹药。国民党川兵把枪放在柴担里，把子弹放在桐油里和交通人员交换。

1939 年深秋，国民党逃兵在杨田附近的村子里丢了不少枪支弹药，另外，冲里沈村还有 1 挺机枪，沈鹰指示在石壁“猎户队”搞抗日游击活动的新四军干部刘妹钟将这些枪支运到石壁去装备“猎户队”。杨田距石壁 70 里，路上要通过不少国民党岗哨，

为此沈鹰指示特工团的杨刚（秘密交通员）侦察运送路线，使这批武器安全地送到了“猎户队”。

1946年7、8月间，陈法周派陈青、黄勇送给黄山杨明部两担药品，两支手枪和数百发子弹；李龙保两次到茗山共送去十几条枪和数千发子弹。

3、营救护送游击队员

1940年4月，陈宗汉受县委委派到杨田地区整顿党的组织，行到半路被国民党逮捕。开始，县委找国民党县府交涉，他们当面矢口否认，背地里却令常备队严加看守。为了请功，还将此案上报了国民党“军政部”。常备队秘密党支部得知这一情况后想寻机放走陈宗汉，便派陈青送信给陈宗汉，但见看守十分严密，陈又被上了大镣，无法接近，一时犯愁。当时，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三曾亲自过问此事，县委指示陈文堃提供一个互换“人质”的机会，正好自卫团要买布做军衣，陈便主动请缨，经批准他和排长舒茂华等人带法币五百多万元去南陵县城买布，从青阳到南陵必须经过新四军驻地——南陵何家湾一带，新四军一支队三团接到情报后便在何家湾将陈文堃等8人扣押起来，送到铜陵水龙湖。国民党县府着了慌，派了国民兵团副团长李振楚和施玉松（地下党员）到水龙湖找二支队三团团团长黄火星交涉，开始黄佯作不知，让他们来回跑了几趟，以后又转弯子找到许英汉作谈判代表，此时陈法周又通过陈次权和其他进步人士对莫寒竹施加压力，在内外夹攻之下，莫只好同意互换“人质”。11月

13日陈宗汉被释放，陈文堃等人也回到了常备队。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新四军老一营营长率4名战士突出重围辗转来到杨田梅溪陈。此时，梅溪驻扎着国民党1个营加2个连的部队，还在村西头伪参议员家中设立了乡公所，山村路口有兵把守。黄营长和几个战士随时都会遇到危险。当晚，黄营长将4名战士隐藏在村边的小竹林里，独自一人来到许英汉的父亲许成修家（许和黄是老相识），许惊喜交集，立即找到陈法周汇报了情况。这时国民党军已发现黄营长等来杨田方向，正沿途搜捕过来，情况十分危急。陈法周见到黄后首先安排他们隐藏起来，紧急召集地下交通员王镇国、李龙保、朱怀宗开会，筹划护送之策。国民党军进村翻箱倒柜，进行了“仔细”搜查，整个村子闹得鸡犬不宁，但一无所获。当晚李龙保、王镇国、朱怀宗趁国民党军酒足饭饱进入梦乡之际，绕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终于安全地将黄营长等5人送到江北无为县的三官殿，找到新四军。

期间，云龙庵交通站杨刚也曾护送过史平、左英等到皖南特委机关，陈法周等曾先后护送刘妹钟、方向明、苏拓夫、陈中明等同志安全到达江北游击区。

4、除奸反特

当时青阳国民党有两种人气焰十分嚣张：一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头子，如参议长刘作盘这一类；二是小特务头子。地下党针对这种情况，采取相应对策。首先一个个摸清底细，再行正面或侧

面警告，对其中顽固不化的进行严厉惩罚，以杀一儆百。同年先后镇压了国民兵团副团长肖琿（肖全和）和军统特务李希圣。一时间大小特务惊慌失措，大多数被震慑，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

1946年秋，国民党三青团特务机关办了一份小报叫《利群报》（谐音三青团书记倪椿音），尽刊载反动文章，污蔑共产党。一次，《利群报》的头版头条登出“要想铲除青阳共党，首先要踏平红色的梅溪陈”。地下党陈文堃派秘密党员化装成便衣队，深夜摸进报社，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报社打得稀巴烂，迫使其停刊。

除上述工作外，青阳地下党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基于“持久战”理念，从长远考虑，在皖南事变后选派了九名儿童通过青阳县振济委员会陈次权介绍去太平儿童教养所学习，以培养抗日后备干部。这九名儿童是：王镇国、陈锦华、陈法宝、王道春、高文华、陈在林、沈世祥、陈南平、王玉。由王镇国带队，一切手续由地下党员徐育英办好，地下党组织找王镇国谈了话，发了介绍信，给足了路费。他们到校后，发现共产党员杨又华也在任教，这更加有利于儿童接受革命理论教育。这些儿童大节不夺，学习期间居然还闹了一次学潮，罢免了国民党何竺平校长。1943年春，九名儿童由地下党杨斌接回青阳，后都参加了革命，其中有的后来还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三）“特别联络站”

抗战时期，青阳的茗山冲是新四军、游击队的重要根据地。当时，有一个集枪械、被服、医疗为一体的游击队后勤秘密基点

——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就设在茗山冲的孙运丰家里，之所以称之为特别联络站，是因为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担任情报交通任务，它的运作是要在敌人眼皮底下隐蔽进行，在沦陷区担此重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孙运丰一家临风傲雪、舍生忘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能在紧急情况下勇敢沉着，机智灵活的对付敌人。

1942年到1943年间，茗山、店门口一带被日军侵占，经常对游击区进行扫荡。当时，游击大队被服厂，就设在孙家，厂内有17台缝纫机。一次，日军突然来袭，游击队来不及转移，缝纫机搬不了，只得将机头取下运走，剩下17台缝纫机座孙运丰便立即带领全家老小搬运并隐藏起来，当最后1台机座运上山时，日军闯了进来，在屋内经过一番搜索，未发现疑点，便沮丧地走了。

孙家不仅是游击队服装的生产单位，还是游击队的医疗机构，指战员负了伤，大都送到孙家护理。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医生，只有保健员，人手不够，孙家便协助护理工作，他们烧开水为伤员洗擦伤口和包扎绷带。有时，日军来扫荡，便背着伤员到后山隐蔽。

一次，日军闯进孙家搜查，硬逼孙运丰妻子方兰英交出新四军，她说没有。日军闻到药品味，便从楼上楼下、里里外外地翻箱倒柜搜查。方忽然发现墙角边有一团刚为伤员擦洗伤口的药棉，心里焦急万分，在十分危急之时，她急中生智，连忙抓起药

棉塞进嘴里，这才避开了日军的眼睛。日军搜索半天，一无所得，仍逼着她交人，而她始终一口咬定“不晓得”，日军恼羞成怒，狠狠抓住她的头发向墙上乱撞，直至她晕倒在地，才肯罢休。临走时，将孙家的门窗、家具砸得稀烂。

1942年，皖南特委派杨明带领4人同国民党44军所属的144师谈判。本有所进展，不料汉奸吴智和从中捣鬼，144师随即变卦，并扣住参加谈判的两位共方代表，杨明得知后，便在茗山冲隐藏下来，伺机营救。国民党军队立即赶到茗山冲，威逼孙家交人（即杨明）。他们采取野蛮粗暴的手段，折磨孙运丰的祖父，这位年已七旬的老人，知道杨明就在屋后山上，但又无法通风报信。当他们追问杨明在哪里时？他就故意大声嚷道：“我不知道杨明在哪里！我不知道杨明在哪里！”示意杨明赶快离开，国民党军问不出话，便用枪托向老人身上打去。老人被打成重伤，昏迷过去，刚一苏醒，便又咬紧牙关，爬向门口，继续地嚷着：“你们不要打我啊！我真不知道杨明在哪里！”果然，隐藏在后山的杨明，听到孙老的叫喊声，随即悄悄地离开茗山。后国民党军在孙家搜出了杨明来不及带走的东西，又气急败坏地将孙老毒打了一顿。

1945年10月份，新四军和皖南地区部分干部奉命北撤，留下少数干部和队员坚持斗争。这时，国民党地方部队活动十分猖獗，铜青南县委委员尹彬留在茗山为国民党部队所注目。一天，青阳常备队突然来茗山抓尹彬。当时，尹彬正带着幼女腊梅在孙

运丰家附近，尹彬怕带着小孩不便脱身，便随手放开小女孩，只身离去，女孩“哇”的一声哭起来，孙的母亲连忙抱起女孩钻进草堆，将奶头塞进孩子嘴里，才止住了哭声。不一会儿，常备队进了孙运丰的家，逼着孙运丰交出尹彬。孙的态度从容，一问三不知，残暴的国民党军将孙运丰和他的妻子，连同孙运丰祖父一起捆绑起来，拴在一根绳子上拖到池塘边，用粪瓢舀水浇头。就是这样逼供，他们三人也没有露一个字。敌人将他们推入池塘，灌了一阵水又拖上岸来审问。如此反复多次，还是一无所获。最后，由尹彬暗中托人出面具保，孙家人才被释放。由于工作谨慎，该站自成立到日军投降时止，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后来，孙运丰家一度成为童埠区委和区政府机关所在地。

第四节 青北工委及童埠区委和区政府

童埠地区位于青阳县北部，处于铜陵、青阳、南陵三县交界。地貌特征是三冲相连，三冲是：青阳境内顽占区的甘家冲，敌后地区的茗山冲，铜陵境内敌后地区的涧北冲。其中的茗山冲，涧北冲，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青北工委、童埠区委和区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以茗山为中心的铜青南抗日根据地的形成，青阳游击区面积达 370 平方公里，人口二万。根据地的形成成为铜青南县委的大后方，县委兵工厂、被服厂和医院均设在茗山，县委在此组织干部、战士边休整，边学习，还开展了小整风。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干群关系，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当时，这一地区曾被人们赞誉为“小莫斯科”。

一、青北工委的建立

1943年3月，中央指示“精兵简政”，铜陵敌前敌后县委合并，成立铜青南县委，县委书记由皖南地委组织部长张伟烈兼任，杨明为副书记，朱农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爱曦为宣传部长，许章法为委员。县委地址开始在雷家胡，两月后，迁至泉水坑，属皖南地委领导。与此同时，在青阳童埠成立青北工委，许章法兼任青北工委书记，副书记尹彬，委员有肖须知、闻鲁生。工委属铜青南县委领导。

当时青北工委下辖5个支部：茗山支部，支部书记汤可炳。毛竹园支部，支部书记鄢文满。甘家冲支部，支部书记徐心宏（后叛变）。石壁支部，支部书记姓郑。茅坦支部，支部书记（不详）。行政上辖有3个乡政府：茗山乡，乡长先是姓陶的，后是汪爱亭，指导员曾志英（后叛变）。涧北乡，乡长朱梦栖，指导员郑绍吉。天明乡，乡长郝先哲。

青北工委机关设在茗山，活动范围主要是三条冲和贵东等地。工委的任务，一是巩固和发展这块游击区；二是开辟贵池东部敌后根据地。

1944年1月，许章法调贵东县委工作，由副书记尹彬负责工委全面工作。

二、童埠区委、区政府（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与活动

（一）童埠区委、区政府的建立

1944年7月，陈中明调青北工委时，青北工委改为童埠区委，

同时成立了童埠区政府。陈中明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尹彬任副书记兼副区长。区委受铜青南县委领导（其时铜青南县委下辖七个区委，另六个是：沙洲、凤心、顺安、凤凰、五峰、何湾）。区政府受铜青南行政办事处领导。

区政府下辖五个乡政府，乡领导人有县委派的，也有地方上挑选的，其中：茗山乡长王爱亭，指导员曾志英（后叛变被镇压）。涧北乡，乡长朱梦栖，指导员郑绍吉。天明乡长郜先哲。景范乡长江晓龙。陀龙乡长姓甘，指导员李应山。

另直属区政府管辖的还有区武装组织童埠区队和青北税务分局。

1945年9月，陈中明调走，区委书记由尹彬接任。

日军投降后，皖南地区组织北撤，区委机关人员随之撤走，遵照上级指示，留下尹彬率领30多名武装人员，在茗山一带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直至解放。

（二）党组织的建设与活动

皖南事变前，茗山就建立了党支部。1938年，吴立基到茗山发展汤可炳、钱一贵为党员，1940年2月又发展了汪成铭、李德宏等7人为党员。同年5月，在天明山成立茗山党支部，党员有十六、七人，规定每月交党费1个铜钱，或一颗子弹。

皖南事变时，茗山党支部被迫解散，一些党员以农抗会员、妇抗会员的名义自首了，但未暴露身份，而且还有党员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1942年12月，尹彬从皖鄂赣区党委训练班学习回来，奉命到青阳甘家冲、茗山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尹彬来茗山冲时住在孙家村，首先通过方松林、江友三、汤可炳等人了解情况，然后着手恢复党组织。1942年底，正式恢复了中共茗山党支部，党员有方松林、江友三等人。支部下辖毛竹园、甘家坑、石壁3个小组，共有党员40多人。

1943年四、五月间，贵池茅坦杜村有位塾师杜某某，来涧北冲设馆教学，在抗日救国宣传的影响下，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除此以外，还通过茗山冲一些党员，利用社会关系，在茅坦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从青北工委到童埠区委至日军投降时止，这一地区先后建立了九个支部，发展党员一百多人，其中有区机关支部，书记尹彬；武装区队党支部，书记张亚东；天明乡党支部，书记郜先哲；茗山乡党支部，书记汤可炳；陀龙乡党支部，书记罗万祥（后叛变）；另涧北、石壁、梅埂和贵池茅坦党支部，书记姓名不详。

（三）政府工作

区政府成立后，一面领导群众进行武装工作，一面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并实行了民主改革。

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减少群众抗日抗顽的后顾之忧，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对顽固不化的地主分子展开斗争，同时对烈军属给予适当的生活照顾。

为了保证革命工作顺利进行，确保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区

委、区政府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召开了5个乡的国民党乡、保长会议。在会上宣传党的政策，并提出要求：1、不准暴露我们的情况；2、日军抓了我们的人要设法营救；3、向我方提供情报；4、揭露日军和汪伪军队的罪恶事实。这样，迫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向根据地进攻。以上这些做法，对童埠区的各项建设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维持会长罗华栋等和区政府建立了联系。但是也有少数顽固分子，暗中给日军通风报信，透露根据地的消息，煽动群众不要听共产党的话。对这类反动派，区委、区政府给予坚决镇压、狠狠打击，确保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四）武装建设与活动

政府成立以后，从各地游击队和民兵中抽出一部分武装力量成立了区队。区队长先后是杨林、陈中明；区队副先后是尹彬、张亚东。区队有50多人。区队下辖涧北、茗山、陀龙3个乡的游击队。涧北游击队长袁丙金，茗山游击队长施小牛，陀龙游击队长李有山。全区有游击队员100多人，40多支枪。

1945年元月，区队长改由陈中明兼任，区队副张亚东，副教导员由尹彬兼任，区队会计郑开烈。区队统管全区武装和地方民兵，在区队下面建立1个警卫连，下分3个排，实际上只有一、三两个排，二排是虚设的。连里武装人员有60人，连长王云峰（外号王驼子）。其中一排30人，排长潘某；三排30人，排长不详。当时连里只有三、四十条步枪，其余都是土枪、大刀。区队武装经常在甘家冲、乌鱼塘、陀龙、茗山冲、杨水冲、石壁、

凹岭、大寺阁、董家店、大通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1945年5月间，一排长潘某与连长王云峰因为伙食问题争吵起来，嚷着到区里评理，潘某把队伍集合起来拉到钉耙冲，向王连长开一枪，致王胸口受伤。潘某对士兵说：“我不干了，哪个愿意跟我走，投日本人去。”不愿意跟潘某走的人，把王连长扶起来，潘某带走十多人投日去了。县委知道后，下令将各区武装集中整训，不久编入县总队，童埠区张亚东带队，由他代理连长，编了两个排，每排30人，一排排长查策，二排排长姓苏，名字不详。

区队因潘某叛变投敌，后集中到县训练，重新抽调人员成立了小队，下设两个班，每班10个人，一班班长张金洲，二班班长徐德和，因为工作需要，徐德和后来调区里任警卫员，钟德胜接任班长，由从县总队调回的张亚东任区小队队长。

同年6月间，游击队20多人到丁桥街活动，有人透露了消息，李效廉带二、三十人赶来袭击，游击队边打边撤，李不敢追击，游击队未受损失。

不几天，李效廉又带100多人到丁桥狮子山攻打丁桥税务所，区小队武器少，新兵多，张亚东命令徐德和把队伍带到安全地带，只留下张金洲、钟德胜、张老六、罗信根和他自己5人，坚持战斗，以村子里围墙为掩护，和李效廉部队激战40多分钟，后左秀东带铜陵大队一个排来助战，打跑了李的部队，保住了税务所。

此后，奉杨明指示，游击队组织一个连偷袭了李效廉部一个

排，俘敌人 2 人，缴枪 5 支，迫使李部撤出了永存桥。

6 月底，区小队武装开到乌鱼塘、陀龙、长山门、十二里半一带开展敌前游击活动，开辟新的地区，帮助地方组织民兵，建立党组织。之后，民兵组织得到了很快发展，几乎每个乡都有二至三个基干民兵班，各乡基干民兵有 40 多人，普通民兵有 70 多人。8 月初，驻扎在童埠区杨家潭日军，为控制贵东茅坦到大通的要道，日夜赶筑碉堡。茗山地区民兵，积极配合游击队，拔掉了这个钉子。

日军投降时，童埠区小队开到店门口一带，准备接收日伪枪支，此时国民党李效廉部队也到乌鱼塘接收日军投降，走到朱家渡，想渡河到茗山袭击童埠区委，正在渡河时遭区小队迎头痛击。李部只好缩回。

在这之前的 1944 年，童埠区委争取了一支土匪武装，这支土匪武装共 70 多人，接受了改编。由江小龙任队长（原是土匪头子），徐某任队副，王少明任指导员，童埠区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不久，因江小龙匪性难改，被国民党木镇乡长李效廉收买叛变了，把徐某和王少明诱至送木镇乡公所，将他们杀害。尹彬知道后，立即派人抓住叛徒江小龙送交铜青南县委惩处，其后，这支收编的土匪武装，还是脱离了革命阵营。

（五）税收工作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的军需民食。在“皖南事变”后的 1941 年 12 月，成立了青北税务所，属铜陵敌后县

委领导。童埠区委、区政府成立后，税收工作直接受区委、区政府领导。

1943年春，根据地扩大，皖南地委批准铜青南县委成立货管科，科长张树仁，副科长查光耀（查光跃），同时设立青北、沙洲、顺安、荻港4个分局。

童埠区税收工作由童埠、朱渡、丁桥3个税务所负责。税务所统属青北税务分局领导，局长高峰、副局长朱坤。童埠税务所有八、九个人，所长王兴隆，副所长兼会计孙科（孙运松）；丁桥税务所3人，所长邹坤，税务员芮胜；朱渡税务所七、八个人，所长张进，副所长兼会计赵云（赵英）。

税收规定：行商税按货物价值征收，棉布征收商税8%至10%；化妆品征收行商税50%至70%；迷信品征收行商税60%至80%。鸦片烟计征行商税50%至70%。自税收政策颁布后，行商人员一般都能按照税章规定交税，对偷税漏税的货物全部没收，交税的当场给税票，没收的货物，发没收证。

童埠区每天收税大约30万元（伪币），其中童埠税务所每天收款大约20万元；丁桥税务所每天收款约5万元；朱渡税务所每天收款约5万元。30万元伪币在当时能买稻谷300担。童埠区税款送交青北分局，青北分局再送县货管科。1944年夏天，仅两个月时间，青北分局就给货管科送去6个挑子伪币。

税务人员的报酬为每人每月大米75斤，一年1把伞，两双布鞋，两套夏衣，1套冬衣，另外每人每月发黄烟半斤，所长以

上干部每月加发小刀牌香烟 5 包，猪油半斤。税务人员的生活虽然很苦，但从不花公家 1 分钱。童埠区使用的税票是上面发下来的，开始是临江办事处发，铜青南县政府成立后由县政府发。每隔几天送一次，收的钱存放在可靠的群众家，集中上交。

在收税的过程中，日伪军经常穿便衣夹在挑担子人中间伺机破坏，国民党特务施小兵曾用手枪威胁收税人员，这给收税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但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税务人员都能与日伪军周旋，临机制变，坚持不懈，出色地完成任

第五节 新四军与青阳地方武装对日、伪的战斗活动

一、新四军在柯冲伏击日军

1939 年 1 月的一天晚上，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一营二连接到命令：组织一个突击队夜间去柯冲设伏，连长陈荣生点兵点将，挑选了既年青又精干的战士、班长、排长 25 人，加上自己和一名通讯员，总共 27 人，组成了突击队。

出发之前，召开了突击队员会议，会上，赖正刚指导员作了动员报告。当夜 10 点多钟出发，到柯冲后，侦察了周围的地形。此冲里村庄大，村西头约二百米处有一座关公庙，庙后是菜园地，为防止猪鸡吃菜，用土打了一米多高的围墙，围墙外就是高山，长满了冬青树和小竹子，庙门对面 100 米处是由东往西流的涧溪沟，同样竹树茂盛。日寇要从丁家桥来柯冲，必经庙门口。看完地形后，队伍在庙门口集合，陈连长又作了具体部署，强调：这次主要是活捉鬼子，如鬼子来了三、五人就活捉，要是鬼子来十

几人，就打；超过二十人，则避其锋，截击尾，等他抢了东西往回走时，跟在后面追打，把东西打下来，交还老百姓。宣布完后划分为3个战斗小组：第一组由连长带领10人，在关公庙西头200米处的常青树林里埋伏；第二组由二排长带领8人，在关公庙小竹林中埋伏；第三组由四班老班长带领9人，在关公庙对面涧溪沟南边埋伏。3组形成三角形，各自进入埋伏点，严阵以待。是夜，大雪盖地，天气酷冷，他们手脚冻得麻木。天亮见晴，上午9时许，有几个日军骑着马向埋伏圈冲过来，张有道轻声向二排长报告鬼子来了，排长以手示意大家准备打。鬼子来了不少，前后约百余人，当经过连长埋伏地时，连长未打，当鬼子距关公庙30米处，进入排长伏击点时，排长一声“打”。多个手榴弹在马群中爆炸，鬼子人仰马翻，后续日军两次扑来，都被打下去。因为有围墙作掩体，日军无法进攻。一部分日军以手榴弹、小炮弹的烟雾为屏障，从左边绕到后面，1发子弹从张有道身边飞过，这才知道后面有鬼子，张回头一看，4个鬼子正端着刺刀冲来，张立即越过围墙，1颗子弹打在右手，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张用左手投了1颗手榴弹，炸得鬼子哇呀直叫。趁烟雾障目，张跑进了小竹林，手仍流血不止，在竹林遇到1位战士（闵东人）。他看到张受伤流血，用自己的绑腿布给张包扎好。两人一合计，再出去打，刚出竹林，看到了班长和一位战士牺牲了，另4位战士受了伤。二排长正在竹林中向山下扔手榴弹，三班战士在涧溪沟向敌后续部队射击。日军指挥官背后，正是连长带领的一组，他

们从树林中出击，首先把指挥官打死，接着在日军后面猛攻。通讯员端着冲锋枪对敌群猛烈扫射，无数的手榴弹象冰雹一样飞向敌群。鬼子三面受到夹击，也不知道新四军有多少人，丢马弃尸，夺路而逃。这时连长指挥战士阻击，鬼子伤亡很大。鬼子溃逃时，柯冲人民几乎全村出动，拿着扁担、锄头、铁锹、棍棒，喊声震天。有四、五个鬼子倒在庙门口，其中1个没有死，躺在地上还在瞄准，被战士击毙。庙后也有两个鬼子死在那里，是被手榴弹炸死的，路上和田埂上死伤的马横七竖八地躺着。战士们带领群众拿下马背上的东西，除马鞍、军毯外，还有许多空麻袋，说明了日寇来这么多是为了抢东西的。这时，连长从树林里跑出来发现张有道受伤，随即吩咐张骑匹马回去，这时，西边5里路外，机枪、手榴弹响声阵阵，陈连长知道这是邱营长带的一连人与鬼子接上火了。

二连突击队出发后，邱营长就带领一连从丫山转到青阳中分村至石壁之间山上埋伏，以防丁家桥鬼子抢劫。丁家桥鬼子没去丫山，而直接往柯冲走，正好是营长埋伏地。营长看鬼子较多，就没有打，听到柯冲机枪、手榴弹打得很激烈时，他断定是二连与鬼子打起来了，立即率一连向柯冲增援，恰巧半路上（即团山脚附近），遇到溃不成军的鬼子拼命往丁家桥跑，在营长指挥下，一连迎头痛击，把鬼子打得七零八乱，有个鬼子躲进灌木丛中，团侦察参谋温国德欲进去活捉，不意被鬼子击中，战士们火了，将该鬼子打死。

战斗结束后，柯冲老百姓把伤员抬到铜陵凤凰山团部卫生队，把牺牲的战士装殓送葬。二连通讯员在作战中腿被打断，隐在树林里，他数着鬼子抬回死伤者有 50 多个。通讯员在这冰天雪地的树林里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柯冲人民才找到他。当时，还有一位战士失踪，第三天柯冲人民继续帮助部队找，忽听到密林里有微弱的声音在哼，正是这位失踪的战士，他已在冰天雪地的树林里度过了两夜，经过抢救，脱离危险。

是役，击毙日军 30 余人，击伤 30 余人，缴获战马 4 匹及武器、军用品多件，新四军牺牲 5 人。这是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从南陵弋江镇、蒲桥转移后的首次大胜仗。为此，团部在铜陵凤凰山召开了军民庆功大会，把缴获的战马、枪支、弹药和其他战利品，摆在会场周围，让群众参观。会上，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讲了话，他说：“抗战必胜，投降必亡，我们军民只有合作，抗日力量才会壮大……”孙仲德团长在会上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会议之后，铜陵、青阳、南陵 3 县边界人民抬着整猪、鱼、鸡、豆腐、粉丝、酒、香烟等，敲锣打鼓来慰劳部队。

二、牛山抗日自卫队袭击日军

1939 年 3 月 27 日夜 4 时，牛山抗日自卫队大队副袁锡斌，率第一分队队员 10 余人，袭击鳖形山日军哨棚，毙日军 3 人，缴枪 4 支，缴获毒瓦斯、钢盔等战利品多件，袁锡斌因伤阵亡，队员们义愤填膺。4 月 21 日晨 5 时，第二分队队长率第一班队员 12 人，再次袭入日军哨棚，毙日军 8 人，缴获三八式步枪 3

支，并缴获钢盔、望远镜、日军文件等物。

是年7月19日，日军窜扰牛山地区，据守狮形山的牛山抗日自卫队与之激战一昼夜，将被日军攻占的阵地夺回，驱敌于数里之外。是月27日，乘胜收复洛家潭，俘获维持会副会长，并缴获3支步枪及大旗、伪钞等战利品。

是年，曾将缴获的战利品，送往当时国民党青阳县政府所在地朱备店陈列展览，受到当地驻军、各机关团体的赞扬。皖南动委会委员范治农亲临慰劳，国民党一四四师奖给步枪40支，2000发子弹，50颗手榴弹，皖南行署传令嘉奖，并拨付奖金150元。

三、茗山民兵敌后游击战

抗战期间，茗山民兵在茗山、童埠一带敌占区内，配合新四军、游击队开展抗击日、伪的游击战争，打了好几个胜仗。1943年5月，茗山民兵配合新四军一个排，夜袭大寺阁汪伪军据点，经过激战，活捉汪伪军4人，缴获电话机1部、步枪4支及一些弹药。1944年3月，日、汪军队为控制青阳地区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在青铜交界的蛤蟆岭修建据点，新四军皖南支队某排奉令前往袭击，由民兵队长江有山（汪呈铭）带领3名民兵作向导，星夜从茗山出发，次日凌晨抵蛤蟆岭埋伏。天明后，汪伪军8人前来施工，江有山击掌为号，潜伏在草丛中的队员跃出冲杀，汪伪军7人被俘，1人被击毙，8支步枪全被缴获。1945年6至8月间，茗山民兵200多人配合游击队一晚上把从大寺阁、杨家潭至大通15华里的电话杆全部锯断，切断了敌人的通讯，有力地

支援了大部队的行动。一日夜，由张亚东率领游击队员，将 100 多个炸药包运至童埠小洋桥南头碉堡下面，炸毁了碉堡和桥梁，断了日军退路，迫使日军缴械投降。

第六节 日军在青阳的暴行

1938 年 12 月，本县童埠、丁桥、木镇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自店门口至陈家大山一线，日军建有 10 余个据点，由日军一一六师团清水一二联队驻防。其兵力分布为：茶山、乌龙塘、曾形山、牌坊山等处共 500 余人；粽子店 100 余人；陈家大山、塔山共 200 余人；丁家桥一带 100 余人；店门口一带 100 余人；童埠、香山一带曾驻有日军炮分队。

日军侵略魔爪直接伸向青阳境内，狂轰滥炸，烧杀淫虏，暴行累累。

一、**轰炸：**自 1938 年 7 月至 1940 年 4 月 28 日，日军先后出动飞机 120 余架次，在蓉城、木镇、丁桥、庙前、陵阳等地区投弹 370 余枚（内有毒气弹、燃烧弹数十枚），炸死、炸伤军民 380 余人，炸毁房屋 300 余间，仅 1938 年 9 月 25 日一天，日军即出动飞机 25 架次，分 4 批对蓉城轮番轰炸，共投弹 60 余枚（含燃烧弹数 10 余枚），国民党县政府房屋全被炸毁，城墙一段及六七十间民房被炸塌，蓉城一片焦土。担任城防的川军一四五师的 2 名排长及 20 余名士兵，在救火中全部殉难，民众死伤者多人。

二、焚毁：自 1938 年 12 月至 1945 年 7 月，日军先后对本县大举进犯 2 次，小股骚扰 5 次。每次所到之处，均放火烧屋。据 1945 年青阳县政府统计表载：日军几次侵扰，“共焚烧房屋 13413 余幢，车站、医院、仓库、船舶所共 20 余处”。1938 年 12 月初，日军进犯木镇，街上几百间民房、商店及大有蚕场 80 余间房，均被焚毁。1940 年 4 月，日军进犯青阳县境，共焚毁房屋 2338 间，木镇、杨田、陵阳、南阳湾一带众多村庄被焚毁，其中，南阳湾 20 余家店铺、陈鲍二氏祠堂、九华山东崖下院及九莲庵等 5 座寺庙悉成灰烬。

三、残杀：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扰青阳县境期间，共残杀县境民众 2080 余人（不含飞机投弹机枪扫射致死者）。城郊老屋村村民周天豹一家 7 口，被关在屋内活活烧死，村民张伯世等 13 人，被日军用刺刀戳死，陵阳有 90 多人惨死于日军机枪扫射下，九华山茅济庵尼姑亦死于日军屠刀下。此外，在占领区内，日军还以枪击、刀刺、火烧、活埋、试枪、绑在树上饿死等残暴手段，杀害民众多人。其中，3 人被绑在柱上饿死，罗夏季被关在住宅里四面放火烧死，施美珍被“试枪”打死。

四、奸淫：日军每进犯一地，都要强奸、轮奸妇女。青阳县境有 7 名妇女被奸死。1939 年 6 月，日军后藤大队官兵在乌龙村轮奸该村 14 岁幼女施美香，致其血流不止而死。1940 年 3 月，日军来井炮兵中队士兵 10 余人，在陈家大山附近村庄，狂饮后强奸高某之妻，高妻不从，被破腹致死。1941 年 3 月，日军杉

木大队，在茗山村轮奸村民李某之妻，奸后以刺刀刺其腹作乐，直至李妻身死。

五、关押：1942年8月，日军以核对“良民证”为由，将茗山、老山店门口及其周围村庄800余人，关押在店门口孙家大屋内，长达9天，每天只给一餐，且不时向室内施放“毒瓦斯”，民众致死十七八人，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六、虏掠：据统计，日军几次入侵，共虏掠县内稻谷23450担，大米11560余担，耕牛1530余头。猪、鸡、鸭以及衣服财物等则不计其数。

七、强派劳工：日军在沦陷区强派劳工去做碉堡，当挑夫，并不给饭食，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稍有违抗就将其刺死，仅1939年，日军为了修工事，就强征劳役6000余人次。

到日军投降时止，日军以轰炸、烧、抢等手段给青阳县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巨大的，据不完全统计财产损失达法币1346万元（以1937年7月法币计算），银元15200块。

①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

(1945.8——1949.9)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努力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国共双方先后签订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为使国内和平早日实现，中国共产党主动忍痛让出包括皖南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根据中央统一部署，1945年9月，皖南各地党、政、军组织随新四军北撤。中国共产党明白国民党是在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内战不可避免，因此，在新四军北撤时，留下了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坚持皖南沿江地区游击战争。10月，中共中央华东局考虑为了更好地坚持皖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决定增加武装部队，增派得力干部回师皖南。南返部队在铜陵汇合后成立了沿江中心县委，下辖铜青南、南繁芜两个县委。接着铜青南县委及其武装部队先后抵达以宾山为中心的泾青南山区，在该区初步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2月，皖南地委成立后，为巩固和发展泾青南游击根据地先后对青阳边区党组织作过几次大的调整。1947年上半年中共华东局发出“三八”指示后，形势发展很快，泾青南、铜贵地区逐步组建了县、区、乡三级民主政府。为策应大军渡江，1948年9月成立了中共皖南沿江工委，下辖六个小工委。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青阳县解放。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领导青阳人民解放战争的党组织虽几经调整，但一直没有间断过。青阳人民在地方党的领导下，配合部队、游击队及周边地区在山区和沿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巩固

了以宾山为中心的泾青南游击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策应了解放军渡江南进，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 铜青南县委及军事组织

皖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处于陵沪杭三角地带边缘，是南京的屏障，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皖南更被视为京畿之地。所以华东局决定派部队回师皖南，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英明决策。1945年10月初，杨明在无为奉命率新四军皖南支队三团两个主力连和警卫连大部约300余人返回铜陵。随后朱农、陈爱曦、陈尚和等人也奉命回到铜陵。南返部队命名为“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杨明为政委，查富德为总队副，钱秋育为政治处主任。编为一、三、五、七、九、十一区队，每个区队约为60人左右，其中，第一、三、五区队为总队主力，第七区队为铜青边区武装，第九区队为中心县委武装，第十一区队为南繁芜县委武装。同时，成立了沿江中心县委（后移驻太平县龙门王家山），杨明为书记、王文石为副书记，朱农为组织部长，陈爱曦为宣传部长，隶属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10月25日成立华中分局后，先后改属华中分局和皖南地委领导。

一、铜青南县委及军事组织的建立

10月10日，沿江中心县委于铜陵庵门肖村召开了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会议综合了当时的情况，分析了形势。认为：新四军北撤，国民党忙于接收大城市，暂没有力量接收铜陵，一

旦大城市接收完毕，国民党会派部队进行“清剿”的。要坚持皖南的斗争，必须做好战略性转移的准备。因此，会议确定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是：“背靠山区、面向平原、积蓄力量、隐蔽坚持，争取时机与胡明（山地中心县委书记，地点在黄山附近）打通联系。”会议决定成立南（陵）繁（昌）芜（湖）和铜（陵）青（阳）南（陵）两个县委。南繁芜县委书记王文石。铜青南县委组成是：书记朱农，委员陈尚和、周坚凯（陶刚）、尹彬。县委机关设在铜陵陈山冲。在铜青南县委成立的同时，成立了铜青南游击大队，大队政委朱农，副大队长左秀东，副教导员王克祥，军需胡永安。游击大队下设一个区队（称第三区队），有40余人（枪）。区队长姚生，区队副柯斌，指导员孙林，副指导员孙举东。

会议还决定，派陈爱曦、张良仕等带少数武装人员进军到青阳、泾县交界的盘台等地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建立隐蔽基点，以便在形势恶化时将主力部队迅速转入山区。

二、铜青南县委及军事组织的活动

（一）转移宾山，开辟新区

进山前的准备工作 铜青南县委根据中心县委的部署，第二天，便在铜陵天宝乡后胡村召开会议，就进山事宜作出了具体安排。县委着重抓了三方面工作：第一，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形势教育，打破和平民主的幻想，增强坚持斗争的信心。县委分析了坚持敌后斗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告诉大家：我们即将从抗日民主根据地转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武装斗争，主要敌人由

过去的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变为阶级敌人——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不但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有党政特一整套反动组织，并同地方土豪劣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我们即将进入的山区曾是新四军活动过的地方，不但群众基础好，且群山相连，进退有回旋余地，加上我们还有一批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骨干和坚强勇敢的游击队战士，只要紧紧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皖南山区地形复杂，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山区建立我们的活动基地，开展游击战争是有把握的。第二，在铜陵陈山冲召开了没有北撤的干部会议，讲清形势，指明出路。杨明、朱农参加了会议，会议进行了组织和思想整顿，妥善安排了北撤时留下来的伤病员，动员了一些没有北撤的干部参加部队，给少数害怕进山后生活艰苦、对革命悲观失望的人指出了三条出路：一是随部队进山打游击；二是由水路去苏北六合瓜阜找新四军；三是离开本地，到亲友处暂避，待局面好转后再回来。如果脱离革命，叛变投敌，则是死路一条。第三，积极筹措部队给养，解决部队冬衣和生活供给问题。随即各区、乡变卖了存放在各地的公粮，换取法币 500 多万元，银元 2600 多块；同时，用一部分公粮换回新四军发行的“大江币” 180 万元，并添置被帐，赶做服装，置办鞋袜，补充和改善部队装备，朱农还为部队安排了一船大米和五万元法币作为活动经费。

会后，陈爱曦、张良仕带部分武装人员，到达泾青南交界的

宾山地区与盘台党支部书记、交通站站长章贵取得了联系。并在宾山纸槽建立了立足点，至此，铜青南县委及所属部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作好了进山准备。

组织进山 正如县委分析所料，12月，国民党150师、162师开进铜陵，实行大规模“清剿”，形势迅速恶化，铜青南县委决定除留下陈尚和、尹彬、周坚凯等29人在铜青边坚持斗争外，部队和县委机关转入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地区。

12月20日左右的一个夜晚，明月皎洁，万籁俱寂。朱农率铜青南县委机关、县大队干部、战士共40多人，按张良仕等侦察后绘制的草图，由青阳籍战士吴驼子带路，隐蔽地经过铜陵盛家冲、南陵的丫山、青阳的石堰桥、老虎坑，进军到宾山地区二酉保水家冲，并在那里见到了先前进山的游击队连长姚生，与姚生等10多人汇合。

次日，他们登上宾山高峰，举目四望，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雄伟壮丽的崇山峻岭的画面：群峰起伏，连绵不断，山上修竹茂密，灌木丛生。远远望去，一片莽莽苍苍，部队隐蔽在这里相对比较安全。从地形上看，这里东到泾县的章渡乡，距原新四军军部的云岭只有30多华里；西临青阳的宾阴乡和乔木乡；北至南陵的刘店乡；南往太平，背靠山区，面向沿江，可进可退，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从环境上看，这里曾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与云岭一脉相连。叶挺军长曾用“云中美人雾里山”来形容它的锦绣美景。不仅因为云岭奇景美妙，更因为云岭是新四军的

摇篮，叶挺曾在这里指挥八省健儿汇成了一道抗日铁流，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云岭乃至四周的广大地区，又是“皖南事变”的战场，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这一事变，血的事实教育了人民，让人民更加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所以这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那就是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沉的爱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的恨。加之宾山地处三县交界，国民党政权统治薄弱，便于游击队生存和发展。有这样好的山区为依托，有热爱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广大群众的支持，又有如此广阔的活动余地，何愁游击战争不能获胜，皖南不能坚持？他们看了宾山的地形，经过研究，决定以宾山为中心，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相机发展力量，开展蒋管区的游击战争。

（二）进山后的活动

宾山虽然是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但相对来说，这里毕竟是新区，如何立足？这是县委、游击队必须思考的问题。当时，他们采取的策略是：

分兵游击，建立基点 进山后，县委认真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斗争方式和策略，讨论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认为要胜利地开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必须有几个立足点，以适应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于是作出了以宾山为中心的分兵游击的部署。县委决定：从1946年1月开始，将铜青南县委的干部和武装分成5个游击组，分散在各地活动：朱农和左秀东、姚生、孙林、孙太英、胡永安、柯斌等县委机关和部分武装人员，在宾山、宋冲、

苏家冲、刘店、大格里、乔木湾、云岭等地活动，以宾山脚下的二酉保、宋冲、大格里为基地，积极向泾县、南陵的童村街、烟墩铺、海井一带发展；王克祥带领六、七人，在泾县、南陵交界的田坊、孤峰、东山、三里店一带活动，尔后深入到南阳湾、九华山周围和贵池的石门高等地；陈尚和、尹彬、周坚凯在青阳的茗山冲立脚后转向铜陵、南陵两县交界的丫山、何湾、戴家汇一带发展，背靠天坪山，一边是铜陵，一边是青阳；2月，胡爱民、章贵带领六、七人在青阳、泾县边界的盘台、十里山向青阳的杨田、陵阳、南阳、朱备店一带活动；4月，柯斌同志到青阳、贵池边界开辟工作，（后来柯斌调回，孙举东接替），活动范围逐步向庙前、杜村、姚街、刘街、梅街、马衙、齐村柯、观前等地发展。

各路游击队分散活动，分兵游击，不仅牵制了敌人，而且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它像撒向各地的革命火种，把泾青南地区块块点亮。

避敌锋芒，隐蔽待机 分兵游击在当时虽是上策，但同时也带来了兵力分散的弊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县委、游击队采取避敌锋芒，隐蔽待机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为了隐蔽，同时，也为了不连累群众，游击队一般都在山上自建的山棚中宿营。他们用竹木扎成支架，上盖茅草，拍打严实，棚内垫上稻草，将被褥铺在上面就可以休息。有的战士把毛竹片用葛藤绞起来，做成有弹性的“床”。有的山棚搭在流水沟上面，流水从下面过，

非常凉快，夏天还盖棉絮。有的在山棚的内壁糊上报纸，把山棚打扮得十分漂亮，可以看书看报。在宋冲、水家冲、大格里等处后面深山里建造的山棚都很隐蔽，除自己人以外，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种建在悬崖上面的山棚则更隐蔽，崖下是一条水沟，进入这个山棚需先从水沟中涉水过去，不留脚印，由悬崖边攀藤而上，进入棚中。当时有人编出顺口溜：“山高林深无人到，革命山棚溪边造，四周宁静无声息，独有树上鸣‘知了’，战士归来棚中靠，争道这边风景好。”

白天烧饭会冒烟，国民党军常常派人在各山头窥探，寻找冒烟的地方，然后追踪而至。因为他们知道冒烟之处，不是烧炭，就是游击队生火做饭。游击队便把烧饭时间改在黎明前或黄昏后，这样远处就看不到烟。如果需要白天烧饭，初始用木炭，木炭不免还有点烟，以后就捡那些已经枯死、但还挂在树上的未吸到地面潮气的枯枝来烧，这样便看不到一点烟。

为了避开敌人，游击队一般白天不行动，而在夜间执行任务。国民党军为了摸清游击队行踪，常常使用一些诡计，但都被游击队识破，例如：在泾县的坎上王一带活动时，国民党军就在一些要道上撒放一些枯竹丝和小弓形瓦，雨天则在路上放一些稻草，如不注意把这些标志物踏碎、踩乱，在稻草上留下泥土，对方就会据此判断大约有多少人经过，向哪个方向走。针对这种情况，游击队常常是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不走走荒径，使对方的诡计落空。又如，黑夜行军，战士们常用右手拄个棍子。有一次在泾

县厚岸十里山，国民党军就是从棍印来判断游击队行军的方向和人数。后指战员改为左手拄棍，从而使对方对行军方向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还有雪天走路，国民党军也会常常跟踪而至，他们由脚印判断前进方向和人数。所以，在下雪天，战士在布鞋外面，总要套上掉过头来的草鞋，本来向东行军，他们以为是向西走，结果又迷惑了他们。夜晚行军，要是进入村庄，村子里的狗十分可恶，稍有声响就狂吠不已，易暴露行踪，游击队称这种狗为“狗特务”。为了避开狗，只好绕开村庄前进。若非经过村子不可时，则拉开距离，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地蹑起脚缓慢通过。脚步落地很轻，没有响声，狗也就不叫了。有时，下山执行任务，战士们故意在国民党保长面前今天称某某为“张队长”，明天又改称他为“王队长”，使国民党摸不清到底是什么部队，究竟有多少人。

那时公家发的布料是全白的，易暴露目标，战士们便从山上弄来紫叶或籽树叶，这种树叶一煮就熬出黑汁，染在布上不褪色。大家就采取这种方法将衣服、背包全染成黑色，这样一来部队的行动方便多了。

夜里行军为了使后续部队不掉队，每个战士背包上都拴上一条白毛巾，后面人看着前面的白色跟着前进，尽量不发出声，咳嗽时用毛巾捂着嘴。雪天行动，走在同一个脚印里。在深山密林，落下的枯叶较多，易留下痕迹，走在最后的人则将树叶翻过来，恢复原状，消除痕迹，避免对方跟踪。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县大队由宾山地区转移到太平龙门草

滩，在途中与国民党保安团遭遇。交火后，游击队感到不利，便主动撤走。保安团紧追不舍，游击队一个炊事员被打死。因路上有积雪，脚印难以摆脱追敌。这时，部队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有水沟，游击队急忙叫人借来梯子，让部队下到水沟，沿着水沟走。为了转移视线，另派五个战士继续过桥踏雪前进，爬上高山，并派出哨兵观察。国民党军跟着五个战士的脚印走了许多路，却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他们哪里知道游击队员会在这么寒冷的天，涉水而行。随后，游击队转移到龙门地区的黄金坞、小河口、黄金滩、米季坑一带活动，在米季坑搭盖了山棚，建立了基地。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队则避其锋芒。一次，川军一五〇师两个营部队配合国民党的县常备大队共 1000 多人来宾山“清剿”。游击队刚到山腰的树林里，哨兵报告：发现山上山下有国民党军包抄过来，游击队处于上下夹击的危险境地。朱农当即命令大家沉着应战，充分作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不准发出一点声音，不能暴露目标。所幸敌人并未发现，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损失。

还有一次，南京派来一个宪兵连进驻乔木湾。该连武器精良，装备很好，他们来是因为九省长途电话线被游击队割断，南京同各地联络中断，上司严令他们限期修复并保护电话线。这个连深入游击区后，贪生怕死。所以，他们一到就放出话来，说来的任务只是看守电话线。言外之意是只要游击队不动电话线，他们就能交差，别的事不管。游击队经过分析后认为，既然他们是保护

电话线，保证电话畅通，那么，如果打这个连，就会暴露自己，招来麻烦，反而不利。因此，游击队既不破坏电话线，也不打宪兵连。一个月之后，他们就撤走了。

走村访户，发动群众 县委、游击队清楚地懂得，要想在根据地扎根，群众是基础。群众的支持与帮助是游击队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自然成为县委、游击队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于是，他们从山上到山下，从冲里到冲外，开始了艰难的走村访户活动。

1946年的正月初一，朱农带领两名警卫员从水家冲翻过一个有竹林的山岗，来到金家冲。金家冲山边有一户人家，就是程新荣家。家中三口人，即程和他的妻子、弟弟。因是新春佳节，他们正在家里喝茶。游击队突然造访，他不认识，便有些疑惑。游击队说明了情况，解除了他的顾虑。从此，程新荣便开始在金家冲做群众联络工作，后来，游击队发展他为共产党员。

在南陵的大格里，游击队联系上了洪广。洪广是共产党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强迫他自首，他便从青阳的乔木湾搬到南陵的大格里胡村居住。游击队与他取得联系后，他表现得很积极，经常为游击队办事，游击队通过他了解到乔木湾和大格里两地的情况。当时，部队给养极其困难。敌一五〇师的一个营和青阳、南陵的地方部队住到大格里，专门向宾山“清剿”，游击队剩下的钱只能买100多斤大米，40多人即将断炊，怎么办？没有粮就向地主“借”。于是，游击队找来熟悉地方情况的洪广，派

他到离宾山 50 多里地的泾县包村搞粮，后打听到一家大油坊老板很有钱。洪广汇报情况后，县委派孙林带五名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提前住到山冲里，次日晚向这个油坊老板“借”了 15 万元法币。这些钱在当时可买 10 担大米，解决了暂时困难。

泾县菜花塘有个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里的老百姓迫于生活，经常到宾山偷杉树。遇到游击队，开始他们很害怕，后来告诉他们只要不泄露游击队的消息，就不阻拦他们砍杉树，他们胆子也就渐渐大了，时不时向游击队介绍地方上的一些情况，使游击队无形中多了一条情报来源。以后又同泾县坎上保的董生坞、王学文、王德科等青年学生有所接触，游击队鼓励他们在地方上多做群众工作。

游击队做群众工作非常认真，他们一户一户地了解情况，一村一村地开辟工作。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有的山冲只住一两户人家，游击队不辞辛苦一户都不撂下。开始因为摸不清底细，每到一户了解情况，前后门和路口都布上哨，人只让进，不让出，完成任务后即迅速撤离。当这些身穿便衣、携带武器的“不速之客”夤夜出现在农户堂屋的时候，他们初时显得惊慌不安，经游击队耐心地解释，在确信游击队就是当年新四军的时候，便露出了笑容。连忙烧茶做饭，问寒问暖，还说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有些受害者家属，含泪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游击队联系的群众除张银根、程新荣、洪广外，还有南陵大格里的胡来保、胡兴福等人，他们都积极为游击队工作。有的后来投身了革命，如程

新荣、洪广等。

经过艰难地走村串户，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初步搞清楚了：哪些是保甲长，哪些是士绅，他们当中谁好谁坏；哪个是特务，有无罪恶；哪个有过自首行为，有无出卖组织，都了解得比较清楚。村里村外有什么动静也能很快知道，至此，群众发动已初见成效。

统战开路，争取反正 统战工作历来是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实践证明，运作得好，效果非常明显。通过统战工作，动摇了国民党基层政权。一些人名义上是为国民党工作，实际却在为游击队服务，甚至有些人干脆就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

当时在宾山的水家冲，有国民党宾阴乡乡长方忠秀开设的一个纸坊，有八、九个工人，他每年可以从纸坊获取不少利润，因此他很担心生产中断，游击队便抓住这点，同他“谈判”。纸坊有个工人叫张银根，人称张聋子，是个小头头，由于先进山的战士向他做了工作，因而他对游击队的工作非常支持，不仅帮助游击队了解情况，还帮着买米、买盐、买菜，成了部队义务采购员。游击队就叫张传话给方：游击队有个条件，如果方能答应，双方各走各道，互不打扰。一旦交火，事情就难以预料，弄得不好会把纸槽毁掉。张问什么条件，游击队说，一要他为游击队保密，不准泄露游击队的行踪；二要他将敌人有关动向及时报告游击队；三要他不妨害游击队活动。张一一告知了方，方为了保全纸槽生意，完全答应游击队所提的条件。后来张银根入了党，为游

击队做了不少工作，纸槽里的工人大都参加了游击队。

游击队住地在青阳二酉保水家冲山棚里，与国民党的一个区自卫队同住在一个保里，却相安无事。二酉保的范围是一条山冲，冲口平顶周有一座碉堡，驻扎着国民党青阳县吴谭区署和它的自卫队 50 人(枪)。从冲头到冲尾相距四里多路，游击队就住在冲尾的高山上，同碉堡遥遥相对。这个区的区长叫郑康仁，政治态度还不错，他晓得游击队就在附近活动，却佯作不知。为确保相安无事，游击队写了一封信通过他住在宾山水家冲的岳父送给他，申明游击队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明以大义，晓以利害，希望他认清形势，顺应形势发展，给游击队以帮助。郑回信表示愿意和平相处，从而达成默契。此后，游击队经过碉堡附近，他也不闻不问。有的战士见此情景，编了个顺口溜：“二酉保，一条冲，驻着两种不同兵。冲口‘刮国民党’，山上新四军。只因统战政策好，互不干扰讲和平”。1949 年 4 月，郑康仁的儿子郑天俄参加了解放军，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青阳县中统调查室是个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构。调查专员苏承平想做生意赚点钱。董正权原先参加过共产党，与游击队有联系，董按照游击队的意图与苏做生意，给他搭个“干股子”，得到一些“利润”，苏占到这点便宜，心里乐滋滋的。从此董经常出入县调查室，相机搜集情报。一次，董在国民党县党部见到一份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扩大国民党地方武装，是绝密

件，董交给了游击队，使游击队了解到县党部的反共部署。

国民党宾阴乡公所采买员施狗子，是地下党施沛恩（后叛变）的堂兄弟，游击队就利用他们之间关系，向施开展了统战工作，施表面上是敌人的采买员，实际上成了游击队的情报员，宾阴乡公所的官兵姓名、武器弹药等情况，游击队从他那里搞得一清二楚。游击队还在乡公所中安插内线，先后派华岸村的宗典礼，安山村的钟昌发打入宾阴乡公所和董村碉堡里当兵，内外结合，掌握乡公所动向。

酉华宋冲，有个士绅梅丙根，知识分子，在本保很有威信，说话算数。他参加过共产党，又自首过。听那里的群众说：只要把梅丙根的工作做好了，宋冲、阳坦坑一带的工作就好做了。游击队找来梅的舅父，请他出面疏通。不久，梅丙根成了游击队的朋友，经常向他的同学、亲戚宣传党的政策，宋冲一带成了游击队很好的活动场所。后来梅丙根还为游击队做了一件好事：1946年7月，宾阴乡公所从县里请来一个常备分队住在青坑。青坑位于两山之间，是盘台到二酉保苏家冲的唯一通道。常备分队进驻后，使游击队来往受制，当时，要搬掉常备分队这个绊脚石，硬打不行，于是，游击队找来梅丙根，让他与国民党乡长方忠秀交涉，揭穿方的阴谋，指出这个常备分队是乡公所邀请进驻青坑的，如不撤走，一切后果由方负责。方非常害怕，当即表示同意。第三天，方向上面报告说青坑一带没有新四军，常备队驻在这里不方便，群众负担很重。过了几天，常备分队撤离了青坑。后来，

泾青南民主县政府成立时，朱农任命梅丙根为督导员。

南陵的大格里杨村，有个姓杨的大地主，每年收租几百担稻，并开设了一个油坊。游击队主动同他接近，做他的工作。在游击队经费困难时，曾向他借过钱，由于做到有借有还，因而，他对游击队比较信任。1946年午季以后，游击队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物价不断上涨，游击队就托他代购300担菜籽，存在他开的油坊里；新谷上市后游击队又托他买了500担稻子，存放在他家。需要时，打个条子就可以领到大米，定期结算。春节边，又叫他将菜籽榨成油运到芜湖卖掉，那时价格高，卖的钱也多，游击队用来购买布匹给部队缝制衣服，还买了药品和收音机。将稻谷和菜籽存放在这样的大地主家，比存放在群众家里更为保险，因国民党不会怀疑他。即使出了问题，也能得到赔偿。1946年秋，游击队将缴获的50多条步枪放在他家，随时取用，从未发现短少的情况。

泾县的北贡里有个士绅叫韦懿德，在地方上较有名望。他爱打抱不平，所以结交朋友甚多。游击队派王月成找来韦，让韦谈了泾县县城、章渡、云岭和北贡等地一些保长、士绅的情况和敌人动向。游击队向他说明了党的政策，并且交给他几项任务：一是做本乡的士绅及乡、保、甲长的工作，和他们交朋友；二是重点掌握泾县县城和章渡乡国民党军的活动；三是帮游击队买枪。韦懿德答应照办，他联系了一些统战人士，及时提供县城和章渡国民党的活动情况。不久，还给游击队买了一支快慢机，以致游

击队在北贡乡一带工作开展的很顺利。

贵池齐村柯有个姓齐的参议员，这人既不进步，也不反动，于是游击队多次对他进行教育，建立了关系，之后他为游击队做了很多工作，如提供经费、粮食、物资，购买枪支弹药等。

经过统战工作，南陵县一个参议员得到敌人即将对游击队进行大规模“清剿”的情报，自己离不开，便出钱雇请可靠的人连夜送给游击队。

还有一些人曾参加过共产党，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办了自首手续，但并未出卖组织。对这样的人，游击队仍然热情对待他们。即使曾经叛变，只要不再干坏事，愿意帮助游击队，就向他们宣布，可以将功赎罪，既往不咎，以此分化敌人，减少工作阻力。

通过统战工作，杨田乡 12 个保长大都能为游击队服务。宾阴乡 9 个保长都在为游击队工作。花园保保长祝海青，后担任民兵中队长，工作积极认真，被国民党兵杀害，游击队追认他为烈士。

搜缴武器，壮大武装 当游击队在这个孤悬敌后的地区，初步站稳脚跟之后，就考虑设法搞些枪支弹药，用以武装壮大自己的力量。游击队了解到，抗战初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溃兵曾在九华山周围丢下不少枪支，多半失落在国民党乡、保长和当地土豪劣绅手里。同时，山区还有不少有杀伤力的猎枪。青贵游击队请示铜青南县委派部队支援，头一天将情况侦察清楚，次日晚，兵分两路将有枪支的乡保长和士绅家包围，缴获 83 条枪（包括

土枪、鸟枪等)，其中驳壳枪一支，手枪两支。后上交县大队 42 支，留下 41 支加强自己的装备。

据韦懿德提供的线索：住在云岭村的国民党县参议员陈济川家有两支驳壳枪。游击队派王月成去侦察后，朱农亲自带 20 多人，当天到老雀窝王月成家住了一夜，次日下午出发，暮时赶到云岭村，遂将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带机枪、步枪，埋伏在云岭至章渡的路口，以防章渡之敌来扰；一路由朱农带领冲进陈济川的家去搜缴枪支。陈家房子是三进大瓦屋，闯进后发现他家里的人全都跑了。搜了两个钟头，终于在一张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两支崭新发亮的驳壳枪和几十发子弹。天亮前，游击队迅速撤回到宾山。稍后，国民党泾县常备大队和章渡乡自卫队来“清剿”，游击队已无踪影。

1946 年 9 月的一天，家住贵池观前的国民党少将带几个人回家，游击队得到消息，当晚摸进观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少将家，将其及随从活捉。少将乖乖地将手枪交了出来，还答应替游击队买 50 支枪。后来虽没有办到，但其反共态度有了转变。

在这前后，游击队还打了丫山、九华山保公所和国民党“潜虎队”。

丫山是铜青南 3 县交界处的一条小街，国民党丫山保公所就设在丫山街，游击队派了四、五个战士，扮成老百姓模样，晚上从大格里出发，次日天亮到丫山，直奔保公所。几个保丁还在睡

觉，游击队把他们的枪全缴了，将俘虏释放，从而拔掉了这颗安在要道上的钉子。

国民党九华山保公所在山上建立了一个小据点，有四条步枪，据点的保丁时常欺压百姓，勒索香客。游击队经过周密侦察后，在一天夜里悄悄摸上山。当几个保丁在麻将桌上玩得兴趣正浓时，游击队冲了进去，几个保丁吓得魂飞魄散，当即缴械投降，游击队教育一番放了他们，然后一把火将碉堡烧毁，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事通过“朝山进香”的香客的传播，在江南一带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国民党在黄石溪组织了 200 多人的武装（取名潜虎队）。程三满和胡克明因生活困难参加了潜虎队，游击队了解这一情况后就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把他们争取了过来，后来他们配合游击队从潜虎队搞出 18 支步枪。一次，潜虎队队长许家宾准备外出活动，他们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游击队。游击队在潜虎队必经之地设下埋伏，不费一枪一弹抓到许加宾和几个潜虎队队员，缴了他们的枪，教育后放了他们。

1946 年 10 月底，游击队还智取了泾县厚岸乡公所，这个乡公所设在后岸街上，离南陵大格里口有 70 多里路。乡公所附近的小山头上有座碉堡，驻有自卫队。自卫队里有两个士兵是泾县金坑人，其中一个叫朱根才，因闹内讧逃了出来。金坑秘密共产党员带朱根才等两人来大格里参加游击队。开始，游击队有些怀疑，向他们询问厚岸乡公所内部情况。他们说：乡公所自卫队都

住在碉堡里，在碉堡附近山下有个祠堂，早上太阳一露面，就吹起军号，士兵都徒手到祠堂外边洗脸，然后上操。这时碉堡里只留两人站岗，如果游击队事先埋伏在附近，到时就可以冲进碉堡，一举获胜。游击队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当即派出人员又到实地侦察一番。果如所说，并发现离碉堡约一箭之地，有许多茅草和杂树，利于隐蔽，于是游击队派姚生、柯斌、孙林率领 30 人，携机枪一挺，由朱作向导，于凌晨 3 点钟赶到厚岸碉堡附近。战士们分散埋伏在半人深的杂草小树林里。太阳一出，碉堡中响起了号声，不一会，堡内士兵空着手排队去祠堂边洗脸，一看机会已到，连长姚生一声令下，一部分战士飞步冲进碉堡，将两个岗哨缴了械；另一部分战士直奔祠堂门口，喝令敌兵举手投降。结果一枪未发，大获全胜，共缴步枪 32 条，机枪一挺，手枪一支，以及大批弹药。战士们都说，“未花本钱，发了大财”。这是游击队转进泾青南地区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这一仗，震慑了泾青南地区的敌人，鼓舞了战士的士气，对开辟和发展泾青南游击区，推动斗争形势向前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战胜艰难，坚持学习 县委和游击队在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期间，环境极其艰苦恶劣，几天吃不上饭是常事，实在饿得发慌，就抓几把生米放在嘴里嚼一嚼，粮食吃完了，食盐也没有，就靠吃竹笋充饥，没有竹笋时，就吃石鸡，这种石鸡形状像癞蛤蟆，一个重七八两，居于石缝中，夜晚用火一照，它就不动，捉住后，把皮剥去，洗净炒食，算是开荤。干部战士的腿脚被刺

草割裂了许多口子，经雨水浸泡，伤口腐烂，有的战士就把衣袖剪下来作袜筒，没有鞋穿就用毛竹笋壳自己动手编，头发胡子长了相互间用剪子剪一剪。下大雨时，无法睡觉，就打着伞坐到天亮。冬天，单衣无法抵御寒冷的北风，晚上睡觉时，为了暖和点，战士们衣服不脱，子弹袋全绑在身上。类似情况不胜枚举。生活尽管艰难困苦，但干部战士仍然非常乐观，他们坚信革命必胜、敌人必败。战斗间隙指战员们还刻苦地学习文化，没有课堂和桌凳，也无课本和笔墨纸张，他们便以野外为课堂，两腿为课桌，高小生胡志刚当教员，坐在山坡讲，学员一边听，一边拿木棍在地上学写字。就这样条件，由于指战员们学习很用功，文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他们除学习文化外，还学唱革命歌曲，组织拉歌比赛，这样既激励了斗志，又丰富了文化生活。

三、铜青南县委及军事组织的反“清剿”斗争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为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这方面来。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①

1945年9月坚持皖南斗争的党组织和武装组织刚刚北撤，国民党青阳县政府便趁机对我留守的武装发动“清剿”。他们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欺骗并施，军事上青阳常备队派出一个连兵力对尹彬领导的茗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清剿”。政治上，大造舆

论，散布种种谎言，说什么“共产党走了，不再来了，”借以欺骗群众，引诱革命队伍中个别意志不坚定分子叛变自首。对那些参加过游击队或被怀疑为游击队的群众进行迫害，见人就捉，见屋就烧，仅木镇、茗山、甘家冲一带烧毁民房 40 多间。同时还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抢猪杀鸡，无所不为，致使茗山一带 30 余里的群众日夜不宁。

10 月，铜青南县委成立后，铜青南县大队配合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在铜陵石佛山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特务崔光汉一路，毙敌 27 人，缴步枪 10 余支，接着游击队又在青阳的店门口、田家畈打了两个胜仗。几仗一打，国民党的嚣张气焰被压了下去，国民党地方部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此前，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回到铜陵的共军是“上面不要自己跑回来的少数散兵”，是“在巢湖船被炸翻了，死里逃生剩下来的几个人”。游击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谣言不攻自破，群众欢欣鼓舞地广为传播；新四军又回来了。

当时留在皖南的武装力量，除铜青南军事武装外，一是由胡明负责的原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的武装力量，他们在黄山以东建立并巩固了多处的游击根据地；二是在北撤时，铜、繁地区留下的由杨明负责的武装力量，他们向皖南山区发展，在黄山以西多处建立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再就是熊兆仁、倪南山同志率领的，由苏南撤退到皖南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全部武装总共有 800 余人。以上三支武装力量汇合之后，在皖南地委的统一领导下，

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皖南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为建立和发展皖南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心腹之患。他们见国民党地方部队“清剿”不力，决定调国民党正规部队来助战。

1945年12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芜湖召开皖南地区参议员会议，公然污蔑皖南人民武装为“孤匪”，请求南京政府派部队“清剿”皖南新四军游击队，叫嚣“3个月内消灭共军”。1946年初，国民党调集第四十四军一五〇师、一六二师，新七师一个营、省保安第五团及泾、旌、太、青、石、宁、绩、歙、休、黟等十个县地方部队、计一万兵力，从3月开始，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以寻歼皖南党组织及主力部队为目的，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清剿”。

国民党此举，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就是企图在发动全面内战前，先将坚持江南的革命力量一举歼灭，消除后顾之忧，以便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

于是，国民党一五〇、一六二两个师，在武汉整编后，由军长王浚率领，气势汹汹地闯入皖南沿江地区，当时的兵力分布是：四十四军军部并一个团驻贵池；一五〇师师部并三个团驻铜陵、青阳；一六二师师部并一个团驻大通。敌人一来，即大肆破坏当地的党组织和迫害我方坚持原地斗争的基层干部和进步人士，还在南陵、青阳等县大力扩编国民党县常备大队，强化反动的区乡政权，扩建反革命的地主武装——区、乡联防队或自卫队。并在

每个区乡都筑了碉堡，配备三、五十人枪，且装有电话，彼此互通信息，遥相呼应，对游击队严密封锁，同时成立了以青阳县调查室为中心的特务组织，开展特务活动；各村又有村民“巡逻队”，发现情况就鸣锣向他们报警。如果有哪个村的“巡逻队”知情不报，就以私通共匪论处。顿时，沿江皖南地区黑烟滚滚，形势陡然恶化。

尽管敌人来势凶猛，但是由于游击队早有预料，并作了进山准备，离开铜陵，部队番号、领导姓名都改了（例朱农改为孙兵，孙举东化名胡克南），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四十四军在铜陵、贵池的两个月“清剿”扑空后，2月间才追到游击队转移的泾青南地区。在泾青南地区，他们把县大队作为主要目标，在青阳、南陵县常备队配合下，进行“清剿”。

1946年元月5日，铜青南主力50人在返回铜青交界处的锅冲被一五〇师两个连包围，激战3个小时，游击队牺牲1人，受伤1人，损失步枪1支和一些生活物资。元月15日铜青南县大队在石堰桥打击国民党军队，共消灭青阳警保队10余人，缴步枪5支，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青阳和其他各县人民坚持斗争的信心。

由于铜青南县委的英明决策，部队进山以后，一直坚持在根据地里，认真执行“积蓄力量，隐蔽坚持，站稳脚跟，打下长期坚持斗争基础”的方针，在敌军“清剿”区内，组织小型精干武装，分散隐蔽，进行内线斗争，主力则跳出外线，组织群众进行

斗争，寻机消灭土顽，壮大自己。这样将部队分散在泾、青、南、铜、贵等县的广大地区，尽管敌人反复地“清剿”，但不明游击队之虚实，到处扑空；同时由于游击队采取分散坚持，隐蔽活动的方法，迫使敌人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宾山和茗山地区游击队。

1946年3月，国民党将部队拉进山里，寻找皖南游击队主力决战。除烧掉游击区群众部分房屋和游击队驻地一些草棚外，并无多大收获，相反在外围还不断损兵折将，一些土顽遭到沉重打击，至此，一五〇、一六二两个师的“清剿”以失败告终，4月后便退出了青阳等地。

铜青南县委及游击队从1945年12月进山，一年不到便在宾山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为后来建立泾青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也为打通沿江中心县委与山地中心县委的联系起到了立足点和桥梁作用。

第二节 泾青南，铜青南工委

一、泾青南、铜青南工委的建立

1945年12月，杨明同志率领沿江部队主力转进山区后，与坚持山区斗争多年的胡明部在泾（县）旌（德）太（平）根据地樵山会合。

同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张鼎丞、邓子恢电告山地中心县委胡明书记成立皖南地委。翌年2月，以山地和沿江两个中心县委为基础，正式组成中共皖南地委，胡明为书记，杨明、刘奎、唐辉、洪琪为委员。地委组成之时即在绩溪县王会山召开了第一

次会议，确定了隐蔽坚持，积蓄力量，相继发展游击战争，进而发动群众，壮大力量的方针；决定沿江中心县委今后的任务是领导黄山以西至沿江地区的斗争，并将沿江部队人民自卫军的番号改为新四军沿江总队，政委杨明，总队长查富德，政治处主任钱秋育。下辖3个连：一连连长叶文启，指导员候胜；三连连长朱荣生，副连长张亚东，指导员蒋英（蒋牺牲后，孙刚继任）；五连连长左秀东，指导员吴志英。

1946年9月间，苏浙皖边区主力部队在熊兆仁、倪南山的率领下，突围冲出敌人的“清剿”圈，带着华中分局的指示信（即“七一”指示）和骨干分子40多人在彭海涛和郎广武工队配合下，胜利到达宁国板桥，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吕辉接上关系，后在泾县、太平交界之樵山与胡明部队胜利会师。苏、皖部队会师之后，于同年11月在泾县濂坑召开地委会议。会上，吸收熊兆仁同志为地委委员。会议根据“七一”指示精神，成立苏皖军政委员会，以胡明为主席兼政治委员，熊兆仁为军事部长。会议提出皖南各地区武装斗争的总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积极开展胜利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向创造根据地的目标前进，在巩固原有阵地的基础上力求发展。”

沿江中心县委根据地委会议精神，决定撤销铜青南县委，以茗山为中心成立铜青南工委，书记陈尚和，委员尹彬、周坚恺、徐世达，以宾山为中心成立泾青南工委，书记由朱农兼任，委员王克祥、孙林、孙太英、姚生。沿江中心县委并委托朱农代管铜

青南工委工作。

沿江中心县委的决定对于泾青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两个工委机关都设在青阳县境内，使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第二，苏南留守部队和皖南游击队会师及华中分局“七一”指示，使工委的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第三，行动有了方向，“七一”指示成为当时指导皖南党组织转变斗争方式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二、泾青南、铜青南工委的活动

为贯彻地委会议精神和“七一”指示，工委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发展党员，建立恢复党组织

“七一”指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江南党的建设问题。当时，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积极分子不断涌现，于是，泾青南工委研究决定，趁热打铁，在原来铜青南县委进入宾山后发展的张银根（张聋子）、程新荣、洪广等几名党员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彭国玺、林运青（林毛子）、王春香（王驼子），还有宋冲的梅继忠、张丙南，南陵大格里的胡来保、胡宜福，泾县勘上的董生坞、王德科、王学文等入党，同时，洪广与皖南事变后失去党的联系的开化、张可钦等7名地下党员也接上了关系。在这段时间共发展了30几名党员。工委要求在宾山周围每个村有党员，每个保有党小组，有条件的成立党支部。

由朱农代管、陈尚和负责的铜青南工委，以茗山为中心活动地区，外围拓展东北到界山铺、毛竹园；西北到铜陵的涧北冲、十里长冲、桂岭脚；东南到锅冲、丁桥附近和铜陵的半山里、瑶山；西到铜陵的老鼠石等广大区域。大军北撤后，这一带党组织遭到破坏，少数人自首，有的人隐蔽，有的还在暗暗地坚持斗争。铜青南工委建立后，着手恢复和发展组织。在工委领导下，先后建立了7个党支部：即工委机关支部（书记查斌、副书记徐世达）、茗山支部、杨树冲支部、铜陵有郜崇贵领导的1个支部、阮志昂领导的1个支部、北岳区有涧北支部、柴塘支部。南陵一带建立的是党小组，党员发展到100多人。

茗山地区原是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所以陈尚和带领游击队在这一带分散活动，很快使铜陵柴塘地区、永丰乡的上房徐、下房徐、芮村、邹村基本上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茗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范围有四、五百平方公里，人口有两万多。游击队由原来的20多人发展到70多人。

（二）主动出击，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七一”指示提出的转向斗争就是明确指示皖南党组织及所属各部变隐蔽坚持为公开活动；变保存和积蓄力量为积极发展力量；变等待时机、相机开展游击战争为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转向斗争的决定，鼓舞了士气，使得皖南地区的游击健儿坚持皖南斗争的积极性更高了。泾青南工委率部主动出击，杀敌夺堡，一夜之间同时打掉了杜村、宾阴两个乡公所的自卫队，创

造了皖南游击战的空前战例，震动很大。

杜村乡公所在九华山西侧，同庙前乡公所毗邻，为青阳西部的重要据点，防守十分严密。当时有个陈锦腊（章贵的外甥，陈法周的弟弟）。他家境贫寒，深受苦难，为混口饭吃跑到国民党青阳县常备队三中队当兵。游击队四下杀敌夺堡，镇压特务的消息不断传入他的耳里，参加游击队成了他强烈的愿望。他从三中队开小差出来，找到朱农，要求参加游击队。朱见陈很机灵，又会吹号，就叫他继续到乡公所当兵，有机会搞 1 挺机枪出来；先在乡公所内部帮助游击队工作，这样作用更大些。

陈到杜村乡公所找到一位朋友介绍他当兵，乡队副不接收，因他舅父是新四军，陈又来到宋冲见朱农，执意要当新四军。朱仍未允，对他说，你只要想办法在乡公所里歇一夜，游击队就可以打掉杜村乡公所自卫队，陈说能办到。县大队立即研究了摧毁杜村乡公所的方案。认为陈的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方案是可行的。1947 年 6 月 8 日，游击队派姚生、柯斌、孙林、芮胜，率领 40 多人(枪)，去执行任务。因杜村离游击队的驻地较远，姚生等率领部队头天宿营杜村附近的西峰岭。次日上午，派交通员随陈一道去杜村。陈到杜村乡公所找他朋友钱立初，说准备住这里玩几天，得到了自卫队长的同意。他连忙通知交通员传回消息，准予晚上 12 时左右打开祠堂后门，与部队接头。姚生等是夜由西峰岭出发，到杜村乡公所后山树林里休息。当夜三更时，陈在床上连呼肚痛难忍，嚷着要上厕所，这是他玩的点子。白天他以天热

解渴为由，用河沟里冷水冲糖给自卫队员喝，自己喝得较多。这时他嚷着冷水喝多了，把肚子搞坏了，大家也不生疑。虽然警戒森严，他以解大便为由，开了祠堂的后门。门一开，等在门外的姚生等率领战士猛冲进去，直奔楼上，缴获了所有枪支。接着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把从睡梦中惊醒、高举双手的俘虏押到操场。清查结果，除乡长跑掉外，毙三人，俘30余人，缴获花筒机关枪一挺，步枪27支，手枪一支，手榴弹30枚，子弹万余发和部分其他物资。游击队牺牲了一名侦查员。孙林向俘虏们交代了政策，指明了出路，发了路费，全部释放。最后，一把火把杜村乡公所和4座碉堡化为灰烬，游击队胜利返回宾山宿营地，陈锦腊也光荣参加了游击队。返回途中，游击队又在朱备店发动群众几百人锯掉了一些国民党长途电话的电线杆，带回电线600余斤，使敌电话一度中断。

就在奔袭杜村乡公所的同一天晚上，游击队还打掉了宾阴乡乡公所的自卫队。那天，县大队主力已去打杜村乡自卫队，县委机关在宋冲只剩下干部、战士、炊事员一共十二个人，有5条长枪、3支短枪，大家都希望在附近也打1个自卫队。当时考虑宾阴乡平顶周有吴潭区署的自卫队50人枪，有几座碉堡，没有内线不能打，便决定把有内应的宾阴乡公所自卫队作为攻击的目标。

宾阴乡，左连泾县，右接吴潭和乔木两个区，区里都有自卫队，宾阴乡公所就设在朝田方村方家祠堂内。敌人为了防止游击

队的攻击，强迫民工建筑了碉堡。碉堡外筑了一道较高的环形围墙，墙外又开挖了深宽各有丈余的水沟，只在朝东方向的水沟上架了1座小木桥，作为进出的唯一通道。行动之前，朱农派王志胜把已与游击队有联系的宾阴乡自卫队副队长戴光新找来了，动员他配合游击队行动，尽快立功，弃暗投明。开始他有些顾虑，经过游击队耐心细致地说服，他同意配合游击队拿下乡自卫队，然后仍留在乡公所。当夜朱农和孙太英、胡永安等十几个人，由戴引路，并让彭国玺、李国堂动员群众六、七十人，以抢粮的名义，虚张声势，一起前往宾阴乡公所所在地朝田方。游击队决定由戴和两个侦察员先进去，把哨兵干掉。当他们接近碉堡时，哨兵喝问：“什么人？”戴满不在乎地回道：“乡队副！”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突然间，侦察员猛扑过去，将哨兵擒获。游击队很快冲进碉堡，大喝“缴枪不杀”，把从睡梦中惊醒的乡自卫队员一个一个押到碉堡外，随后发放路费遣散回家，这次战斗，共缴了37条枪。同游击队一道来的群众将粮仓打开，把存粮一抢（分而光。为了避免国民党方面对戴光新的嫌疑，朱农叫两个战士把他严严实实地捆起来，嘴里塞上碎布，关在乡公所。朱农和戴会意地笑了笑，便率部迅速撤离。游击队在返回的路上，抓到了一个藏在稻田里的乡兵，缴获了一支花筒式冲锋枪，这算是意外的收获。

为了弄清杜村乡公所是否打掉了，朱农在朝田方找到乡公所录事，问他青阳其他地方有没有新四军活动。他说，县政府刚才

打来电话说，杜村乡公所被新四军打掉了，祠堂也被烧了。游击队队员听了，心里都非常高兴。后来，敌人知道宾阴乡公所遭袭是戴光新作内应。戴在乡公所呆不下去了，游击队安排他为宾阴乡民兵副队长。

在这之前的4月21日，泾青南部队1个排，携机枪1挺，长短枪24支，攻打老田吴村乡公所，部队冲进房子后乡兵退到楼上向下抛手榴弹，游击队将房子点着火，乡兵才弃堡逃跑，这一仗毙敌3人，缴步枪2支。我方伤2人。同时，王克祥还打了陵阳乡自卫队。他们争取了乡丁朱耿才弃暗投明，里应外合拿下了这个乡公所的自卫队，缴获十几条枪。随后，又通过东堡自卫队某队员策应，围攻了东石乡自卫队，国民党乡长陈其溥率乡警顽抗，经过一小时战斗，游击队获胜，缴步枪7支，手榴弹十余枚，电话机1部，子弹几百发，并俘获乡警一人。

与此同时，铜青南工委及游击队在陈尚和的带领下，四处活动，也有不少收获。

1946年秋，铜陵栖凤乡大旱，为了求雨，人们许愿在秋后唱木莲戏还愿。查斌、孙运松赶到铜陵新庙，准备人多的时候当众处决汉奸、特务王其干，结果未找到王，看戏的人发现游击队员的手枪吓得跑了。这时，查斌、孙运松指挥游击队处决了两名罪行昭彰的乡丁，台下顿时混乱。事后，国民党栖凤乡公所害怕铜陵县政府追究，谎称2人是由于“枪走火”致死，并贿赂了县里派来的调查人员，使这一起轰动事件不了了之。

1947年春的一天，徐世达、查斌、孙运松、芮少荣、赵彪、潘炳炉带领游击队于夜晚摸进了铜陵县孤城圩保长赵化风家。赵见枪对准他，吓得全身发抖。游击队缴下赵的手枪，又让他带路去保公所缴了两条枪。后来到乡长家，乡长闻风而逃，但手枪被游击队搜到了。这一次没花一颗子弹，却缴了四支枪。期间，徐世达和赵彪排长还率领游击队从青阳茗山出发到铜陵孤城圩赵村和崔村两个保公所，缴获了两支手枪和几支步枪。回来的路上又袭击了流潭圩水浒庙乡公所，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基层政权。

（三）扩大影响，在根据地立足生根

工委游击队连战连捷，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给游击区群众以极大的鼓舞，群众奔走相告，到处传开了共产党游击队打击敌人的胜利喜讯，地方党和游击队在泾青南地区声威大振，形势好转。基于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游击队于年初三（1947年春节），在青阳的宋冲大摆酒席，宴请当地父老士绅。县委、县大队的负责人先后入席。后面齐刷刷地排列着12名侦查员，一式的驳壳枪插在腰间，神采奕奕，威风凛凛。席间，工委负责人向到会的各界、各阶层人士及各方代表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希望他们能审时度势，继续加强同游击队合作。讲完以后，游击队连长端起机枪对天空打了一梭子子弹，以代替欢庆的鞭炮。清脆的枪声震动山谷，响彻云霄。宾主之间互相祝贺，笑逐颜开。不日又分别在二酉保的苏家冲、刘店乡的大格里宴请

了当地各界人士。自此之后，基本群众欢欣鼓舞，进步士绅表示拥护，许多中间人士迅速向部队靠拢，一些顽固派也改变了态度。真可谓父老倾心，士绅趋附，敌魁丧胆，标志着游击队已经在这个人生地疏的山区，打开了新的局面。

1947年春的一天，泾青南工委委员孙太英来到国民党乡代表郑弼成的家中（郑原来和新四军有联系），但这时敌人还在“清剿”，郑弼成见孙太英此刻到来，不禁愕然。然而，他仍然很热情地予以接待，以大通来的小姨子为名，把她藏在家中，由郑的妹妹陪伴。隔日，郑家的放牛娃认出孙是新四军。郑家连忙做放牛娃的工作，说认错了人，不要瞎说，又给些糖果给他吃。一天，郑家得知国民党部队有一个营要开到刘店乡，且营长要到郑家吃中饭。郑即请他母亲陪同孙到附近可靠的佃户家里暂避，该营长走后，又接回家中住下，该营敌军全部撤离，孙才回到大格里。郑弼成把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国民党捉拿的“要犯”藏在家中，的确担了很大风险，也表达了他对游击队的诚意。

工委游击队为了立足，团结进步绅士，但决不意味着姑息迁就，对少数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的土豪劣绅则给予坚决镇压。

张茂林皖南事变后叛变，并当上了国民党行动小组长，专门搜集游击队活动情况，向国民党行动队长李伯钧汇报，为了除掉这个坏蛋，王克祥派叶宗权和朱金波（排长）等人，在一天夜里将张茂林逮到对子冲处决了。处决张对三里地区震动很大，吓得一些有罪恶的坏家伙心惊胆战，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1947年6月，游击队在铜陵花园王村将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王振羽就地处决，并张贴布告，宣布其罪状。事后国民党误以为此事是叶恒春“勾结”游击队所为，将叶杀掉。叶曾担任民主政府乡长，后叛变投敌，担任“中心组长”为国民党效劳，不料却被国民党所杀，这是叛徒应得的下场。叶死后，20多名曾经自首过的人，非常害怕，跑到游击区，参加了游击队。

第三节 铜青贵县委、县政府的建立与活动

一、铜青贵县委、县政府的建立

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不断损兵折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同时，国统区后方战场上游击战争也风起云涌。

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致信皖南地委，对皖南敌后游击战争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皖南地位非常重要，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重要地带”，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从单纯的游击战转向广泛的多种形势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提出创造主力，创建根据地的任务。

华东局“三八”指示是继“七一”指示之后又一个重要文件，它对皖南游击战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进一步打开皖南斗争的新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八”指示是孙宗溶六月初送到皖南的。为进一步贯彻“三八”指示精神，皖南地委在泾县水岭会议之后，7月，于太平龙门专门召开皖南沿江地区干部会议，会上，全文传达了华东局的

“三八”指示，并从战略考虑决定在铜青南、泾青南两个工委的基础上成立铜青贵县委，朱农任书记，陈尚和、尹彬为委员，孙太英任组织科长。将原铜青南、泾青南两个工委隶属铜青贵县委领导，并增设泾南工委、青贵工委和杨田区委。会议同时决定在黄山以西，石台以南成立黄西工委，杨明任书记，改南繁芜工委为南繁芜县委（由黄西工委划出），书记王文石。皖浙边成立歙绩昌旌宁工委，书记唐辉。泾旌太和泾旌宁宣地区分别由洪林、吕辉负责。上述党组织均归皖南地委领导。铜青贵县委下辖四个工委和一个区委，组成情况是：

铜青南工委：书记：陈尚和，委员：徐世达、尹彬。工委下辖 7 个党支部，3 个直属党小组，有党员 92 人，其中工委机关支部，书记徐世达，其余 6 个支部分别是：茗山、黄山、天明、涧北、景范、柴塘支部。

泾青南工委：书记朱农（兼），委员：孙林、孙泰英、姚生。

泾南工委：书记王克祥，副书记吴祥。

青贵工委：书记孙举东，委员：叶光华、史来水、曹汉卿、查春。工委下辖 12 个党支部，其中泉门支部书记陈演，九华支部书记王松茂，陵阳支部书记叶光华，东堡支部书记郑干，南阳支部书记陈三满，朱备支部书记舒贵仁，贵池边界支部书记陈麻子和贵池县石齐支部书记胡克明、汪和支部书记张根富、还有涧上、王村和贵池齐金支部，书记不详。

杨田区委：书记孙林，委员董木森 区委下辖 12 个支部：白

马塘支部书记王柏年（王柏良），张家山支部书记张克勤，老虎坑支部书记彭国玺，董村支部书记张先法，苏家冲支部书记钟满斗，小平坑支部书记王金福，宋冲支部书记先后为罗先云（罗生荣）、梅季中，盘台交通站支部书记章贵，另杨田、乔木各有两个支部，书记姓名不详。铜青贵县委下属党组织共有党员 135 人。

根据地的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根据“三八”指示提出的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指示精神。1947年8月成立了铜青贵县人民政府，朱农任县长。这是皖南游击战争中第一个成立县人民政府的地区。各工委、区委相应建立了同级办事处和区政府，由书记兼任主任或区长。

当时，县政府下辖办事处和区政府组成情况是：

铜青南行政办事处 主任 尹彬 办事处下辖 5 个乡政府：黄山乡乡长杨友富，天门乡乡长郜先哲，涧北乡乡长陈祖险，茗山乡乡长崔廉臣，景范乡乡长王爱亭。

青贵行政办事处 主任 孙举东 办事处下辖 5 个乡政府：庙前乡乡长不详，指导员王松茂，黄石乡乡长姓程，古田乡乡长章金水（一说余金水），另贵池境内汪和乡乡长姓杨、指导员张根富，齐金乡乡长不详，指导员陈延寿。

杨田区政府 区长 孙林 下辖 3 个乡政府：宾阴乡乡长彭国玺，杨田乡乡长董木森，乔木乡乡长洪广。

同时成立铜青贵县大队。

政委朱农，大队副柯斌，教导员王克祥，军需胡永安，下辖

两个连一个警卫队

第一连 连长：姚生

第二连 连长：柯斌，副指导员：崔必达

警卫队 队长：周光斌

原铜青南游击队下辖的区队此时改为第一连，由原来的40余人（枪）发展为110余人，步枪90支，手枪一支，机枪一挺。

另杨田区有一个区队，区队长孙林，指导员孙运松。

铜青贵县委及时向各工（区）委负责人传达了“龙门干部会议”精神，认真分析了铜青贵地区的形势，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迅速扩大游击区、创建根据地任务。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泾、青、南、铜、贵等县和地区迅速开展起来。

二、铜青贵县委、县政府的活动

（一）武装斗争

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铜青贵县委及游击队紧紧抓住大发展的最好时机，在敌后开展积极而广泛的游击战争。

首先，游击队向国民党区、乡、保公所发动了一场政治攻势，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向他们宣传政策，指明出路：“携枪反正，立功赎罪，是光明路；放下武器，远走他乡，是生路；建立关系，为我服务，是后路；持枪顽抗，继续作恶，是死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乡、保长不再继续为国民党效劳，转向为

游击队服务。但也有些自卫队继续顽抗，于是游击队就有计划、有准备地袭击、摧毁这些国民党军的据点。

1947年8月初，决定首先打南陵刘店乡公所自卫队。这个自卫队有一座碉堡，40多条枪。游击队采取了里应外合的打法。刘店乡乡丁吕和清同游击队建立关系后，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游击队要他半夜12点开门接应，部队在姚生、柯斌、孙林、芮胜以及苏启发、马佳林的带领下，趁夜摸索到刘店乡公所附近。这时，狗叫得厉害，惊醒了乡长的父亲，使得吕和清难以开门。于是，部队果断决定翻越墙头，用火力围攻碉堡。这一仗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该乡公所的所有枪支。

1947年8月，徐世达带领游击队在青阳钱家桥附近的高桥，抓到了国民党1个哨兵，从他嘴里得知国民党乡公所有个乡队副，带了十几名联防士兵出外抓壮丁，游击队当机立断，决定伏击。国民党军回来一定要从桥上过，徐世达下令：河这边隐蔽1个班，河那边隐蔽两个班。敌人上桥，两头夹攻。一会儿，国民党军押解着壮丁走过来，叽里咕噜一阵上了桥，3个班的枪声一起响，当场打死国民党兵1名，打伤了两名，另16名国民党兵全部缴了械。俘虏经教育后释放，被抓来的壮丁高高兴兴回家团聚，大家都说共产党好。

1947年6月9日，游击队一夜之间打掉青阳两个乡公所自卫队，使敌人惊恐万分。国民党青阳县政府弄不清有多少游击队，也不知道这些部队又从什么地方来的，搞得昏头转向，为保存实

力，不至于被逐一吃掉，遂下令将没有打掉的乡公所武装集中到县城、木镇和庙前 3 个据点。

木镇是青阳东北部的 1 座重镇，水路交通的枢纽，离县城 25 里，离大通 50 多里。国民党青阳县政府原派县常备大队一中队驻防，这时又将附近几个乡公所自卫队集中到木镇，加上县常备大队又增派一部分武装，加强了县常备大队第一中队，由号称“常胜将军”的极端反动残忍的国民党军官胡开武担任中队长。这样，木镇的敌人兵力达到 300 人（枪），加之四周碉堡林立，战壕纵横，故此胡夸下海口：木镇固若金汤，新四军插翅也难飞进。

胡开武，湖南人，40 岁左右，此人骄奢专横，不可一世，过去与伪军也打了些胜仗，因而，有人吹捧他为“常胜将军”。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1947 年 9 月 24 日是他的断头之日。

这天，游击队袭击木镇，“虎口拔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胡开武手下有个分队长叫施启祥，曾参加过新四军。此时，他同胡为了做生意分红发生矛盾，并日益激化，施和几个班长密商，准备全排人枪反正，以杀掉胡开武作为起义后的第一功。施派人到花堰施村，找到朱农。开始朱还有些怀疑，问清了具体情况后，朱就鼓励他们采取正义行动，并派了几十名精干的战士由姚生、柯斌、孙林、芮胜率领，跟随他们在深夜潜入木镇附近。那天据点站岗的哨兵，也是准备起义的战士，接头后他们领着行动小组的同志直奔胡开武的卧室。

当夜，木镇街上一片沉寂，只有炮楼的窗口，一闪一闪透出

微弱灯光。乡公所是 1 个高大的地主宅院，两层大瓦房。楼下对着大门的是胡开武勤务兵的寝室，隔壁才是胡开武的卧室。一切经过施启祥等人的周密安排，行动小组汪柏良、刘生宝、王平等 人首先杀了胡开武的勤务兵，然后机警地进入胡开武的卧室。胡开武正在睡觉，听到隔壁有动静，慌忙坐起身来，摸枪准备反抗。行动小组战士用手电筒一照，照花了胡开武的眼，另一个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大刀结束了他的狗命，并缴了 1 支驳壳枪。接着准备起义的 1 个排 18 人（枪），在施启祥的带领下，迅速拉到镇头，一起出镇，跑步越出碉堡的射程。这时镇上恰如热锅炒豆一般，步枪、机枪齐鸣，人声沸腾，好不热闹。后来有人写诗赞道：

“常胜将军”胡开武，杀人魔王凶如虎。

敲诈勒索又奸淫，木镇百姓吃尽苦。

英勇善战游击队，深夜闯入“将军”府。

刀劈恶贼除民害，英名载入英雄谱。

不幸的是，地下党员焦三元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由于游击队的连连胜利，国民党更加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泾县敌人在游击队不断袭击下，也龟缩到县城和三个据点内。在泾青南地区除县城和少数据点以外的广大农村，已经完全是人民的天下，农会纷纷建立，民兵空前活跃，到处呈现一派革命景象。

（二）“一抢二清”和“三抗”斗争

“一抢二清”斗争

在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铜青贵县委、县政府根据“三八”指示和地委会议精神，决定以抢粮斗争为突破口，来发动群众，把皖南沿江游击战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其实，这一地区早在年初泾青南、铜青南工委领导时，就在中心区发动群众开展了“三拖”斗争，就是用拖丁、拖粮、拖税的办法来对付国民党的征丁、征粮、征税，在“三拖”过程中，广大群众得到了利益，也看到了本身团结斗争的力量。

然而，国民党政府迫于发动内战的需要继续对人民群众进行严重的经济盘剥，且愈演愈烈，一些贫雇农民虽然终日辛劳，却不得温饱。当时地租一般为收获物的50~60%，高利贷的年息达本金的一倍，加之国民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处于赤贫状态。五、六月间，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些贫雇农已无米为炊，甚至“断顿”多日，只好挖野菜掺糠充饥。而国民党政府搜刮群众的大批粮食，却屯聚粮仓，派兵看守，颗粒不舍，完全不顾人民死活。愤怒的火焰在劳苦大众心底燃烧，它像一座巨大的火药库，一触即发。

在这种时候，又有游击队撑腰，一经发动，如火上浇油。在县委提出的“谁扒谁有”的口号下，一场以抢粮斗争为主要形势的革命群众运动风暴，席卷了泾县、青阳、南陵、贵池、铜陵等县的大部分地区，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政权。

抢粮斗争是先从南陵开始的。第一次抢粮的目标为国民党南陵县刘店乡仓库。6月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游击队派出部

队监视着碉堡中的乡自卫队，发动宾山脚下各个村庄数百名农民群众，拿着口袋、簸箕、稻箩，纷纷涌向刘店。快到仓库时，人群狂奔着，呐喊着冲上前去，声如雷鸣，势如山崩。近在咫尺的乡公所碉堡中的自卫队，慑于游击队和抢粮群众的声威，龟缩不动。抢粮群众砸开仓库大门，动手扒粮，顷刻之间，仓库的几万斤粮食被扒一空。此后，群众情绪高涨，抢粮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各地发展。人们高兴地把自己用双手收获的粮食挑回家中，抢粮斗争初战获胜。

刘店乡抢粮之后，国民党南陵县政府虽然很快就知道了，但却不敢到根据地来“查处”，对参加抢粮的群众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这就使得群众斗志更坚，信心更足，原来心存疑虑而未参加抢粮的人感到懊悔，再也坐不住了。特别是铜青贵县委加强了党的领导，正确引导，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行动，抢粮斗争在几个县的广大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捷报不断传送到县委：青阳南阳 500 多人，抢走国民党仓库粮食 60000 多斤；东石乡 500 多人，抢粮 42000 多斤；杨田埂 200 人，抢粮 14000 多斤；宾阴乡 300 人，抢粮 14000 多斤。青阳的朱备和南陵的六里丁，连国民党军队的 48000 多斤军粮也被一抢而空。从南陵的刘店、何湾、三里，青阳的杨田、宾阴、石壁、东石、南阳湾、木镇、杜村、陵阳，泾县的汀潭、北贡、云岭、中村董，到贵池的曹村、新丰，一处点火，到处燃烧。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抢粮”100 多万斤，几个县的国民党县政府在风起云涌的抢

粮怒潮面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在青阳，他们叫县调查室专员苏承平带了县常备大队 1 个中队来到木镇，希望能起到“镇慑”作用。但就在距离木镇 20 多里路的乔木湾，群众 800 多人，照样抢去粮食 28000 多斤。游击队在木镇边上鸣枪示威，又在青阳城边上杀了 1 个作恶多端的特务，陈尸路边，苏承平吓得龟缩木镇，一到天黑就宣布戒严。

铜青贵地区的抢粮斗争，配合了整个皖南的抢粮运动，又同芜湖、安庆等城市的抢米风潮汇合在一起，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力地削弱和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

随着抢粮斗争的推进，县委根据群众的愿望，又发动了“两清”运动，即清算地主恶霸所掌握的稻谷和祠堂里的稻谷，把斗争推向高潮。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以“积谷防饥”为名，向群众搜刮粮食，交给保长和当地士绅“保管”，实际上都被侵吞或放高利贷进一步盘剥群众。因此，尽管有些农民无米为炊，却无人施舍半斤“积谷”，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清算这批积谷的下落。游击队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但是，开展这场斗争，要比抢粮困难得多。因为抢粮是大伙去抢，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参加者的顾虑比较少。而清算积谷，对象是地头蛇保长和劣绅，需要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才能迫使他们将侵吞的积谷“吐”出来，群众的顾虑就比较多。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

作，解决思想顾虑。于是县委决定先在青阳宾阴乡二酉保进行试点。

二酉保有积谷 12000 斤，被当地劣绅董维文侵吞。县委派孙林、孙太英、胡永安率领工作队到二酉保先帮助大家成立了农会，然后由农会会长张银根出面主持召开清算大会。会前，积极分子把这批积谷的账目和董维文侵吞积谷的来龙去脉弄得一清二楚。开会时大家据实揭发，有根有据，证据确凿，劣绅只得低头认罪，当场表示愿意退出这批积谷，由农会全部分给大家，斗争取得了胜利。参加这次清算大会的还有周围区、乡的地方干部和农民代表，如彭国玺、王学文、王德科、王隆武、刘孟辉、李国唐、洪广、程新荣、王志胜、胡兴福等。他们回去后，迅速推广二酉保的经验，几天之后，就有 25 个村组织农会，开了清算大会，从而使清算积谷的斗争从中心区到边沿的广大地区迅速扩展开来，有的地方还一同清算了一些伪保长和恶霸地主的罪行，使他们威风扫地，而长期受地主劣绅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此时则扬眉吐气。

在抢粮和清算积谷斗争之后，县委还倡导和支持各乡、各村成立“保家队”，以保卫胜利果实，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报复行为，群众也有这样的要求。县委一倡导，很快发展起来。宾阴乡的二酉、朝华、宋冲、黄石、石安、天丰、花园 7 个保，参加“保家队”的就有 120 多人。以后各区乡在“保家队”的基础上建立民兵，全地区有四、五千人，配有一些土枪，杂以大刀、铁矛，

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各级人民政府，泾青南、铜青南、青贵、青石边区普遍成立了乡政府，各乡都有乡长，党员发展到几百人。农抗会会员达2万余人。这一切为游击根据地的大发展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准备了条件。

“三抗”斗争和减租减息

7月28日，华东局指示皖南地委应“着重发动群众，从目前的分粮与没收国民党军粮、公粮转到夏收时的抗租抗债，一直到农田土改”。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精神，地委于8月10日、20日先后发出《关于发动群众进行抗租抗债斗争》和《抗租抗债斗争中对农村各阶层的政策》两个指示，要求各地从分粮斗争迅速转到“三抗”（抗粮、抗租、抗债）斗争上来。

“三抗”斗争和减租减息较之抢粮斗争更具有广泛性、政策性。由于抢粮斗争的受益面仅限于那些斗争积极，勇敢的农民，而“三抗”的减租减息运动能使广大的农民群众普遍得到利益，因而它比抢粮斗争就更为群众广泛地接受。

县委认为：“三抗”斗争不仅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三抗”配合人民解放军，削弱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物资基础，尽快消灭江北守敌，早日南下。同时对解决游击根据地财经问题也能起到一定作用。在斗争中，县委指示各区乡以保为单位，以农抗会为基础，成立评租委员会，选举贫雇农为主任。青阳的杨田区各乡保，如茗山、甘家冲一带都由评租委员会制定了新租章，比原来租率减少了25%到30%，年息也相应减少了25%

到 30%；南阳地区农协对地主、豪绅的地租采取软拖硬抗的办法。保丁们要费要税，群众在农抗会的支持下横眉冷对，公开抗拒，并狠狠地回答他们：“把不起，差得起”。由于有党的领导，武装部队的配合，农抗会坚持斗争，致使国民党县政府及保甲长不敢派人抓丁要费，地主豪绅不敢催租逼债，尤其是根据地周围更无人敢公开收租、要费、抓丁、派伕。到 1947 年秋后游击根据地大发展时，“三抗”和减租减息运动遍及泾青南、铜青南、青贵各个地区，青阳县除县城外几乎全由人民当家作主，地主豪绅、保长、甲长再也不敢提及收租、要费、抓丁、派伕了。

在开展“二五”减租减息时，党组织首先进行摸底，弄清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接着开始在中心地区进行“二五”减租。杨田区的 3 个乡由点到面进行。宾阴乡二酉保占毛子等 3 户农民共租种地主周海山 18 亩 6 分水田，每年要交老秤 4000 斤稻谷，减租后只需交 3000 斤。照此推算，仅宾阴乡共计减租 56000 多斤。另外，还对国民党粮库的积谷进行了开创分粮。乔木乡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共打开国民党粮库分掉粮食 300 多担；杨田乡在民兵的带领下打开国民党粮库分掉粮食 500 多担。

“一抢二清”和“三抗”斗争的开展，狠狠打击了封建势力，削弱了国民党在泾、青、南、铜、贵地区的统治基础，共产党领导的皖南游击战争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三）财经工作

在宾山根据地创建初期，游击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向地主“借”。借钱的地点一般是在离游击中心区 50 里以外的地区，并且事前进行周密的侦察和细致的安排。由于每次行动都考虑得很周密，同时，游击队提出的要求也并不过份，以他们力所能及为限，在“借”的时候又讲明道理，晓以利害，所以游击队并不需要抓“人质”，一般都能完成任务。有时他们手头短缺，就先支一部分，其余分批支付。到达付款期限，先派群众去看看动静，有没有国民党部队在那里打伏击，以后才去取款。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也有借款的任务，定期送来，以保证基本供给。“没有枪，没有弹，敌人给我们造；没有粮，没有钞，找恶霸地主去要。”这便是当时财经情况的写照。

至 1947 年 7 月，根据地有了较大发展，在铜青贵县委辖区建立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这时的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财经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正在此时，华北解放区召开了财经工作会议，提出今后要逐步达到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进一步统一，铜青贵县委县政府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落实了财经人员，并逐步建立起财政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当时青阳境内有杨田区委、区政府。财经工作各地做法也大体一致。因此，杨田区政府的财经工作基本上可以反映当时的财经状况。

杨田区政府辖三个乡、一个武工队。乔木乡会计张可钦，宾阴乡会计王松波，杨田乡会计王道千，区政府会计陈长厚。

粮食和经费开支，由各乡会计月终报区核销。特别是粮食，凭公粮券（油印的）领取，不准用便条，以防漏洞。公粮券是县政府发到区政府，区政府按各乡人数发下去。吃饭要付券，无券出便条，有券时再换回便条。来往部队吃粮，凭公粮券领粮，区政府按月向上报销一次。当时财粮来源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税收，二是公粮，三是借款，四是公债券。

税收 税收包括开店营业税、货物过境税、屠宰税。收货物过境税是在交通要道设税收点，由税收员征收；屠宰税由乡政府代收。当时税率很低，每亩收大米2斤，一担大裱纸收5%的过境税。这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家都愿意缴纳。杨田区设两个行商交税的地点。黄木岭头上，税收员朱来富，由于环境恶劣，后迁移到清坑边桂竹园万级岭上，税收员王培盛。营业税征收地方为乔木街上，税收员由张可钦兼；大格里油坊、商店，税收员胡大兼会计；董村油坊、商店，税收员副乡长程新荣兼；花园、吴村商店、纸槽，税款由项永太、高玉珍代收；张家山税款，由祝海青、张克勤代收；平坑和宋冲纸槽，税款由陈复生代收。商店营业税，采取一次认定，分期付款。交税给税票，后来，油印的税票改为石印。税票由县发到区，区发到税收员。交税后，税票在全国解放区、游击区一律有效。

公粮 公粮（也即田赋）征收，按田亩计征。大地主，大公堂多征，一般少征或不征。征收大地主家公粮，也要留下他全家人的口粮；征收大公堂公粮，适当地留下祭祀吃用粮。并在乡长

会议上确定各乡征收数字，以保为单位，填写田赋册，由保长负责征收，区、乡有财粮员负责催交。催交公粮人员有：金家冲的王驼子、钟满斗；老虎坑的李国堂、吴东山、彭国生；宋冲梅统章、张丙南、姚保根、王明亮；盘台黄勇、江桂芳、余某；万级岭朱春香；五梅的王柏籽、洪保子；桥头施一带王镇国、陈青；竹塔、李村、王村、东堡，有一位妇女主任代催，其他地方都由可靠的群众负责催交。

1948年9月，沿江工委成立后，组织了一个工作组，由孙运松、徐鸿昌和陈长厚，带领一个班的武装力量，开展公粮征收工作。这个地区田地大部分是苏百万（外号）家的，苏家究竟有多少田地，谁也弄不清，只有苏百万二东家总管账知道。总管账住在岭上苏，那里有国民党乡公所，乡长杜子学极其反动，仅二工委干部和部队是吃不掉他的。经请示，上级派来柯斌、朱荣生率领一个营部队来协助，把总管账抓到了，交出田亩数字，按田亩征收了公粮，还缴了总管账一支手枪。

借款 游击队借款借粮的对象，都是一些大地主、大坏蛋，他们不借也不行，这些地主平时依仗恶势，对群众巧取豪夺，说句实话，不借对他们是不客气的。

1947年9月，游击队向乔木大地主洪某借了100担米，借条是孙林写的，派钟满斗送去的。讲好分批交，他交了一半不想再给，后来派钟满斗带武装强行要回。

1948年10月，二工委副书记陈策写信给查村大地主借200

担米，信是由住在张家山一个聋子妇女送去的，200担米如数送来了。

同年，游击队再次向查村大地主借过200担米，借条用游击队名义写的，叫地主的佃户送去的。

董家湾有个开药店的老板，家里很有钱，人很坏，游击队乘本地人晚上打门买药这个机会，送去1张10担米的借条向他借米，他吓到了，说没有米，用30块“关金票”折算了（米价3块关金票1担）。

还有一次，一个在上海开店的妇女，回家收了22担租稻，游击队向她借，她二话没说，全借了。

公债券 另外，还有一个来源渠道就是发行“救国公债券”。1947年底，因六十三师“老虎队”疯狂“清剿”，税收来源断绝。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就以“皖南人民解放军长江总队”的名义，发行一种“救国公债券”。认购对象，主要动员资财较多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票面有伍百万元、壹仟万元、壹仟伍百万元、叁仟万元等几种，在泾、青、南、铜、太地区发行。在公债券的背面清清楚楚地刻印了“五点说明”，内容是：“（一）本军为完成解放皖南人民之任务，坚持蒋后斗争，按合理负担之原则，解决军费问题，特发行此公债券。（二）本公债券概由地方爱国人士自愿承购，不得强迫摊派与转售。（三）本公债券按年利1.5%给息，限1年归还。（四）本军皖南各县民主政府建立时，承购人可凭券向各县民主政府领取本息。（五）凡伪造本公

债券或假借本军名义募捐者，一经发现，决予严办。”

游击队的经费，一是用来解决部队生活供给，二是用来买些枪支弹药和药品。

当时，杨田区委、区政府机关和乡及武工队的干部战士供给标准：

伙食：每人每天供给大米两斤半（折款），米款包括粮油盐菜。

衣服：新战士每年单衣一套，老战士一套（特殊情况例外）。冬天棉袄一件，夹裤一条；布鞋一年两双，布袜一双（发布自做）。每人每年发平布 12 尺，缝成两层布套算是单被，冬天每人发棉花一斤半，塞进布套里算是棉被。

日用品：洗脸毛巾每人每年两条，牙刷两支，牙粉每月半包。区长待遇稍高一点，每月香烟一条，排以上干部（包括乡长），每人每月黄烟半斤，班长、战士每人每月黄烟 4 两。

学习用品：每人每月发练习本一本，铅笔一支。

1947 年 10 月，皖南地委遵照华东局指示，由熊兆仁、倪南山率领部队向皖浙赣边区进军。为了保证南进部队的供给，皖南地委要求各县共上缴 20 亿法币。泾青南县委接受了 8 亿法币任务，考虑到泾南地区比较富庶，就要泾南工委完成这一任务。王克祥有计划的积极筹措，很快办妥。上缴的 8 亿法币，请老百姓挑了 10 个挑子送给地委，有效地支援了熊兆仁、倪南山的部队向皖浙赣地区进军，为皖南游击区的进一步开辟和发展作出了贡

献。

第四节 泾青南县委、县政府的建立与活动

一、泾青南县委的建立

在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胜利大发展中，中共皖南地委于 1947 年 9 月在泾县涌溪召开地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前 6 个月大发展的有利形势，确定了今后的发展方针和任务。会议并对地区划分作了重大调整。

皖南地委会议决定：撤销铜青贵县委，成立泾青南县委。青贵工委地区划归杨明领导，将南繁芜县委改为工委，和泾县后岸、太平龙门一并划归泾青南县委领导，铜、南、繁、泾、青统一为一个战略单位，统由泾青南县委领导，坚持沿江游击战争，控制芜湖。泾青南县委由朱农任书记，陈尚和任副书记，王安葆、张华、陈作霖、尹彬为委员，孙太英为县委组织科长。泾青南县委直属皖南地委。县委地址先后设在金家冲、宋冲、盘台、太平龙门，党员有四、五百人（不含南繁芜数）。同时，改铜青贵县政府为泾青南县政府，地址先后设青阳境内的宋冲、金家冲、盘台、南陵大格里、太平龙门地区，县长朱农。县委、县政府成立后很快调整健全各级党组织，充实干部力量，建立了区、乡人民政府。

县委下辖三个工委，五个区委：

三个工委是：

1、铜青南工委 书记：尹彬，委员：徐世达、查斌、赵彪

2、南繁芜工委 书记：王安葆， 副书记 陈作霖

3、泾南工委 书记：王克祥， 副书记 吴祥 委员：
王季福

五个区委是：杨田区委，书记：孙林。另四个属邻县，北贡区委，书记：胡爱民；云岭区委，书记：陈云秋（陈有秋）；厚岸区委，书记：孙太英；龙门区委，书记：孙刚（代）

县政府下辖两个办事处，五个区政府，二十二个乡政府

两个办事处为：南繁芜办事处，主任 王安葆；铜青南办事处，主任：尹彬

五个区政府为：杨田区政府， 区长：孙林。其余四个为邻县。北贡区政府， 区长：胡爱民；云岭区政府，区长：陈云秋；厚岸区政府， 区长：王季福（代）；龙门区政府， 区长：巫乐天。

二十二个乡政府：青阳有宾阴（乡长彭国玺，后吴士民）、乔木（乡长洪广）、杨田（乡长董木森）、天屏（乡长郜先哲）、茗山（乡长崔联臣）、庙前（乡长不详）、其余为邻县，泾县有双义（乡长徐白明）、云岭（乡长李传家）、北贡（乡长陈永贵，后黄建平）、厚岸（乡长徐鸿昌）、包合（乡长朱金波）、查济（乡长张金涛）、田坊（乡长赖东财）。南陵有刘店（乡长王昌应）、三里（乡长沈植）、黄山（乡长杨友富）。太平龙门（乡长方也人）、新丰（乡长潘拨夫）、永丰（乡长杜阳生）。铜陵有涧北（乡长陈祖荫）。贵池有汪河（乡长不详）、齐金（乡长不详）、其中庙前、

汪和、齐金三个乡政府后划归杨明领导。

泾青南县大队

泾青南县委成立时，原铜青贵县大队更名为泾青南县（游击）大队。这期间皖南地委从泾青南县（游击）大队中调走了第一连，县大队又重新组建了一个连，这时（不含南繁芜工委）县大队和各区乡自卫队共计有步枪 300 余支、短枪 100 余支、机枪 5 挺。代理大队长：全胜仁，政委：朱农，大队副：柯斌，教导员：王克祥，军需：胡永安。

第一连（新组建）副连长：董长春

第三连 连长：柯斌，副指导员：崔必达

警卫队 队长 周光斌

1947 年 9 月，原铜青贵县委所辖青贵工委改为青石贵工委，组成人员未变，隶属关系改由黄西工委领导。

二、粉碎国民党军的连续“清剿”

（一）粉碎国民党青阳常备队的“清剿”

泾青南县委、县政府成立后，其所属铜青南工委机关设在茗山冲孙运丰家。1947 年九、十月间，为利于“清剿”，常备队要在茗山冲、杨家冲、丁家桥各设一个碉堡，准备购买枪支，扩大武装，对付游击队。他们指派特务甘南普（地主）和周茂礼具体实施。如果他们诡计得逞，铜青南游击队就要受到极大的威胁，那时就寸步难行了。游击队在工委的领导下，决定出击，使其阴谋破产。一天，徐世达、赵彪、查斌带领几十名游击队员，白天隐藏在甘家冲毛竹园，天一黑，将周茂礼房子团团围住，游击队

枪一响，打到了几个国民党兵，缴获了三支枪，抓到了甘南普、周茂礼。甘南普原是保队副，因反共有功，国民党提升他为乡队副。游击队赵排长，将甘南普押到永存桥枪毙了，周茂礼等人教育后释放。

枪毙甘南普，活捉周茂礼给国民党以沉重打击。1947年初冬，国民党青阳常备队一个大队，突然向茗山冲铜青南工委机关“清剿”，当时机关干部和战士只有40多人。得到情报时，常备队已接近游击队岗哨，情况异常紧急，游击队连长赵彪，当机立断，带一个小组向常备队猛冲猛打，当场击毙国民党兵两人，夺得步枪2支。游击队连续向常备队掷出两颗手榴弹，常备队退到山沟石桥底下，赵连长单枪匹马冲过桥去追击，被常备队暗枪中伤，幸而徐世达带领了一个班迂回穿插，击退了常备队，战斗中一班副钱春和光荣牺牲。

（二）粉碎六十三师“老虎队”的“清剿”

在反一五〇、一六二师“清剿”斗争的过程中，由于游击队采取了分散活动，从而在斗争中不断壮大，铜青南、泾青南、青石、青贵等地游击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宾山为中心的连片的泾青南游击根据地。青阳除县城外，几乎都是共产党控制之下，当时曾有“小解放”之称，同时皖南其他游击根据地也得到了迅猛地发展，这给国民党以极大震动。国民党为了巩固长江防线，稳住宁、沪、杭外围的皖南，国民党军对皖南、沿江地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清剿”。这次“清剿”，从1947年10

月开始到 1948 年 3 月，历时半年。其部署是：以少将参谋长龙炎武为指挥，集中第六十三师、四十六师，加上一个宪兵团，首都卫戍团，安徽省保安总队两个大队和皖南各县地方武装，采取“驻剿”、“追剿”、“堵剿”、“搜剿”等种种阴狠毒辣的手段，对皖南地委所领导的各个游击根据地进行全面“清剿”，企图一举消灭游击队。

这次“清剿”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47 年 10 月到 11 月为试探性“清剿”，采取重点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摧毁地方党的基层民兵和农会组织，试探游击队力量与对策；第二阶段，从 11 月底起，以老区为主，有计划、有重点采取驻扎性“清剿”，并配合实施移民并村，大力宣传自首政策，目的是搞垮皖南党的地方工作；第三阶段，从 1948 年 1 月至 3 月，增兵扩大“清剿”范围，实行全面军事“清剿”。

当时，安徽省第七专署保安副司令孙主均率 1000 余人“进剿”青（阳）石（台）贵（池）地区。到青阳的则是以美式装备的六十三师一个加强营，号称“老虎队”，在保四团和青阳常备队两个中队的配合下，向宾山和茗山游击根据地展开全面军事“清剿”。

根据地党组织和武装部队在泾青南县委的领导下，展开了反“清剿”斗争。在策略上，遵照地委的“分散隐蔽，坚持斗争”的指示，主力部队进入森林，利用天然屏障与敌周旋。起初，泾青南县委以为对手是国民党县常备大队，在宾山脚下的董村接上

火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正规军队。由于敌众我寡，游击队边打边撤。这时，彭国玺率领民兵将土制大炮架起来，连放了两炮。这种大炮是檀树挖成空心当作炮筒，外面用铁丝捆紧，里面放些碎铁片，再放1斤土硝，点燃后，碎铁片迸发出去，在短距离射程内有一定杀伤力。两炮一放，炸死炸伤了几个国民党兵，他们连忙退了回去。但这次战斗，游击队排长张云山和4个民兵英勇牺牲。随后，县大队转到泾县的中村董的第三天，又与“老虎队”打了一仗。当晚游击队夜宿泾县章渡后的南山岭，第二天早上到包村时，得到消息说中村董的国民党军又向包村“清剿”，县大队和民兵即在苏岭堵击。当国民党军来到苏岭半山腰时，游击大队主动出击，民兵又狠狠轰了几炮，炸死、炸伤几个，国民党军慌忙拖着尸体、抬着伤员退了回去。

不几天，得到消息，六十三师“老虎队”又要到宾阴乡“清剿”，泾青南县大队一个连和县委机关警卫排加上杨田区队和彭国玺挑选的200多民兵，埋伏在进山口两边山上，“老虎队”一部中计进入伏击圈，战士们猛烈射击，将其击溃，战斗一结束，县大队转到章渡、厚岸，不久，又转到大格里。

接连几天，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对游击根据地实行包围，反复穿插进剿，没有找到游击队主力，便拿群众开刀，用屠杀的方法来吓唬群众，并搬出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走一人”的口号，在血腥镇压面前，宾阴地区仅一次就杀害地方民兵6人。他们对于根据地的群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强迫自首，若是游击队

和民兵家属则一概关押，严刑拷打，以此引诱人员出来自首，并强迫群众移民并村、砍山、拆棚，致使游击队无处立足。此时，在抢粮和“三抗”斗争中吓跑了的地主劣绅也纷纷还乡，他们伙同国民党军队编造户口册，恢复保甲制度，破坏基层民主政权，并仗势向群众反攻倒算。青阳“统建委员会”和“戡乱委员会”则专门从事强迫民兵和群众自首，进行特务活动，刺探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情报。

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和游击队在根据地内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首先县委机关、军队与群众同甘共苦，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将群众撤到深山中。许多人自动为游击队搭棚，探听消息，同时也和一些靠近党的上层人士建立统战关系。这样部队消息灵通，行动也方便多了。同时对一些站在反动立场上的敌对分子、死心踏地的地主、保长、县参议员则坚决予以镇压。宾山地区一次就镇压了5个，如青坑保长王献忠，吴潭区敌辅导组组长陶根才等。铜青南工委和游击队也镇压了几个特务，如国民党参议员吴康继等。挖掉了国民党的耳目，他们便不敢轻易活动了。以上工作，为反“清剿”斗争奠定了基础。

12月中旬，泾青南游击队又取得了梅村战斗的胜利，击败了多于游击队6倍之强敌。俘3人，缴步枪31支，冲锋枪2支，机枪1挺。1948年2月，国民党军队200余人向金家冲进攻，县大队在民兵配合下，激战1小时，毙敌4人，击伤3人，俘虏7人，缴获长短枪各1支。不久敌六十三师一部经盘台到九华山

“清剿”，被青贵游击队击溃，击毙八、九人。1948年4月经县厚岸乡公所乡丁携两挺机枪、十几支中正式步枪、1支短枪准备到万级岭骚扰。当时在万级岭茶馆地下党交通员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柯斌和方忠元，于是柯、方带10多人埋伏在万级岭的油菜田里，乡丁一到，伏兵当场打死他们8人，俘虏7人，武器全部缴获。不几天县委又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将乔木湾的保长杀死，暴尸于打鼓岩游击队埋伏圈内，不一会乡自卫队果然来了，结果被游击队击毙6人，缴枪8支。

6个月的艰苦反“清剿”斗争，县委采取军事反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胜利，1948年4月左右六十三师“老虎队”带着伤兵无功而返。

不过，在反“清剿”中，游击队也遭受到一定损失，1947年11月17日在南陵绿岭小张山，泾青南县委副书记陈尚和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6岁。1947年冬，游击队在盘台突围的战斗中，游击队也牺牲、被俘十多人，其中有宾阴乡长吴士民和几个民兵。后来，总结经验教训，客观上固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主观原因是在胜利的形势下，指战员不如以前那样谨慎了，敌情不明就同敌人交上了火。

尽管如此，战友的牺牲还是激起了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恨，为给陈尚和等烈士报仇。泾青南游击队不顾劳累，连续作战，袭击了朱村乡公所。12月，游击队从青阳茗山冲出发，到铜陵马市冲攻打朱村乡公所自卫队。朱村乡是铜陵16个乡中反动势力

最强且最顽固的一个乡。游击队通过武工队长许万荣做好敌碉里两个士兵的工作。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夜晚行动，架起长梯子爬进碉堡，活捉顽固头子刘孟周和原在新四军部队当机枪手的叛徒徐秃子，缴获7支步枪，1挺轻机枪，火烧了朱村乡公所。将刘、徐二犯带回茗山，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处决，人心大快。

（三）粉碎国民党新编独立十三旅的“清剿”

在粉碎国民党六十三师“老虎队”的“清剿”后，4月底，国民党国防部命令新编陆军独立第十三旅，对皖南游击队进行“清乡清剿”，并发布“清乡清剿实施办法纲要”，5月初，新十三旅旅长许午言（许立新）兼任南京——九江段江防指挥部芜湖市防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率部进入皖南，在芜湖召集副旅长苏桂菁、参谋长古让泉、三十四团团团长刘启文、三十五团团团长黄宇瞻、三十六团团团长张亦若、政治部主任高平初等开会商讨，专门部署对泾青南游击根据地的“清剿”。这次会议，他们将“清剿”区划分为繁昌、青阳、泾县3个区。其兵力部署是：繁昌区由三十六团直属部队一部及该团第一营、三十五团第二营编成，张亦若负责指挥；青阳区由三十五团直属队一部及三十五团第一营、第三营编成，副旅长苏桂菁负责指挥；泾县区由三十四团编成，团长刘启文负责指挥；旅长许午言率搜索连、通信连、运输连各一部，在繁昌平沟铺设立“清剿指挥所”，统一指挥各区。

新十三旅“清剿”计划分为4步：第一步，昼夜不停地对游击队进行袭击，以捕捉游击队之主力。第二步于实施第一步的同

时组编保甲地方武装，设立盘查哨、联络哨以构成警备网，昼夜对来往人员进行检查。第三步，实行重点清乡，突击检查（查户口）并采取五家联保、十家联防，办理自首登记；同时以假仁假义、小恩小惠办法收买民心，企图使游击队孤立。第四步，如以上三步无效时，则立即进行最毒辣、最残忍的手段，砍山并村，将山区丛林地区砍出交通路，设哨巡逻，将零散住户并入大村居住，妄图割断新四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以断绝游击队的情报和供给，并派部队分乡分组日夜对新四军和游击队进行轮番地梳篦式地“清剿”。这次“清剿”是解放战争中，敌人对泾青南地区进行的第三次大规模“清剿”，也是最严重、规模最大的一次“清剿”。

这次国民党军“清剿”与过去几次不同的是：首先这个旅是独立旅，原是师的建制，有1万多人，配有完整精良的武器装备；其次，这个旅多次作战，有一整套反共、反人民的经验；第三，经过周密策划，有一个实施《清乡清剿实施办法纲要》的具体计划；第四，这个旅不是“清剿”整个皖南，而是专门对付泾青南繁地区。他们推行所谓“政治与军事相配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政治上，他们诡称“走错了路，能回头者，概不追究，保证安全”，策动游击队中不坚定分子自首叛变。在军事上，他们采取“坐剿”、“追剿”、“会剿”、“堵剿”相结合，包围、搜山、夜袭、设伏、堵击等种种毒辣手段相互并用。

1948年3月上旬的一天夜里，洪广带人杀掉了乔木乡乐园保

长洪应财，并暴尸于大路边，同时连长柯斌和县警卫队长周光斌，连长彭国玺，排长方忠元等率领部队 80 余人，埋伏在打鼓宕的两旁，再叫该保一个甲长前去报告。乔木乡公所得知情报后，于第二天上午 9 时许由乡队副张权带领两个班的乡兵，向打鼓宕“进剿”。尖兵刚进包围圈内，游击队某伏击组首先开了枪，接着射击全面展开。乡兵听到枪声，始觉上当，掉头就跑。眼看敌人就要逃掉，排长方忠元带领陈在义、董南生、王传毛等向敌军发起了冲锋，方排长握着 2 把手枪始终盯住乡队副不放，在游击队掩护下，足足追击了 1 华里多路，才将张权击倒。方排长赶上前去立即摘下张权的手枪和“九龙”子弹袋。与此同时，其他战士也抓到了几个俘虏，缴获了几条步枪。这一战共打死敌军 6 人，俘虏 11 人，缴获步枪 8 条，手枪 1 支，子弹几百发。第二天获悉乡队副张权中弹后装死，晚上爬到甲长家，被送到乔木乡公所。这次战斗未达到预定的全歼敌军的目的，而且游击队两个战士还受了伤，其原因主要是协调不够好，第一枪打得过早。

1948 年 3 月 27 日，万级岭头的交通员朱春香、董来富从乡兵的谈话中得知国民党厚岸乡公所要去接一个什么人。朱、董趁他们喝茶之机，从后门溜出送了情报。柯斌、方忠元得到情报后，决定立即行动，选择了乡兵必经之地——白马塘的一块开阔地中的丁字路口上，赶在乡兵回头之前设下了埋伏。具体分工是：方忠元率陈在义、董南生、王传毛为一组，埋伏在路西，断敌后路；王道千带领几人埋伏在路北打头；柯斌率领一些人，分布在东、

南两边埋伏，从中截击。一切准备停当，这时，从杨田方向传来了乡兵的吹号声，不到一小时，厚岸乡公所乡兵便摇晃着上了白马塘。走在前面的两个尖兵到达上坡路口处停了一下，和后尾部队一起逐渐进入包围圈，这时方忠元小组开始射击，其它各组紧接着全面开火。乡兵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猛烈射击弄得手忙脚乱，想还击时，游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了冲锋，两个机枪手和几个乡兵当时被打死了，其余乡兵有的钻进麦地里，有的躲进柴堆里，不到十分钟，战斗便结束了。战士们将乡兵一个个拖出来，总共打死8人（其中1个30多岁年纪，戴着太阳帽，穿着白大褂，据说就是乡兵们要接的人）。俘虏7人（其中伤3人），逃跑1人，缴轻机枪两挺，驳壳枪两支，步枪7支，子弹数箱。

1948年5月，南陵县参议员王聘三（刘店乡人），送来十三旅要到泾青南地区“清剿”的情报。县委和县大队立即在南陵大格里召开会议，分析形势，作了反“清剿”部署，要求各工委、区委、各游击队机动灵活地做好反“清剿”准备。决定朱农和孙太英、胡永安率领泾青南县委机关干部和警卫队在宾山地区坚持；县大队代理大队长全胜仁、大队副柯斌率三连去太平龙门配合龙门区警卫队活动；副连长董长春率一连去泾南边界的田坊等地活动；在南繁芜地区活动的有王安葆、陈作霖；在铜青南边界活动的有尹彬、徐世达、查斌、赵彪；在泾南活动的有张华、王克祥、吴祥、郎俊；在杨田区活动的有孙林、彭国玺、孙运松；在青阳南乡活动的有胡爱民、章贵；在后岸、北贡活动的有王季

福、马佳林；在太平龙门活动的有孙刚、鲁凡等。他们分别率所属游击队，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采取各种斗争形势，从军事上和政治上狠狠反击敌人。

开始，游击队以为新十三旅的“清剿”和过去敌人的几次“清剿”一样，只要“清剿”几天找不到目标，就会自动撤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清剿”斗争，体会到新十三旅“清剿”的长期性和残暴性。敌人更加疯狂地杀害党的干部和群众，破坏民兵组织，强迫自首登记。针对敌人这次“清剿”的特点，游击队又重新作了反“清剿”部署。重新部署后，游击队按照各自的情况，寻找时机袭击敌人。各地游击队分别袭击了大通、青阳城、木镇、宾阴、南陵城、三里店、后岸、章渡等地的敌人，游击队四处出击，以小规模活动牵制敌人，以小胜取大胜，游击队曾经5次深夜摸到青阳城外东打几枪，西打几枪，南吹进攻号，北吹撤退号；3次到杉木岭、黄檀村公路边，共砍电话杆百余根，拆电线千余斤，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还用“火罐子”装上燃着的木炭，放几颗子弹，火的温度高了，子弹就响了，敌人听到子弹声，以为新四军又来了，弄得敌人晕头转向，只要听到游击队的枪声和号声，就心惊胆战，整夜枪声不停。游击队只用几发子弹，敌人就要用几百发、几千发的子弹。使“清剿”之敌或东或西，或南或北，无法捕捉游击队之主力，陷入疲于奔命的境地。

1948年6月22日，泾青南县大队由全胜仁、柯斌率领三连配合黄西部队在太平浮丘坦打了一次伏击战，给敌人以很大的震

动。头一天接到情报，得知太平县敌军在芜湖购买了一批武器，22日经芜屯公路运往太平县城。部队于当日清晨在太平浮丘坦设下埋伏。上午8时，装运武器的汽车渐渐驶近，指挥员一声令下：“打！”于是，轻机枪，长、短枪齐发，手榴弹在汽车前后爆炸。押车的敌人连喊停车，下车逃窜。战士一涌而上，将车上的31条步枪和1000多枚手榴弹、2000多发子弹全部缴获，并放火烧掉了敌人的汽车。

7月间，铜青南工委徐世达、赵彪等在南陵的童村街打伏击，缴获了何湾乡自卫队两支步枪。

1948年9月13日夜，方忠元在青龙山设下埋伏，同时叫开了陈在庭的门（陈在国民党十三旅“清剿”时被迫以民兵名义自首，并被指定为国民党杨田情报组情报员，后即向方排长汇报了此问题，表示仍然积极为游击队工作），向陈交待任务，让其去向国民党常备队报告。陈遂于次日清晨跑到杨田埂向常备队报告：“青龙山昨夜来了‘匪’，只有4人，衣衫破烂，头发很长，还做了饭吃。”新任排长杨自全，立即命令吹哨集合队伍，方忠元率领助理员王道千，班长曹振祥，副班长包金水，战士王传毛等11人，携带8条半枪（半条枪系指单打一）和龙池乡的江青、邱银山、沈黄金（各携1条土枪）已埋伏在青龙山的大山凹里。那里一片开阔地，中间有一条人行道，两边杂草丛生。上午九时，国民党常备队的杨排长率领1个排20多人（枪），从杨田埂出发到了青龙山。方排长见常备队已靠近，轻声命令战士把枪口对准

敌人，并有意放过前面的两个尖兵。只见常备队有的脱掉上衣挂在枪头上，摇摇晃晃地走进了伏击圈。这时，方忠元一声令下：“打！”埋伏在两旁的游击队战士猛烈开火射击，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爆炸。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常备队束手无策，当场被打死两人，排长杨自全当即毙命，其余举手投降。这次战斗从打响到结束，仅用 10 多分钟，缴获捷克式机枪 1 挺，二把手枪 1 支，步枪 20 条，子弹两箱。青龙山伏击战是在国民党十三旅“清剿”快要结束时打响的，捷报震动了整个青阳。

一连串的胜利，有力地回击了“清剿”之敌。不久，“清剿”了 4 个月的新十三旅，鼓吹了一通“辉煌战果”之后，便悄悄地撤走了。

在 1945 年秋至 1949 年春这 3 年多的游击战争中，泾青南游击队由 70 多人发展到 600 多人，另有民兵 500 多人，期间，发展党员 400 多人，与敌进行大小战斗 30 多次，缴获机枪十余挺，步枪近千支，手枪、冲锋枪各十余支，手榴弹 100 余箱，子弹数万发，俘敌 1600 余人。

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游击队付出了血的代价，许多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生命，如革命烈士陈尚和、姚生、张云山、张良仕、洪广、程新荣、吴士民等，其中，有的在被捕后表现出的崇高革命气节着实令人敬仰。

共产党员程新荣在二酉保苏家冲山上的朝阳洞不幸被捕后，敌人严刑逼迫他讲出游击队的行动方向和宿营地点，他坚强不

屈，只字不吐，表现了共产党人“头可断，志不可摧”的英雄气概，后来竟被活活打死在敌人的刑具架上。

共产党员洪广带一名战士去宾阴找县委，途径大叶岭被国民党三十五团第二营邓迎宾部包围，洪和这名战士开枪还击，打死两人，击伤数人，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就义时，他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连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情景极为壮烈感人。

青山处处理忠骨，革命烈士永远活在青阳人民心中。

在艰苦的反“清剿”斗争中，革命队伍中也有一些不坚定分子经不起考验，叛变革命。如双义乡乡长徐白明、乡指导员董生坞向敌人自首。杨田乡乡长董木森叛变，龙门区警卫队指导员周明旺、大格里游击队长胡来保带走 30 多人、20 多支枪投敌，给游击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四）秘密党支部配合反“清剿”斗争

粉碎国民党军的连续“清剿”是当时泾青南县委的主要活动，同样也是这一时期常备队秘密党支部的工作中心。泾青南县委领导的反“清剿”斗争之所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是与常备队秘密党支部的紧密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秘密支部提供的情报准时准确，使县委和游击队及时掌握敌情，知己知彼，从而掌握了反“清剿”作战的主动权。

早在 1945 年元月，陈法周将上级党组织送来的《大江报》和其他宣传品交给秘密支部散发，支部便组织人从笔架桥一直散发

到江村、朱备、东家桥、龙口，还将传单塞进国民党县政府内。在反“清剿”斗争中秘密支部索性将宣传品散发到“六十三师”和“十三旅”军队内。这些行动造成敌人军心恐慌，震动很大，以致国民党青阳县县长唐克南命令县府手枪班日夜警戒，并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县府官员亦停止办公多日。

国民党六十三师“老虎队”和“新编独立十三旅”在青阳“清剿”时，只要他们和青阳县政府一联络，陈文堃等就会立即送出情报，如“十三旅”和青阳县政府共同策划的对泾青南地区几次大的“清剿”都是由于事先得到情报，游击队才避免了损失。陈表面上表现得非常积极，深得县长等人的“赏识”，有了这个条件，他便深入到县政府内部活动，寻机索取情报。在他自己奉命“清剿”时，一到达游击区便朝天放3枪为信号，游击队听到信号知是陈部来了，便有意避开。日子久了不免有人怀疑，陈就事先和游击队约好，双方朝天放枪。1943年，杨明率部队到牛山时曾通知陈，“铜大”部队要去“袭击”他，约定时间打了一阵，杨明便率部队“撤退”，陈便凭此向国民党县政府“报功”说新四军被他们“打跑了”。因而县政府越来越相信陈，认为他是个“常胜将军”，一有艰巨任务便交给陈去完成。秘密支部与国民党斗智斗勇，使国民党吃了不少哑巴亏。

1947年，游击队杀掉常备队联防中队长胡开武以后，国民党青阳县县长陈家伊感到对其威胁大，于10月份亲自率领县常备队宪兵连并约同南陵常备队到大格里地区“会剿”。出发时命陈

文堃率第四中队作为前哨，事前陈已派人送出情报，住在宾山的铜青贵游击队随即撤走。陈家伊接近宾山时命常备队占领了大格里的几座山头，作好了战斗准备，南陵常备队进入陈阵地时，陈以其未鸣枪发信号为由，立即命令射击，顿时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开火，当南陵常备队发觉这场“误会”时已伤了多人，为此两县打了很长时间的官司，直到陈家伊离任才告结束。

三、人民群众的支持

说到底，这场反“清剿”斗争实质是一场人民战争。群众的支持与帮助是游击队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是抗击“清剿”真正的铜墙铁壁。游击队之所以能在游击区游刃有余，连连取胜，并不断壮大自己，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人民群众。

在游击区，革命群众不分昼夜地为游击队站岗放哨、送情报、抬担架、救护伤员。他们自己带干粮，从不花游击队一分钱。他们知道山上游击队生活艰苦，常冒着生命危险送粮送菜上山。如宋冲地区几百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利用上山生产为掩护，将粮食藏在挑粪的竹杠里，藏在裤脚里，终于一次又一次地将粮食送到游击队。又如青坑、二酉、朝阳、花园、石太、五梅等地群众，乘早上出村做田的机会避过十三旅岗哨的检查，共送给游击队大米约600余斤。另外，只要游击队在约定的地方放上多少松果，群众就知道游击队有多少人吃饭。之后就可以在这里取到食物。夜里，群众用被子蒙住窗户，门外放哨来煮饭，煮好后放在水桶里假装挑水送出去，所以，游击队往往能在隐蔽约定地取到食物，

却不知道是谁家送的。1946年秋，敌保安配合泾县土顽突然向根据地进攻，一连战士突围到汪家山头上的汪老大家，村上一共只有四户人家，当时，干部、战士已有两天多没吃饭。汪老大便动员各户把仅有的30多斤米和早熟玉米煮给游击队吃了，而他们自家老小只好饿着肚子，大家知道后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而他们却说“你们为我们打仗，这只是尽我们的一点心意”。后来敌人知道了，放火烧了他们几家的房子，将汪老大逮到章渡乡公所严刑拷打，但汪老大坚贞不屈，表现出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气节。国民党“清剿”时，在村里组织村民“巡逻队”，本来是为国民党军提供情况，经过群众运作，转而成为游击队的信息来源，他们巡逻时没有情况，只打一响，喊着“平安无事”，一旦发现情况，就打紧锣一、二、三，村里的党员就向游击队通报。就连放牛的小孩也都成了游击队的千里眼、顺风耳，敌人来了学牛叫，敌人走了学鸡叫。因此，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群众的监视之中。

1947年8月间，游击队为扩充部队，发出了参军动员，当即出现了母送儿、妻送夫、姐送弟参军的动人场面。有一次，仅一天就有80多个青年报名参军，当天就组成了一个新兵连，这一个连后来编入县大队第三连。

勘上保（村）妇女主任杨万宜为了给游击队做鞋，家里无钱买鞋料布，便把家里两个下蛋的鸡和蛋全部拿去卖了。不到一星期，她发动全村妇女做鞋300多双，送到游击队。

游击队地下交通员阮秀英，为了工作，不得已将年幼的女儿寄养在青阳甘家冲崔奶奶家，被敌人知道后，将崔奶奶老伴崔大爷抓走，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崔大爷一口咬定不知阮的去向，后来崔大爷是被群众抬着回家的，不久由于伤势过重去世了，崔奶奶心里虽很难过，但却毫无怨言。直至解放后，女儿回到母亲的身边。阮秀英将崔奶奶接到自己家，为她养老送终。

第五节 泾青太工委的建立与活动

一、泾青太工委及政权组织的建立

1948年9月，中共皖南地委决定在黄山召开会议，布置迎接大军渡江工作，并调整各地组织，调朱农进浙赣线开辟新地区，以原泾青南县委所辖地区和太石地区为基础成立了沿江工委，下设6个小工委。当时青阳大部属二工委，即泾（县）青（阳）太（平）工委。东北部属四工委，即铜（陵）青（阳）南（陵）工委。另有小部属三工委，即泾（县）青（阳）南（陵）工委。二工委尹彬任书记，陈策任副书记，杨友华、孙林、鲁凡为委员，彭国玺负责武装，行政上成立办事处，尹彬任办事处主任。

工委、办事处下辖陵阳、杨田、龙门三个区委和区政府。陵阳区委：书记杨友华，委员：章贵、周光斌，区长章贵。杨田区委：书记孙林兼区长。龙门区委：书记鲁凡，区长周木荣。当时有党员150余名，工委活动区域主要在青阳，无固定驻地，二工委主要任务是策应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恢复、发展党和群众组织以及政权机构。泾青太工委成立十天后，建立了泾青太游击连，共有60余人。连长：彭国玺，副连长：方忠元。

工委于10月初在泾县上石岭查仿芜家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尹彬主持，孙林、杨友华、鲁凡、彭国玺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沿江工委的指示，讨论了1948年10月至12月3个月的工作会议计划，布置了各地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武装斗争、财粮、税收、群众等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青阳地下党负责人陈法周在杨田梅溪主持召开了地下党会议，传达了沿江工委关于迎接大军渡江的一系列指示。规定：“地下党从现在起做好配合游击队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坚守岗位，听候命令，不得离开。”决定派出专人深入青阳城内搜集情报，了解敌兵力部署情况，以及粮草储存情况，王庭栋、施治平、陈锦奎3人就地驻守，负责外围联系。会后，二工委和地下党密切合作，在全县范围内积极开展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

二、策应解放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

（一）组织准备

1948年10月开始，泾青太工委便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和政权机构。11月份沿江工委委员许章法奉皖南地委指示过江送信并指示工作（许当时带来了地委要二工委配合其行动的指示信），信中指示二工委：要迅速组织精干人员带领工作组深入各区乡，为筹建各级政权打好基础。随即二工委派王志胜、刘孟辉、王善炳、王道千等分别率领工作组，赶赴宾阴、乔木、杨田等地开辟工作，不久便普遍整顿、恢复和发展了党组织、民兵和群众组织。

为了在思想、组织等方面作好策应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工委整顿恢复党群组织的工作进行得非常扎实。以宾阴乡为例：宾阴乡党组织曾遭受敌人的破坏，原有的党员，有的办了自首，有的暴露了身份，有的隐蔽未动。经过清理整顿，共恢复了 52 名党员参加了组织生活，另外，又发展了 29 名新党员。全乡有 6 个支部，3 个党小组。大致情况是：华阳 16 名党员，支部书记冯朝乐；青坑 14 名党员，支部书记汪金福；石太 10 名党员，支部书记王振来；花园 17 名党员，支部书记张克勤；江梅 7 名党员，支部书记肖开才；檀村 5 名党员，支部书记钱文奎。另外，二酉、黄狮、金峰有 3 个党小组共有党员 12 名。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农会、妇女会组织得到恢复。宾阴乡成立了 9 个农会，共有农会会员 720 多人；成立了 8 个妇女会，妇女会员 540 多人。其中二酉农会主任杨启寿，妇女会主任许枝香；华阳农会主任张发意，妇女会主任刘银花。同时，还建立了千余人的民兵组织。这些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在迎接大军渡江和解放军渡江后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物资准备

为了筹集粮草支援南下大军，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以保为单位成立筹粮委员会，征收公粮。杨田区 14 个保就筹集粮食 150 多担，宾阴、乔木等地也筹集了一批粮食，1949 年元月底，王志胜和刘孟辉于一天夜间深入三方受敌（朝阳、石安、董村系敌占区）包围的金锋保上家湖劝募公粮，由肖定钧、龙大发分别通

知保长胡有钧和 8 个甲长晚上 9 时开会。会上，讲明了当时的政策和劝募公粮的任务。这次共募大米 105 担，稻草 120 担，黑布 14 匹。第二天有人漏了风，国民党宾阴乡乡长张超带领陶登有等十几个乡丁到上家湖抓龙大发，龙被肖定钧甲长掩护脱险。一个月后，龙大发还是被抓去，经严刑逼供，并关押了十余天，因查无实据，后被放出。

尽管如此，整个募粮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共计募大米达 72000 多斤，稻草 90000 多斤，并发动妇女做布鞋 629 双。除此之外，各地还充分准备了柴草、马料及大军渡江时的向导、担架队等，为大军渡江作好充分的物质准备。

以上各项工作的完成，对于策应和配合渡江战役，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先遣渡江大队”实施渡江，创造了条件，使“先遣渡江大队”渡江之后，与青阳边区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合一起，如鱼得水，在敌人的重兵之下行动自如。

（三）接送干部过江

青阳的东北部属铜青南地区（四工委）管辖，四工委工作重点是策应大军渡江，解放前夕，青阳北乡人民在四工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由马长炎、高立中率领的华野南下先遣队到达桐庐无地区以后，沿江工委指示四工委立即与先遣队联系，之后，四工委又多次派交通员许来全到江北桐东三官山地区，执行南北联络任务。敌人沿江防务紧，四工委四次冒险护送干部渡江：第一次接杨友华从江北渡江过来，第二次接许章法、刘永带领的先

遣小分队过江。这支小分队是由七、八名武装组成的。小分队过江后，在老鸦岭同游击队会师，在小分队的配合下，打了一次伏击战，缴获国民党天宝山乡公所派出来抓壮丁的乡队步枪两支。小分队在游击队的护送下顺利地抵达歙县桃岭胡明那里。第三次南北交通员许来全护送第五工委副书记陈作霖，由江北到江南，在朱村乡一位小学教师家隐蔽了几天，徐世达派游击队员护送他到黄山司令部。第四次四工委派交通员许来全护送许章法到江北，带去电报密码，使皖南、皖北恢复了电讯联系。

第六节 中共青阳县委的建立与活动

一、中共青阳县委及政权组织的建立

许章法从江北返回后，1949年2月沿江工委派工委委员许章法到青阳领导策应大军渡江工作。2月21日沿江工委决定青贵边区和二工委合并成立青阳县委，书记许章法，委员尹彬、孙林、杨又华、彭国玺，县委下辖组织主要是杨田、陵阳两个区委以及青贵边区属青阳境内的党组织，从这时起直到解放，青阳地方党组织没有大的变动。在青的原属泾青太工委（二工委）领导的县政权、军事组织及下辖机构均此时统一改由县委领导。

二、中共青阳县委及政权组织的活动

（一）策动国民党青阳县常备队起义

常备队秘密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国民党青阳县常备队是抗日战争初期，由县长操竹友建立的。当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操同意让新四军派员进入常备队担任教官，组织训练。新

四军派进常备队的四名人员均是共产党员。于是，他们很快在常备队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并发展了陈文堃等数人入党。当时组织活动及领导方法都是单线，只有纵向的关系，无横向的联系。常备队秘密支部在敌营十年，其上级与联络关系分别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军部、青阳工委、青阳县委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山地中心县委、黄西工委、沿江工委和青阳县委。

1945年以后是秘密支部发展的最盛时期，党员发展到36名。自卫队两个营部、电话总机室、警卫排、3个中队、少数的分队都有党员。陈文堃所在的四中队里，班、排长几乎都是党员，当时分布在各个部门的党员大致如下：在自卫团部的警卫排有施玉松、刘少贵、王怀林、陶金水；电话总机室有陈锡荣；在第一营有焦三元、李龙保；第二营部有陈名海、陈法明；在第六中队有方启斌；在杨田乡公所有刘福炎等。

至解放战争时期，秘密支部在常备队中的形势越来越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秘密支部书记陈文堃升任为第四中队队长，二大队大队副吴举贤亦逐步倾向革命，方启斌在第六中队任副指导员很受中队长陈瑛的“赏识”，施玉松在县政府内进行配合，并经常将县府和驻青部队编制及调动情况向陈文堃汇报。副支书陈法顺任司务长，活动范围和接触面都很广，这样情报来源进一步扩大。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与常备队秘密支部有着密切联系的秘密交通站——盘台交通站。从抗日战争一路走来，实践充分证明盘

台交通站的重要历史地位远远超出了其建站初衷的意义。因为青阳地下党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样长时间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工作，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配合大部队行动的活动一直坚持着，盘台交通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中枢，南来北往的中转作用，使茗山、宾山根据地不断扩大。至解放战争时，形成了上至太平龙门，下至芜湖，南至泾县青弋江，北抵长江边之铜、繁，西接贵东的皖南大部根据地。面对长江，背靠山区，直接对国民党“江防要地”构成威胁。盘台所起的桥梁、纽带作用，使沿江的皖南山区联成一片，为后来配合大军渡江，解放江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诚然，这与常备队秘密支部的党员艰苦的工作是分不开的。盘台交通站虽在宾山根据地，但其活动同样是秘密的。二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隐蔽战线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也是互为依存的。没有常备队秘密支部情报的送出，新四军（后为解放军）、游击队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应对决策，没有盘台交通站的信息反馈，常备队秘密支部的情报或许成为过时的消息，更何况其间还需由地下交通员的沟通与联系。因此，青阳地下党非常注重地下网络建设，至1948年，全县建立起十几处联络点：梅溪何家店联络点，负责人朱怀宗；杨田十八湾联络点，负责人陈长根；承天巷烟摊联络点，负责人陈其祥；县城小学联络点、负责人孙仲彬；县城三猫公司联络点，负责人陈锦奎；梅溪保联络点，负责人陈在云；桥头堡联络点，负责人宁郁邦；乌株山联络点，负责人王家荃；王里亭联络点，负责人阿山；江边

联络点，负责人辛伯（谢老三）；杨田洋桥联络点，负责人王铺洪。以上秘密交通站点，是常备队秘密支部与部队、游击队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常备队秘密支部作用的扩大与外延。

起义前夕的风波 1947年7月施启祥起义杀掉了中队长胡开武，这件事在常备队头子中震动很大。当时孙开来（已是自卫队第二营营长）就公开向陈文堃表示：“现在你要保全我，以后我保全你……”陈听了心头一怔，忙问：“你讲什么，我不懂。”孙没再说，陈心里嘀咕，怎么回事？原来有个石妙生当时是党员，他和另外3个人在六亩田看弹药库从未出事，这引起孙开梅的注意。孙想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只有4个人看弹药库，游击队为什么不来袭击，这里面一定有名堂。一天，他到弹药库甜言蜜语地套石妙生的话，结果石妙生口无遮拦地道出了游击队不来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并且他还暴露了陈文堃也是共产党，但孙开梅并没有向敌人告密，原因是游击队向他要枪，可是他自己原来的私枪早已给了陈文堃（地方士绅的私枪绝大部分都在成立后备队时交到这个队来了），他已怀疑陈是共产党，但他想利用陈给他说好话保全性命。所以他除把这件事向孙开来讲了以外，没向别人讲，这时他把与石妙生谈话经过一讲，陈这才知道了情况的始末，后来开除了石妙生的党籍。

再一件事就是这个营的副营长吴举贤，他是孙开梅的老部下，又是孙开来的同学，他也知道陈文堃的一些情况，也是为了

保命，怕游击队杀掉他，就积极向陈靠拢，要求加入共产党，并要求给他机会，为党做点必要的工作。以后他为游击队提供了购枪的线索，主动和陈交谈“清剿工作情况”，并经常谈他干这工作是为了生活，同时他老家（桐城）已解放了，受到了一些影响。陈为了利用他，从他那里得到情报，就给他填了张表，发展了他，但陈心里清楚，对这种人要谨慎从事，所以当时没有报上级批示。自从他填表后，每次的“清剿”会议都向陈汇报。每月交5发手枪子弹为意思，此人确已完全被陈控制利用，但陈觉得还是不能不防。

当时上级党组织根据陈文堃等在敌人中已暴露和已处于解放前夕的情况，认为：第一，再坚持下去无意义；第二，解放军侦察营要渡江熟悉地形，必须配合；第三，凡陈所在的范围，游击队都不便活动，这样自己限制了自己，成了障碍；第四，既已暴露，再坚持下去有危险。从这4方面来说条件已经成熟。因此，1949年2月初，党派许章法来传达指示说：“现在积极准备，随时听命令行动，能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当时陈找到副支书陈法顺，支委廖文彬、周金保、周金水（后牺牲）开了个支委会，一方面传达指示，另一方面研究了准备工作，然后分头传达到每个党员。

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是起义成功与否的关键，必须考虑全面，周密安排。当时有3个主要问题需要作充分准备和安排。第一是支委会本身对起义的意见不一致，有的顾

虑起义后打游击还不知要打多长时间，家庭生活没办法；有的主张不起义，等大军渡江到了大通时再走；第二是部队住地分散，全营只有四、六两个中队加一个警卫排，四中队有两个排一个住南阳湾，一个住东堡，距陵阳二、三十里，起义时怎样集中的问题需要确定，第三个问题是六中队只有一个党员，其余的还不知道能不能带出去。

其中第一个问题，既是思想问题，又是实际问题。为此，许章法来检查工作时，找了陈法顺、廖文彬连同吴举贤进行了一次谈话。认识一致了，就开了一次支委会，在会上首先请大家摆个人家庭问题，提出安排办法和意见，最后一致同意能带出的家属都带出来，不能带出来就发给半年粮食，这样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对二、三两个问题大家也作了相应的研究，比如：部队分散可以统一计算时间，统一时间集中，对第六中队情况作了充分分析，准备增派便衣（党员）到六中队去活动。

这时国民党青阳县政府内已经很乱，国民党五十五军万福麟部驻进青阳，陈文堃部受命4月1日调动到北乡（木镇）去驻防，这成了当时最紧急的问题，因一调动就无法实现起义计划。于是3月25日在梅溪陈法周家开了个紧急会议，提出了3月29日提前举行起义，并将起义方案一起由李龙保送到地委胡明那里。地委接到后，马上由胡明、熊兆仁、刘奎签署了一项“紧急决定”，派沿江支队副李友白和沿江工委委员许章法在陵阳镇华阳村前小山上的松树林里，向陈等作了传达，决定同意陈等3月29日

行动，并决定在行动时派一个连策应。会后陈等把有关事项布置好，如谁看电话，谁负责部队等。为了组织更多的人参加起义，陈于26日到一营去做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误会，副营长吴举贤把电话搬到马路上给县长打电话。陈本想到驻乔木的一营去和那里的两个党员联系一下，看能不能也一起带出一部分来。这时，陈事先布置看电话的人已赶到半路上向陈报告了这个情况，陈回来后吴举贤看陈脸色不好，他就问陈怎么了，出事了吗？陈说：“没有什么，你说出了什么事？”他说：“你是否怀疑我到公路上打电话的问题，不要误会，我是向县长谈民伕问题，因为在家里打不通才把电话机搬到公路上接上铜线打的。”这样一讲才消除了误会，否则，准备3月29日晚上将吴杀掉后立即行动。

起义 一切准备就绪，定于3月29日晚九点，将全营240余人加上陵阳乡公所30余人的武装共270余人，7挺轻机枪，8支手提式，30多支驳壳枪，170条步枪，一起集中在陵阳。这时地委派了一个指导员（姓孙）来给起义部队带路，陈等作了如下组织工作：

（1）按部队住的路程远近计算行军时间，分别下达集中的命令。

（2）布置了专人监视可能出问题的排长，尤其是六中队的，如果他们要反抗马上就干掉。

（3）要陈法周通知六中队队长陈瑛（很反动的家伙）请“病

假”，不要到部队来（这时孙开来也住到青阳自己家里不来部队了）。

（4）给团部制造假情报，如“某日在某地方发现新四军多少人”等等，造成紧张空气。

（5）派出狙击手，准备万一。

（6）破坏通讯联络，尤其是电话线。

（7）安排好军官家属，给他们发粮食。

同时要求官兵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部队都按时到达了集中地点。这时副营长吴举贤不想走了，理由是：他这样走了，对不起营长孙开来；拖着家眷，无法生活。当时因为很需要他，部队出发还得由他下命令（陈只是四中队长，六中队陈无权下令）。陈等就向他提出家属派人给抬上，另外问他到底要对得起谁？经过一场说服，他同意了，于是他在队前按照陈的意图下了“今晚奉团部紧急命令转移”的命令。部队离开陵阳开往杨梅村，这时陵阳的碉堡、工事由策应起义的沿江支队某连将其统统烧掉了。

到达杨梅村后，当夜杀了几头大猪，办了些酒菜，全体官兵会餐后按原先对某些人的监视布置马上整队，在一个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吴举贤宣布：“自卫团第二营脱离反动统治起义了！”接着沿江支队副支队长李友伯宣布，起义的这个营仍保留二营的称号，编入沿江支队，由吴举贤任营长，陈文堃任副营长，朱荣

生任教导员。

部队编好后带到石台小洞坑外的一个大村庄，进行了整训，全营都换上了新军装，稍事修整后，即随沿江支队前往石台、太平等地作战。先将石台所有（除县城外）敌据点扫掉后，又打了太平焦村，老百姓见了都高兴地说大军过江了，部队连战连胜，连最反动的 192 师也躲着不敢交锋。然后又行军到繁昌迎接了侦察营渡江，配合他们熟悉地形，又送他们回去。接着解放了三里店，之后，沿江支队集中力量把躲到泾县的 192 师给干掉了。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 1949 年 4 月 21 日大军渡江了，部队汇入渡江大军的洪流。

（二）渡江前夕的三次战斗

到青阳县委成立时，游击队和民兵基本控制了整个青阳县的局势。县委遵照沿江工委发出的《为紧急完成迎接大军渡江任务的决议》和《关于迎接大军南下掌握大发展形势的紧急指示》的精神，抓紧部署做好一切有利于大军渡江的工作，寻找作战机会消灭运动中的敌人，期间游击队先后进行了 3 次战斗。

1949 年 2 月末，在一次敌情汇报会上，许多人提出要严惩杨田埂下街头“八字门”常备队一中队的一个排。这个排的排长叫唐欣然，外号唐疯子，非常反动，屡与游击队作对，且欠有血债。县委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于是，许章法、方忠元等通过在游击队任副班长的陈树生，做在唐排里当乡兵的两个侄儿的工作。方忠元亲自出面对他们进行谈话教育，终于二陈同意做内应。一天，

许、方率领一排人夜袭了这个排，毙敌 1 名，除敌排长唐欣然外出漏网外，其余全部被俘，缴获机枪 1 挺，步枪 22 支，花筒式冲锋枪两支，子弹、手榴弹数箱。

4 月 20 日，渡江战役一声炮响，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国民党铜陵县政府县长王某率三个连和机关家属 1000 余人（许多民伕，挑着担子拖拖拉拉几里长），逃到青阳境内的董村，企图向屯溪方向逃窜。彭国玺、刘孟辉和王志胜得知消息便立即率领游击队十几人，并组织民兵群众五、六百人将其团团围住，另一方面派董维汉去敌营，规劝他们投降。敌人耍尽花招，就是不表态。第二天下午，龙大发、顾次山汇报，解放军已到石安桥。彭国玺立即派刘孟辉跑步到达石安桥，向解放军某师石政委汇报了这一情况。解放军立即派一营兵力配合游击队向敌阵地打了几炮，又用机枪扫射一阵后，敌军都乖乖地放下了武器，举手投降了，只有国民党铜陵县长和副县长李至发溜了。这次战斗，共缴获机枪 4 挺，步枪 240 支，各式手枪 12 支，弹药数十箱，俘虏敌排以上军官 12 人。

4 月 21 日下午 4 时，解放军突破长江封锁线，分别进入江南阵地。皖南游击队集中千余人在长江南岸边接应。此刻，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常备队乱作一团，仓皇组织潜逃。杨友华、孙林、章贵和方忠元等率领 50 多人（枪），分别在杨田的青石岭、沙济的牛二岭阻击溃退敌军，他们将公路破坏，致使刘汝明部撤退时，五十多辆运输车开不动。在青石岭战斗中，吴福庆奋勇当先，率

领全班冲上公路，高喊缴枪不杀，敌四处逃窜，当场缴获步枪140余支和40余箱物资。大部分溃散。同日，沙济的牛二岭狙击战也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

（三）情报和交通工作

遵照皖南地委和沿江工委的指示，为加强情报和交通工作，陈法周于2月底派陈文堃和杨斌到大通、贵池江边侦察了国民党江边工事设防情况和兵力部署情况。四月十五日，县委派一连副指导员孙运松率两名侦察员化装侦察敌坝埂头炮兵阵地，将敌装备情况（炮的门数，型号）及指挥机关位置，从荻港至铜陵沿江设防，黄姑庙洋灯两个师设防分界线，绘成草图，为我军渡江战役提供了重要情报。彭国玺通过侦察了解，比较详细地掌握了国民党在木镇一带兵力部署、人数、枪支数、武器弹药、粮食储存等方面的情况。解放前夕陈法周以“大华布店”为基点搜集和传递情报，派施治平等秘密记录敌五十五军设在青阳城内大华布店电台的通讯内容。

“大华布店”从抗日战争坚持到解放战争，敌人浑然不觉，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特别是国民党将情报自动送上门，不免有些滑稽。1949年春，国民党刘汝明部所属五十五军驻扎青阳。敌指挥部需要安部电台，选来选去，他们觉得“大华布店”不错。于是将电台安装到布店的楼上。然而，国民党军哪里知道，楼下的布店正是地下党交通点。这下，敌明我暗，店内地下党工作人员施治平、王庭栋、陈根保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获得了许多重

要情报。

1949年3月上旬的一天，地下党员施治平上楼给国民党廖台长送茶，看到桌上一封绝密电报，内容为：共军于×月×日渡江，望你严加戒备，坚决守住江防。施牢记电报内容，迅速向陈法周汇报，陈很快将这一情报送出，并立即布置在全县开展除奸反霸、夺粮暴动等群众运动，有力地配合了渡江战斗。

敌我双方的情报机关在同一屋檐下，这种看起来很奇特的现象，足以说明青阳地下党交通站隐蔽之巧妙，情报交通人员之大智大勇，同时也是对穷途末路的国民党一个绝妙讽刺。

当时送情报的交通关系，除有专人送给地委外，一般都是派秘密交通员，化装过江送信；有时通过渔民中的地下党员，用渔船送人送信；另外还训练了一些水手，负责大江南北情报的传递工作。敌人封江以后，青阳北乡党组织和游击队克服一切困难，突破敌人封锁，选用专人递送，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四）策应先遣渡江大队

1949年4月上旬，解放军三野2兵团二十七军组成先遣渡江大队，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影片《渡江侦察记》的原型。团参谋长亚冰（章尘）任大队长、兼党委书记，侦察科科长慕思荣任副大队长，兼党委副书记。4月6日夜，“渡江侦察营”强渡长江，300多人中大部分是班、排以上干部，机智勇敢，装备精良，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江面虽宽，他们仅用50分钟时间就渡过了长江，在北埂王家与十里场之间胜利登陆，一路向铜陵狮子山后又

转移到南陵戴公山。游击队在甘家冲得知消息后，即派交通员廖运松前往戴公山与侦察营联系。廖行至谢家村与敌遭遇，不幸牺牲。到达戴公山的侦察员一部分人，在向导张家道带领下到了甘家冲；另一部分人冲入羊山，找到了游击队负责人查斌，由他带领来到甘家冲；还有少数的侦察营战士，从叶山、迪郎冲、吴村找到甘家冲，期间，先遣渡江大队慕思荣部在靠近王金牛渡江面时，五班渡船被敌炮击沉，有两名战士浮水登陆后失散，陈爱曦当即召集孙运松、芦元月、李艾堂，并将先遣大队负责人写的信交给他们，令其寻找。他们三人为避开敌人，三天走了三百多里路，终于在狮子山将两位战士找到，胜利返回甘家冲。几路汇合与游击队会师。游击队杀了猪，办了酒，慰问侦察营指战员。部队休整两天后，徐世达带游击队一个班，护送侦察营战士前往泾县陈塘冲黄山司令部。

（五）人民政权的建立

1、人民政权的建立

青阳县全境解放 国民党青阳常备队起义之后，1949年3月，国民党青阳县政府成立了“统一运动委员会”，各区乡成立分会，设主任，搜集地痞流氓，先授以官衔，然后由他们去招兵买马成立“江淮义勇军”，这一组织一时遍及全县，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青阳县委针对这一情况采取军事摧毁和政治瓦解的方法，很快就将其粉碎了。

4月21日，解放军胜利渡江，国民党县政府机关人员和家属

以及常备队千余人闻讯逃到九华山（常备队后在太石地区向沿江太石部队投降）。

23日，人民解放军从贵池、大通、南陵分3路进入青阳县城，许章法、陈法周、孙林率部队提前到达县城，城内居民在陈法周等组织之下，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夹道欢迎人民子弟兵。解放军某部政委宣布青阳解放并指示：1、迅速建立政权。2、接收国民党各级机构。3、征收公粮支援大军。同一天许章法、陈法周等在青阳大华布店楼上举行会议，会议根据沿江工委决定宣布成立青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许章法担任主任委员，尹彬、陈法周、杨友华为委员。同时成立了县政府，尹彬为县长，陈法周为副县长。尹彬当时被敌围困在泾县某山，由陈主持全面工作。自此，青阳县委、县政府开始在城内办公。

24日，沿江工委调许章法参与工委集中活动。26日，尹彬接替县委书记，陈法周接替县长，同期县委组建了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组织部长孙林，宣传部长张发典。

27日前，尹彬、陈法周等联名写信给逃到九华山的国民党县长谭摹宁和参议长陈浩如，责令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接信后国民党人员写了投降书，但谭和常备队长李效廉等10余人还是拒降潜逃了，其余的27日中午将100多条枪挑到杨冲，由解放军两个连部队护卫，杨斌、陈青、孙光忠等人前去接收。

至此，国民党在青阳的反动统治宣告覆灭，青阳县全境解放。青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投入了接收国民党政权的工作。

建立人民政权 4月23日，青阳解放，同日成立县民主政府，5月12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隶属池州专署。

县长先后为尹彬、陈法周、万振山；副县长先后为陈法周、贾国哲。在县政府成立的当月，县军管会、县政府发布第一号布告，告示各业店铺照常营业，饬令国民党军政人员向人民政府登记，交出武器和军用物品，严禁一切破坏活动。

当时县政府设立的工作机构为：秘书室、民政科、公安局、财政科、县人行、实业科、邮政局、电信局、粮食局、税务局、工商科、供销合作社、教育科。

青阳县人武部：部长先后为贾国哲、赵振平。

青阳县大队：副大队长先后为张少华、唐加浩，副政委先后为鲁凡、彭国玺。

下辖四个区公所：陵阳区公所（辖陵阳、河墩、先导、东石乡政府）；蓉城区公所（辖临城、龙池、江村、杨田乡政府）；庙前区公所（辖庙前、恭逸、老田、杜村乡政府）；吴潭区公所（辖木镇、乔木、宾阴、石壁、平虏乡政府）。当时，乡、保暂延旧制。

另外还建立了青阳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2、肃清匪特，保卫新政权

镇压西馆大刀会 大军渡江后，东至县常备队92人（枪），潜逃到本县杜村地区，与朱鹏、姜宝良、刘作波等大刀会首领互相勾结，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他们造谣惑众，并袭击解放军，

夺枪杀人，同时扬言要攻打庙前、攻打青阳县城，企图推翻人民政权，复辟反动统治。从表面看，西馆大刀会暴动很突然，其实是蓄谋已久。早在三十年代，它的前身“同善社”就开始在杜村一带活动了，相继在宗文、畈村、五阳、红光、西馆等地建立过乱坛，发展组织，培训人员，他们以乱坛为宣传阵地，传播封建迷信思想，散发醒世诗词，用沙盘扶乩写字，借以迷惑群众，以扩大大刀会影响。

1944年8月，安徽省“同善社”派武坛首领倪干卿、朱穆宗、周义田到青阳，与青阳县“同善社”查凤标、曹绍征等人联系，假借“抗日”之名，以乱坛为基础，吸收各乱坛首领分子入社，大办武坛，此后即以武坛为主，专事教授武术。期间，姜万祥、姜保良、刘作波等被发展为武坛成员，当“开刀师”。庙前、杜村均设有武坛组织，杜村武坛当时设在正华保刘克伦家里。至解放前夕，武坛又在屋脊村搞过一次，这两处武坛，训练了一大批骨干分子，为后来的西馆大刀会暴动，在组织上起了一定作用。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反共看上了大刀会力量，安徽省同善社由非法变为合法，青阳同善社，也相应成了合法组织。是年迁至九华山“白云观”公开活动。

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大刀会依附国民党成为反共急先锋，经国民党国防部批准，授以西馆大刀会组织为“国防部暂编第二纵队第一支队”，通过省社首领黄道衡、倪干卿上下联系，派军统特务朱鹏具体协助、组织武装，从事反革命活动，

委任倪、朱为正、副司令。解放前夕，地方游击队胡克南部在杜村、庙前一带频繁出击，乡、保长、士绅纷纷逃往庙前、青阳城里，同善社不敢公开活动，当时在省社首领黄道衡主持下、于白云观设安徽省“长经坛”。藉此召集贵池、桐城、太平、青阳等10县同善社首领分子聚会，秘密布置活动。他们以念经拜佛作掩护，以进山进香作联络，利用庵内老道士的公开身份，为其活动提供方便。此时姜保良、姜万祥不断派人四处打听，窥探时机。

1949年2月份，“白云观”首领分子，得知青阳吃紧，常备队起义消息，他们惶惶不可终日，遂离开“白云观”分散行动。

1949年4月23日青阳解放，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九华山，杜村一时混乱。到4月底，青阳县人民政府派来乡长一人（配备1名通信员），当时乡村政权尚未建立，仍利用国民党保甲长维持秩序，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政策尚不够了解，这给敌人以有机可乘。从西馆政治、经济、天时地利方面看，大刀会具备了某些条件，因此西馆自然成为活动中心，主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各县首领都在这里聚会，当时他们派刘拔翠去贵池联系匪首吴一飞，派徐小沛到贵池迎接朱鹏。

5月19日夜，匪司令朱鹏，带领80余名大刀会武装人员从贵池许家旦过来，当夜到达西峰岭脚下刘克俭家，与反革命分子姜保良、姜万祥、刘作模、刘克俭、刘立仁、刘鹿鸣、刘作波等汇合，计划将大刀会正式定名为“国防部皖西人民自卫司令部西馆独立第四团”。朱鹏任司令，刘立仁任少校情报处长，团长姜

保良，副团长姜万祥，西馆大刀会正式亮相。

5月20日，朱的大队人马天亮时开进西馆村，刘作波上前迎接。进村后，各路口均设岗哨，监视过往行人。天亮后村民见状惊慌，大刀会即进行“安民”宣传，自称“九路军”，“不伤害老百姓”等。当日即派人送信给青阳的刘作盘，是日上午，朱鹏在刘作波陪同下观察了西馆外围要道地形。当夜刘作波在西馆大宗祠召集保长、士绅会议，朱鹏出场，会议主要研究粮食供给问题，最后决定，粮食由各公堂筹集。

5月21日，大刀会挨家挨户逼迫村民报名参加大刀会，宣传参加大刀会的好处，对不愿参加的进行百般威胁；组织赶制刀矛，文武两坛一个请菩萨一个练武术，会员发展到300人。

5月22日，县大队副连长肖金和率领两个排70余人（枪）第一次进剿，大刀会在锣鼓声中交战（刀匪进犯时，除刀矛外，尚备有轻机枪、步枪、手榴弹。冲锋前喝朱砂水、念咒语、穿黑衣、系白带子、打锣为进攻信号，打鼓即收兵）。交战1个多小时，县大队牺牲12人、被俘8人，大刀会伤2人，刀匪一直冲到杜村乡政府，劫走电话机，拿走部分财物。战斗序幕已经拉开，大刀会感到战斗会越打越大，遂开始整编队伍，营以下设连、排、班。团部设特务排，开始有系统指挥。

5月23日，刀匪按兵不动、首领开会研究对策，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5月24日，上午9时左右，殷村姚驻军（人民解放军）到隋

家岗侦察，向西馆村里打枪，刘良辰率众出击，时间很短，双方无伤亡。同日上午县大队第二次进剿，在跑马淙打了一战，县大队牺牲2人，大刀会无伤亡。

5月25日，经过两次战斗，我方都失利，敌焰更嚣张，人数急增，准备攻青阳城。大刀会下令：各家炒粉，准备干粮。是日上午吴一飞、汪少虎、汪守敬（太平保保长）等3人，突然从贵池赶到西馆，立即召开会议，汇报殷村姚驻军情况，决定推迟攻打青阳，先打殷村姚驻军的作战方案：姜匪打正面，刘匪打后援，两路包抄。吃过晚饭，紧急集合、准备出发。朱鹏、朱穆宗、吴一飞、姜万祥等率众三、四百人，趁黑夜赶到太平陈村，聚集在陈氏大祠堂里，朱等在一个小房间里召开战前会议，此时外面细雨蒙蒙，祠堂内长矛大刀，杀气腾腾。

5月26日凌晨4时以后，姜保良、姜万祥带领一班刀匪先到殷村姚。驻军尚未起床，他们首先摸掉岗哨，接着冲进驻军民房，大喊大杀，村外山上也布满了匪众。驻军来不及防备，在失利情况下，边战边突围。当场牺牲22人，俘8人，损失枪支40余支，刀匪尾随突围战士，一直追到刘街乡政府，此时已是上午七、八点钟，刀匪返回，朱鹏脚受伤被抬回西馆。

5月27日，由于偷袭驻军得胜，这天庆功“犒赏”，狂呼“胜利”。刀匪声势大振，入会人员猛增，当日夜，西馆村5个祠堂住满了人，合计千人以上。于是又扩建一个团，刘作波任团长，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姜团”、“刘团”。

正当大刀会狂呼胜利之时，沿江支队查富德、陈文堃等，率武装 400 多人组成第三次进剿部队于 5 月 27 日傍晚，从贵池经小九华开进杜村乡畈村罗家，距西馆十里，半夜以后，部队迅速进入战斗阵地——港浜弄（西馆左前方 500 米）。天将亮，大雨滂沱，我军首先发起进攻，枪声激烈，大刀会蜂拥出村，以出击队形向港浜弄冲杀过来。团长刘作波手持宝剑、挥舞令旗、指挥战斗，我军依据港浜弄有利地形，以轻、重机枪对冲来的匪群迎头痛击，匪团长刘作波当即毙命，此时港浜弄一带已尸横遍野。大宗祠在熊熊燃烧，姜万祥隐匿，匪司令朱鹏、朱穆宗、姜保良等 20 余人仓皇逃跑（翻过龙王山向长垅方向逃去），此时扼守在西山郑（西馆右侧，隔道山岗通往杜村桥）的另一支刀匪尚不明西馆已败，听到枪声，经田房姜、冬瓜坑冲到杜村桥，与剿匪后续部队遭遇，俘我多人，准备解往西馆“司令部”，后得知西馆已败，刀匪知道已面临穷途末路便丧心病狂地将被俘人员全部杀害。剿匪部队集中火力对刀匪残部猛射，余匪跪地求饶。

至此，猖獗一时的大刀会宣告覆灭，匪死 300 余人、伤 40 余人，我方牺牲 11 人，伤 5 人，是日上午我军胜利回师。

此后，为肃清残匪，部队进行清乡搜捕。是日上午在西馆下街头发射迫击炮轰击龙王山散匪，并在五阳、七房姜、杜村、西馆等大范围内进行搜捕、清乡进行了四、五天，抓匪人员 200 余（其中有误捕）押往庙前、青阳，经过审讯，弄清事实，悔过自新，予以释放。匪首姜万祥，藏在西馆一家暗室里，一年后捕获

法办。在部队严密控制下，清乡过程中，允许群众进入西馆，进行认尸、寻尸、埋尸。外逃群众，动员返回家园，恢复农业生产，安置生活。

在建国后的镇反和肃反运动中，县公安机关在杜村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基本查清了大刀会连级以上的骨干分子，并分别进行了镇压、处刑、管制；对自首和检举有功的分别作了从宽处理和免于刑事处理的决定。

水鼓楼狙击国民党流窜散匪 1949年5月18时左右，国民党逃窜散匪一小股化装成人民解放军，从乔木乡向木镇方向逃窜。宾阴乡乡长王志胜接到区长彭国玺电话，得知区中队已由木镇出发，沿公路向乔木方向进军阻击，王志胜受命带领乡小队分别在千亩园、小路口、芭茅埂三处设伏阻击，正面由副队长董维汉率区中队沿公路向石安方向迎击。正在这时，听到木镇至石安桥之间的水鼓楼处有枪声，王志胜知区中队已与国民党散匪接上火了。这正是董所在的区中队在水鼓楼双茶棚（木镇武胜村）与散匪遭遇，这时天已黑，伸手不见五指。战斗打响后，区队副董维汉中弹受重伤，就在这紧要关头，董队副的通讯员查的全眼明手快，端起冲锋枪就扫，当即击毙敌军两名，余匪十多人趁黑向黄山村逃窜。董队副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区政府彭区长等在董队副家乡董村召开了追悼会，宾阴乡各保的部分代表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并追认董维汉为革命烈士。

其后，经过近3个月的搜缴活动，国民党残余基本肃清，匪

患基本杜绝，巩固了新生政权，人民安居乐业，社会趋于稳定。

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征程，可以看出：青阳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青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和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一部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正如孙宗溶同志所说：“青阳的党史，从历史上看，是一段光荣的历史，胜利的历史，是一段很有贡献的历史。”^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同全国一样，青阳县进入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阳人民在这片散发着革命气息的红色热土上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而继续奋斗。

^①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10-211页。

^②2005年9月第一版，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孙宗溶文集》第64页。